

韶關文史資料



庆祝 人民政协成立 40 周年 专辑
韶关解放 40 周年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印

韶 关 文 史 资 料

第十四辑

纪 念 韶 关 解 放 40 周 年 专 辑
人 民 政 协 成 立 40 周 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

我们要发扬永先永军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开放，克服前进中
的暂时困难，要为清廉、顾全大局、团
统一致，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共
同努力奋斗。

纪念韶关解放暨人民政协成立四十

周年

伍晋南无九九年三月

原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解放后第一任北江地委书记
伍晋南的题词。

東山志成滅羸解放
同心同德建北江

韶關龍族整八兵政協
成立之十周年紀念

黃業敬書

原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二支队司令员黄业的题词。

堅持四項基本
原則，反對資
產階級自由化

周明
一九六九年

原中共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粤桂湘边纵队连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周明的题词。

保持革命战争时
期的优良传统，
加强两个文明建
设。

何俊才
一九八九年
五月

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一支
队司令员何俊才的题词。

为建设现代化
的人民的干部
关系而继续努力

曾东

1989.6

原中央地质矿产部顾问、解放后第一任韶关市市长和
协商委员会主席曾东的题词。

图 为 北 →
江 第 一
支 队 当
年 油 印
的 宣 传
品。

東 廣 東 軍 民 交 友 會 贈 送 一 枚 獎 狀

接 收 人 員 守 則

1. 接收人員應注意之事項
2. 接收人員應注意之事項
3. 接收人員應注意之事項
4. 接收人員應注意之事項
5. 接收人員應注意之事項
6. 接收人員應注意之事項
7. 接收人員應注意之事項
8. 接收人員應注意之事項
9. 接收人員應注意之事項
10. 接收人員應注意之事項

全 軍 入 城 守 則

1. 全軍入城應注意之事項
2. 全軍入城應注意之事項
3. 全軍入城應注意之事項
4. 全軍入城應注意之事項
5. 全軍入城應注意之事項
6. 全軍入城應注意之事項
7. 全軍入城應注意之事項
8. 全軍入城應注意之事項
9. 全軍入城應注意之事項
10. 全軍入城應注意之事項

獎 狀



東 廣 東 人 民 解 放 軍 北 江 交 隊 司 令 部 獎 狀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胡 灼 華 同 志

贈

勇 敢 殺 敵

獎 狀 獎 第 17 號

司 令 員 何 俊 才
副 司 令 員 黃 桐 華
政 治 委 員 鄧 楚 白
政 治 部 主 任 林 名 勳

图 为 北 →
江 第 一
支 队 的
獎 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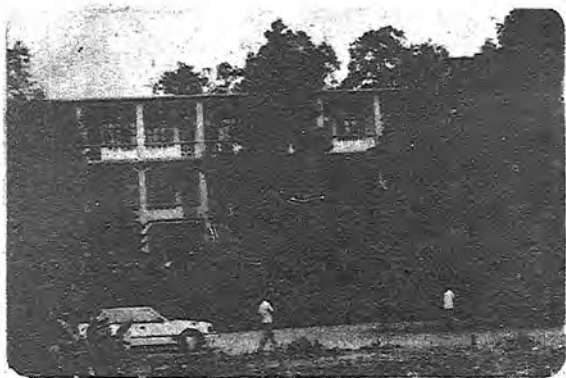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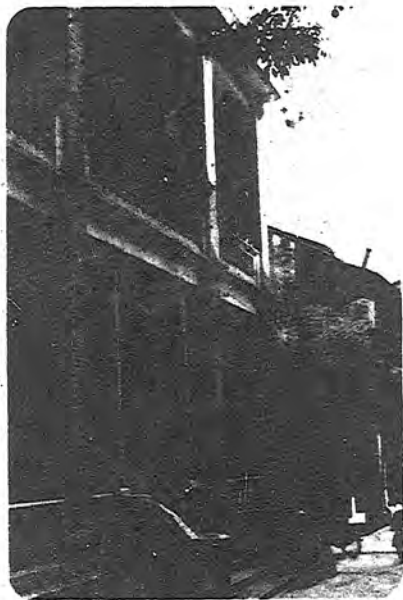


↑ 图为
1949年
9月解
放军通
过梅关
时的情
景。



← 图为韶
关市政
协第三
届前的
办公地
址(市平
治巷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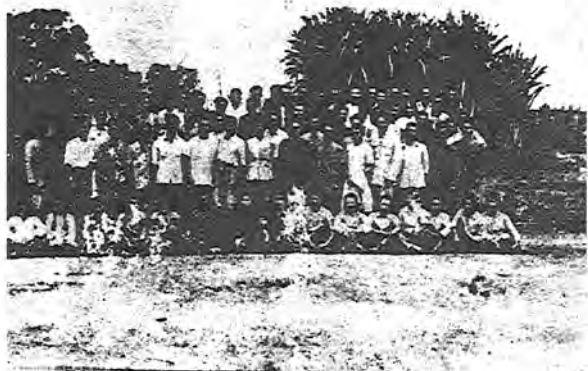
→ 图为韶关市
政协第四届
办公地址(市
政府宿舍东
院内的汉成
楼)。



图为现在的韶关市政协办公大楼。一楼为市民主
党派办公用；一楼部分和二楼为市政协办公用。



↑ 图为1963年韶关市政协工商界人士前往黄塑水参观学习时与当地干部的留影。



↑ 这是参观的全体人员合影。

目 录

- 粉碎敌人“清剿”迎接南下大军.....何俊才（ 1 ）
- 会师韶关 解放连阳.....周 明（ 11 ）
- 在粤赣湘边战斗的岁月.....黄 业（ 26 ）
- 依靠人民，建设新韶关.....曾 东（ 58 ）
-
- 解放北江地区概述.....廖桂洲（ 61 ）
- 回忆解放翁源龙仙始末.....林奕龙（ 72 ）
- 解放新丰城 俘虏陈中瑞.....龙景山（ 76 ）
- 解放前夕的曲江武装斗争.....何远赤（ 80 ）
- 曲江解放前夕的支前准备工作.....何国文（ 89 ）
- 迎接韶关解放的回忆片断.....莫德炜（ 94 ）
- 保护曲江大桥的斗争.....李景昌（ 98 ）
- 忆北一支翁东大队活动片断.....陈心镜（ 103 ）
- 翁源解放和翁北支前见闻.....钟石声（ 108 ）
- 北江军分区十一团三营剿匪实况.....李启民等（ 116 ）
- 解放前夕南岭煤矿的护矿斗争.....刘玉泉（ 124 ）
- 韶关市区中等学校解放前后概况.....饶纪寰（ 129 ）
-
- 叶剑英同志到梅坑.....龙景山（ 135 ）
- 回忆黄松坚同志.....邓楚白等（ 138 ）
- 我在解放战争年代.....张显岐（ 225 ）

民主革命“三大法宝”的模范执行者

- 回忆黄桐华同志……………梅日新（145）
- 忆我们在连阳进行的统战活动……………麦永坚等（150）
- 真诚合作 风雨同舟……………陈培兴等（157）
- 三长中学 一样胸怀
- 我在连县三任中学校长回忆片断……肖怀德（165）
- 共产党人忠诚的朋友陈发元……………陈心镜等（171）
- 包三易先生生平简介……………何刚等（178）

- 连县起义前夕……………黄 振（182）
- 我参加丰阳武装起义的回忆……………吴 辉（187）
- 战斗在粤赣湘边的卫生人员……………麦雅贞（191）
- 我在珠玑乡卫生所工作前后……………朱依群（197）
- 曲江卫生院医护人员迎解放……………谢恩华（206）
- 我怎样走向革命征途……………刘白亮（211）

- 韶关市政协早期组织及其进行的主要活动……刘 平（216）
- 同舟共进四十年……………陈维廉（230）
- 志愿军代表团来韶报告忆述……………李世亮（238）

· 补白资料 ·

- 我国国旗的演变（115） 人民政协会徽（181） 新旧政治协商会议（177） 我国民主党派状况（205） 迎军三件事（210） 解放初北江专署所属县分（107）

粉碎敌人“清剿”迎接大军南下

何俊才

翁江地区辖翁、英、新、佛、清、曲等县，地处铁路沿线，为敌人必须确保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地区活动的北江第一支队，视为眼中钉。宋子文主持粤政后，他们制定的对广东人民武装进行所谓“清剿”的两期计划，首先从翁江开始。一九四八年初，他们以六十九师九十九旅为主，集中六个团的兵力，结合各地反动武装，进攻翁江地区。一月二日，他们从曲江、翁源等地长途偷袭驻扎在翁源太平的粤赣先遣支队司令部（北一支前的番号），遭我顽强反击后，敌人即向翁源、新丰、英东等地区进攻。

敌人“清剿”的行动开始后，翁江地工委在罗家山召开紧急会议。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地工委决定集中一部分主力相机打击敌人，其余部队则分散成小分队或武工队。和群众一起在各地坚持灵活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特别是上半年，是翁江地区坚持反“清剿”斗争最困难的时期，敌人对我各地游击区和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围攻”。他们培植地方反动势力，组织“戡建会”和联防队配合敌军屠杀抢掠；对土改和停租废债地区进行反攻倒算，对我进行经济封锁；施行残暴的“三光”政策，并村并粮，五家联保；到处筑碉堡炮楼，组织联防队防

守，强迫诱骗我游击队员及民兵农会干部“自新”，大肆屠杀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

为着粉碎敌人的“清剿”计划，二月，粤赣先遣支队司令部发出了《用斗争来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信》，集中主力部队，在一年的时间内，先后组织了六次比较成功的歼灭敌人的战斗。在翁源组织了瓦瑶排、犁耳坝、阿杞山三次战斗，在英东，组织了丘屋山暗径两次战斗；在新丰组织了猫笼坳战斗。共歼了敌人一个连和五个排的兵力。缴轻机枪八挺，武器弹药一大批。当时，翁江地区新组织起来的主力尚小，要打大仗有困难，在敌人进攻面前，能一个排一个排地消灭敌人，政治影响也很大。它揭穿了敌人说游击队已经被消灭的谣言，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斗志，促使各地联防队动摇害怕，便于我们进行政治攻心，分化瓦解敌人。在这些战斗中，我们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学会了打伏击战，武器装备也大大改善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新华社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我解放大军准备向长江以南进军。国民党反动派为挽救其垂危的统治，妄图巩固其南方的最后巢穴，撤换了宋子文，派余汉谋、薛岳上台，声称继续对我游击区进行“清剿”。但由于其兵力空虚，士气低落，各地联防队纷纷动摇瓦解，这次行动已是强弩之末。反之，翁江地区的广大军民，则群情振奋，斗志昂扬。我支队主力四团集中到新丰梁家坝整训后，士气高涨，立即开展了缴机枪缴炮的立功竞赛。支队司令部号召全军主动出击，消灭更多的敌人。一月二十一日，我飞虎、钢铁两个连在翁源陈公湾伏击保安团巡逻队一个连，歼灭其一个排；四月六日，在翁源附城良洞和国民党一四七师四四一团某部遭遇，歼灭二个班；四月

十六日，飞虎连在翁源六里烂陂河桥伏击一四七师警卫营巡逻队，歼灭其一个排；四月二十一日，钢铁连和三团一个连在翁源新江磨刀坑伏击保安团一个营，歼灭其两个连。上述战斗，共缴获轻机枪八挺，迫击炮两门，枪枝弹药一大批。至此敌人对翁江地区的“清剿”计划，完全失败。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四月二十三日，我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灭亡。粤赣湘纵队指挥部，根据新的形势，命令我支队迅速向新区推进，解放更多的地方，消灭更多的敌人。使北江和东江解放区连成一片，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广东。

翁江地委和支队司令部根据上级的指示，制定了巩固老区发展新区的计划。五月初，支队机关由邓楚白政委率领开赴佛冈迳头地区，领导新区工作的开展。主力四团由司令员何俊才率领向新丰、佛冈进发。当时，敌人主力有的已调离翁江，有的集中县城和交通线，敌之保安团和联防队固守据点，不敢出动。为着扩大我军影响，主力四团在白天行军中，广泛开展宣传工作，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指战员把这次行军称为武装宣传游行。各地的人民群众看到那么多游击队白天向新丰佛冈等地进军，纷纷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命不长了”。

我主力四团在向佛冈的进军途中，五月二十一日，击毙佛冈二区联防大队长兼保安营长范烈光。范烈光是佛冈二区的主要反动头子，一贯与我为敌，被国民党反动派看作是可靠鹰犬，也是我军开展佛冈新区的主要障碍。范烈光被击毙后，二区的联防队随即纷纷投降。整个佛冈北部六个乡，大

部分被我解放。

佛冈一区石角是县政府所在地，驻有国民党九十一师二七二团。得悉二区被我攻占后，为确保县城，挽回颓势，立即派出一个营进驻二区烟岭，拟重新夺回二区。

支队司令部决定组织力量，相机歼灭敌人。四团根据支队的部署，把部队集中迳头游击根据地，待机歼敌。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敌涌入烟岭圩后，“山雨欲来风满楼”，二区已战云密布，一场斗智、斗勇的搏斗，便在敌我之间拉开了帷幕。

根据以往敌“清剿”行动规律，重占烟岭之敌，次日就会开进游击根据地。四团决定将部队部署于迳头东北方向之莱洞，迎击进犯之敌。指战员在五月阳光的照射下，伏击了一天，不见敌人的影子。二十七日这一天就白等了。

敌人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们当时不清楚。是否先以一个营把我们的主力吸引在烟岭方面，再组织兵力从水头圩乘我不备，经黄塘迳“围剿”我游击根据地上下青洞，和烟岭之敌相配合，置我于夹击之中。我们分析了这个可能性，认为不能只顾烟岭之敌。支队指挥部决定二十八日天亮前再设伏黄塘迳。结果，敌人也没有来，黄昏时撤回迳头湖洋村休息。

我们根据敌重占烟岭，三天仍不出动的反常现象，分析敌人一则可能情况不明，二则想麻痹我们，决定发扬不怕疲劳的连续伏击的精神，在烟岭南约五里的张屋附近，出奇不意的伏击敌人。由于连续两天的伏击，指战员已相当疲劳，行军途中稍一停留，有的战士就睡着了，有的边走边打盹，掉入稻田里才清醒过来。这一天敌人还是没有行动。

傍晚，部队撤出阵地到附近的粟坑村休息。晚饭后，我和副司令员黄桐华参加四团党委召开的骨干会议，就敌人的

企图和明天是否继续设伏的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敌深入烟岭，因地方联防队大部分已投降或逃跑，没有耳目，两眼抹黑，所以不敢贸然发动进攻，这是共同的认识。问题是敌人现在是等待增援还是准备逃跑，明天是否继续设伏，对此，讨论很热烈。一种意见，认为连续伏了三天，指战员已相当疲劳，主张休息一天后再设伏；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克服一切困难，找寻战机，继续设伏，绝不能给敌人跑掉。我们坚决支持继续设伏的意见。并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决定在挂牌迳设伏。因为敌人不管是撤退或增援，都很有可能经挂牌迳。

会议结束后，已是五月三十日的凌晨，团长杜国栋、政委汤山当即向各连长发出命令，并做好继续伏击的政治动员工作。吃饭后，部队立即向伏击点挂牌迳进军。

挂牌迳在佛冈境内，是连接佛冈南北两地的交通孔道。它的走向是由东北向西南；一条无名小溪在迳的东侧，注入濠江；迳的西边为雄壮高大的观音山，东边靠北一段是米仔碎山，靠南一段是井公五山，这两山的交界处，就是挂牌迳的中心位置。由栗坑走来就在这里进迳；西边山较高，东边山较低；迳北出口的围村叫官厅，距烟岭三十余里，迳南出口的围村叫洋布坵，距石角约有四十里。石龙在泽布坵南约一里地。

从栗坑到挂牌迳不过十二、三里。因天黑刚下了点雨路滑难行，部队到达迳边的朱洞时，天已发亮。杜团长命令连队休息待命，手枪队立即进迳，分南、北两组向前侦察和搜索，封锁消息。

正当我们看地形的时候，手枪队员带回两小商贩，是从石角去烟岭赶集的，其中一个女的向我们介绍敌情：“国民党

军队很多，屋里山上都住满了，正在石龙村吃饭，说饭后就来烟岭”。原来国民党二七二团另一个营，五月二十八日已达石龙村，但慑于我之声势，不敢贸然进迳。

石龙到挂牌迳南口洋布圩不过一里多路，时间已不容许我们细看地形，把两个小商贩安置在安全地方后，杜国栋团长立即命令：铁鹰连埋伏于迳西，不得让敌人占领西边山头，并负责掩护全团的进攻和退却；钢铁连埋伏于迳北段东边的山岭上（即米仔碎山），一定要把敌人放进来再打，如南面先打，则负责阻击北面来援之敌，海流连一个排归钢铁连指挥；飞虎连埋伏于迳南段东边的山岭上（即井公五山），也一定要把敌人放进来再打，如北面先打，则负责阻击南面来援之敌。各连都组织一个突击队，埋伏于迳边；手枪队在钢铁、飞虎两个连之间选择地形埋伏，战斗打响后及时向敌冲锋。开火时机：敌从北面来由钢铁连掌握，从南来则由飞虎连掌握。团部指挥位置就在从粟坑来那条小路南面的小山上，以号音为联络信号。

一个歼灭敌人的天罗地网，就这样在挂牌迳张开了。

这时趁待命休息的指战员，正把早晨用口盅装来的饭，一口一口地吃着。指战员知道今天有仗打了，就你一言，我一语，一边走、一边嚷，都表示只要敌人进来，决心全部把他消灭，不能让敌人跑掉。

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灿烂的阳光洒向雨后的青山是那么温和、清新而宁静，在阵地上，大家都在贪婪地一口一口地呼吸着这清新的空气，并屏着喘息，静静地迅速地爬到每个人的阵地上，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一场战斗。

敌搜索班在迳口东侧的山顶上用望远镜向北面的山头搜索了好一会，并发出可以前进的讯号后，大队敌人就在营长

彭焕南的率领下向北涌来，这时大概是八点左右。

敌人的前部进入我之伏击圈后，他们的一个士兵突然离开队伍，跑到溪边喝水，我埋伏在溪边树丛后的一个战士被他发现了，当即惊叫“土匪！土匪！”的往回跑，我们的勇士当即朝他背后一枪，让他首先向“死神”报到去了，威震敌胆的挂牌逐战斗就这样开始了。飞虎连六挺轻机枪象雄狮一样怒吼，子弹雨点般地洒向敌群，二、三十个敌人已横七竖八地倒在路上和溪边，其余的正乱作一团，象丧家之犬在狭长的逐上乱窜乱钻，找寻掩藏之地。杜国栋团长令吹冲锋号，汤山政委立即到前沿飞虎连指挥战斗。各连的突击队立即向敌人冲去；飞虎连一个排立即把阵地向南延伸，截击那些还没有完全进入我伏击圈的敌人。

向北窜去之敌约二十人，正好与铁鹰连排长胡雄率领的突击队相遇，被我毙伤近十人后仍在连长指挥下作困兽斗；我手枪队长胡灼华率突击队冲过来后，他们互相配合，利用每颗树的掩护，占领了右侧的斜坡，居高临下向敌开火，敌在我之夹击下被迫放下武器，残存的几个向南逃命，亦被我追击歼灭。

在我火力威胁下，逃进西边山窝里之敌约百余人，在营长的指挥下占据一个小坡，负隅顽抗，使我之突击队被阻在一条山沟里。汤山政委纵观战场情况，为了尽快歼灭这股残敌，决定把突击队统一起来归飞虎连长邱振英指挥，同时增加突击力量。邱连长指挥排长赵瑞珍，副排长杨兆太率一路由南向北打；副排长林会柱率一路由北向南打；他自己带领陈寿、石省两个同志，各配手榴弹四个，冲锋枪一支，在南北两路火力掩护下，利用草丛掩蔽从中间接敌，在距敌十米处向敌投出七、八个手榴弹，趁浓烟掩护一跃而上，占领了

小坡，敌被迫缩向山窝底，在我密集火力扫射下，敌营长彭焕南被击毙，这股敌人乃被全歼。

敌的殿后部队，因该地段我火力较小，涌进西边另一山沟里企图冲击我铁鹰连二排阵地，被我击退后，改向二排南面一座山头冲去。这座山头我们没有部署兵力，如果被敌占领，我们便被置于敌的火力之下。铁鹰连长叶明辉意识到抢占这座山头对确保战斗全胜的重要，立即指挥连队冲去，与敌拚抢山头。副连长叶群普立即举起手中的驳壳枪，指着南面这座山头果断地指挥：“跟我来，往前冲！”带着二排和一、二排部分指战员，飞奔而去。这是多么紧张而又惊心动魄的一幕呀！敌人是从山下往上爬，我们是从山腰冲杀过去，当我们到达山顶时，两个敌人也到了。冲在最前面的黄启明同志立即举枪迎击，叶群普副连长跟着一轮快掣，敌重机枪手应声倒地，两个弹药兵当了俘虏，杨平同志立刻冲出去把重机枪缴获了。这时二十多个快到山顶的敌人，在我迅猛的勇士面前，有的乖乖地举起双手，有几个滚到山窝里去，顽抗的残敌处在我们上下的夹击中，我们立即开展政治攻势：“缴枪不杀”的喊声响彻山谷。许多敌人把枪放下来了，少数仍作困兽之斗。班长许成初和战士张友同志，就在这最后的搏斗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面对山窝里这二十来个顽抗的敌人，班长何辉在战友的掩护下冲向前去，一轮大刀，敌人的机枪打哑了，两挺机枪被我缴获，山窝里的残敌就这样被我全歼。

整个战斗过程不到一小时，便以我之胜利而告终。

烟岭之敌，闻接应他们的友军被歼，恐慌万状，当晚由山间小道仓惶逃回石角。

这次战斗，歼灭敌九十一师二七二团一个营的大部分，

毙伤俘敌营长彭焕南以下二百多人，缴获美国新装备的三〇式武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六挺，炮两门，步枪百余支，弹药一大批。我仅牺牲战士两人。

挂牌战斗胜利后，翁江地委决定在迳头成立佛冈县军管会，并全部收缴了地主宗族势力控制的各种轻重武器两百多支，加强了佛冈地方革命武装力量。这时，国民党驻石角的军警和县政府，闻风丧胆，龟缩城内，不敢出战。和佛冈比邻的新丰、连平等县的反动政权，也惶惶不可终日。

根据这种有利形势，地委决定趁势解放新丰县城，命令四团调回新丰沙田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新丰县，在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曾给我军活捉过三个县长。现任县长陈中瑞听到国民党九十一师王牌部队在挂牌被歼的消息后，坐立不安，其心腹保安营长陈德卿也很恐慌。正在这时，香港分局派来与陈德卿共过事的一位民主人士侯和来我区配合做策反工作。我军派出政治干部廖方明和侯和一起潜入新丰城做陈德卿的工作。经过工作，发现陈中瑞施用拖延战术不愿投降起义。支队司令部决定用军事政治齐攻的办法，解放新丰城。六月十一日，主力四团由支队政委邓楚白指挥，直扑新丰县城，在北一支一团，东二支二团的配合下，迅速把县城包围起来，战斗了二天二晚，逐个占领了敌人的山头碉堡。陈中瑞眼看大势已去，十二日晚，才让人打着白旗向我军投降。这一战役共缴获轻重机枪六挺，长短枪五百余支。新丰县解放后，随即成立了军管会。连平县长黄伯强眼看新丰城被我解放，随之弃城而逃。东二支二团也接管了连平县城。新丰和连平解放后，北江和东江解放区便接连起来。我支队胜利地完成了粤赣湘边纵队下达的粉碎敌人清剿计划，把东江、北江解放区连成一片的战略任务，为

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广东创造了有利条件。八月人民解放军已解放江西全省，叶剑英同志在赣州召开了赣州会议，制定进军广东的计划。翁江地区即全面进行准备，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广东的工作。九月初，我率主力五团到江西大吉山和人民解放军48军先头部队会师，九月十六日配合48军某团解放了翁源。接着44军43军等部队从赣南分两路向广东进军，路经大庾、信丰，在北江第二支队、连江支队配合下，解放韶关、英德、清远等县。路经虔南在北江第一支队配合下，解放了翁源、英东、佛冈等县区。十月解放广州。

会师韶关 解放连阳

周 明

一九四九年九月，靠近广东边境的江西赣州已经解放。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在赣州召开会议，决定进军广东，并对解放全广东作了全面的军事部署和提出了解放广东后大政方针、政策。广东全省解放即将到来，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

当时连县一带的敌人都已龟缩到连县县城、星子、东陂、三江等较大的圩镇，妄图固守，他们已陷入我连江支队及广大武装民兵的海洋之中，成为瓮中之鳖。

我连江支队主力部队一、二、八团、七团、十团，从湖南回来，均集中在连县待命，考虑采取行动。正在这时，送来粤赣湘边纵副司令员、华南分局驻韶关代表黄松坚，要我们立刻到韶关待命的命令，司令部研究了如何执行到韶关的命令。经过商讨决定主力部队一、二、八团随司令部去韶关，七团、十团留在连县坚持斗争，五团在阳山，六团在英（德）乳（源），他们的任务是加强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工作，加紧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孤立敌人，加强武工队活动，刺探敌情，监视敌人，筹备粮食，加强配合大军解放连阳的各种准备工作，特别是支前工作。

韶关是十日七日解放的，十一日司令部率主力部队从连

县的西山到东山大路边，经宜章的黄沙堡、笆篱堡进入乳源的思茅坪，在出水岩石山区，遭到国民党乳源县县长廖仲民率领的县自卫队、警察队、乡卫队等数百人，扼守住出水岩的石山坳，把我队前进的道路封堵住。这一带都是石山，一条路通向一个山控，扼守住山坳，单边路，要冲又冲不过去，硬冲又损失太大。当时我们没有大炮，仅有掷弹筒是无济于事。敌人老是不退，我千多人被堵在思茅坪，看看粮食快食光了，怎么办？参谋处派出侦察小组对整个山势地形道路进行细致的侦察，找到了从敌人的侧后打击敌人的作战方案。但迂回到敌人的侧后，根本没有路，只能偷偷的攀爬上很高的石山，越过许多悬崖峭壁，从无路中走出路来，还不能让敌人发觉，唯有这样，才能从侧后与从正面夹击敌人，把敌人打掉，大部队才能通过。为此，命令一个小鬼班、一个机枪班，轻装爬上敌人侧后的一座石山，选好最能打击敌人的阵地，踞高临下，集中把步机枪火力，首先打掉守坳的敌人，敌人发觉他的侧后方有我部队打他，大吃一惊，弃坳逃走，我正面部队乘机抢占了山坳，再一轮火力，打得敌人鸡飞狗走，狼狈逃命。我部队从出水岩直追到大桥，在大桥住了一晚，经罗村坪到了乳源城，会见了新上任的县委领导同志，我主力部队奉命驻在乳源城的南岸。

乳源县城是十月十日解放的，十月八日南下大军四野四十三军路过九仙洞进入江湾游击区，连支六团谢民、聂玉武工队与大军在江湾会师，晚上开联欢晚会。在白竹地区活动的杨博武工队，获悉大军已进入江湾，立即赶到江湾与谢民武工队会合，继续筹集粮食支援南下大军。这部分大军没有在江湾久留，翌日即继续南下追击南逃的敌人。我武工队送走从江湾继续追击南逃敌人这部份解放军之后，随即开赴九

仙大溪洞，接报告：有部分大军从曲江重阳经过乳源城、侯公渡。在此之前，乳源县城国民党军政人员已闻风先逃。杨博与谢民武工队五十多人于十月十日沿小溪洞开进乳源城，经过洲街，渡过乳源河，直入县府，四处搜索，空无一人，既不见国民党兵，也不见我南下大军，情况不明，当天下午，我武工队开往云门洞监视县城，待机行动。

十二日，中共北江地委，派县委书记吴新民、副书记丁兆诚、副县长邝哲民、支前司令部参谋长潘达，率四野四十八军一个连，前来接管乳源县城，我武工队亦随即返回县城，受到新委任的乳源县党政领导干部的热情接待，从此乳源县城就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十月十一日，连支六团文丹、何健生武工队在平治洞同大军会师，巫泽南、巫耀增武工队在石霞同大军会师，十月十三日，文丹、何健生、巫耀增武工队会合，随大军南下，解放浣洸镇。梁猛熊联防大队狼狈逃走，我武工队在浣洸十字街缴机枪三挺，长短枪一批。浣洸解放后，该镇地下党支部书记杨锡柱和张锡勤率领当地的党、团员、店员，负起保卫浣洸维持治安的任务，接着，周平、巫大杰、曾庆等同志带主力连和赖明威、李芳志、欧赞、王诚、杜相、李学林等武工队，都到了浣洸。

十月十日南下大军四十三军一部经横石圻，向英德县城进军，我横石圻谢石模武工队为大军引路，连支四团和北一支部分队伍配合大军解放了英德城，随即协同大军，布告安民，维持县城治安秩序，为大军筹办了近二十万斤粮食，运到英德城以济军需。

十月十五日，我支队几位主要领导人奉命到韶关，会见粤赣湘边纵副司令员、中共华南分局驻北江代表黄松坚，北江

地委书记伍晋南，他们向我们传达了赣州会议精神，我们汇报小北江地区的情况，黄、伍要我们部队在乳源休整一段时间，将主力部队改编为北江军分区的正规部队，更换武器，加强装备，为解放连阳做好准备。

我们还会见了刚成立的北江军分区司令员黄业、副政委袁鉴文、参谋长黄云波，商谈了连江支队的改编与加强装备，为解放连阳做好准备问题。

关于整编问题谈过许多次，首先是我们会报支队的编制人员武器装备给养和队伍分布情况，依照当时整个支队的实际情况，北红军分区决定再从各个团抽调力量和主力团合编成华南军区北江军分区第十二团下属三个营，一个机枪连，一个警通连，一个宣传队，一个卫生队。由戴耀任团长，吕广先为副团长，蔡雄任政委，牟政节任副政委、康正德任政治部主任，梁础任副参谋长，另将连支四团和六团的一部分，整编为北江军分区暂编第三团，由王式培任团长兼政委，为解放连阳各地作准备。另有连支三团、五团、七团、十团，未编入军分区十二团的，均保留连支原番号留在原驻地加紧作解放连阳的准备工作，候解放连阳后再作调整。连阳解放后，这些当时未及整编的队伍，大部改编为县大队、县公安队，还有相当一部分调到各县做地方工作，广西的干部大多调华南分局分配回广西工作。

十二团整编完毕，加强了装备，穿上了新军装，参加韶关会师大会，开往乳源集训待命。

在韶关期间，我们还会见了南下大军四十八军的军长、政委、和参谋长，我们汇报了连阳敌人的兵力情况和我们支队的兵力与活动情况，初步交换了解放连阳的作战方针与军事部署。

正在此时，连县送来情报，敌交警四个总队共一万多人，分别驻在宜章、临武、兰山、江华、连县、连山等地，光连县大路边村就驻有敌交警一千二百多人。敌交警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掌握控制的特种部队，全部美式装备，十分顽固反动，从未挨过我解放大军的打击，一向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从缴获敌人的有关文件获悉，这批交警退到这一带，妄图在湘粤桂边区建立根据地作垂死挣扎。他们对我游击区的据点，妄图以填空格的战术加以占领，把我游击队分割开来，使我陷于孤立然后歼灭之，其阴谋十分毒辣，这批交警还保持和他的上级电讯联系，当时还派敌机空投物资接济这批敌人。面对这批敌人大量退到连县，连县的地方反动武装又猖獗起来，连县的反动头子李楚赢等，以为有交警撑腰，可以对我游击区进行报复。当我支队主力开赴韶关不久，何诗迪、成仕选等地方反动头子，从连州率领敌军数百人，进攻我游击区清江村，我留守部队十团的一部份与敌接火，交战约两小时，鉴于敌强我弱，离我主力又远，不宜与敌人硬拼，于是主动撤出战斗，转移到星子的东山地区活动。我十团主力撤离清江后，仅留少数武工队和民兵在西山地区继续活动，敌人扑不到我主力部队，不久撤回连州。

十团三个主力连，由西山转到东山，从金坪山出发，向坪石方向转进，估计大军可能已到坪石，意图与大军取得联系。当我队伍到达宜章境的茨菇岭时，发现敌交警在山下一村庄抢劫村民的财物，我十团战士立即停止行进，选择好有利地形，向敌展开射击，战斗约一小时，毙伤敌人十多名，敌人惶惶溃逃，我部队也折回宜章的笠头洞山区驻防。十一月四日获悉，南下大军已进驻宜章的黄沙堡，立即派副教导员成崇仕、指导员成来凤前去联系，受到大军的热烈欢迎。

当时进驻黄沙堡的大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陈赓部一个师部和一个团，我十团团长兼政委闻得喜讯，便星夜带队伍到黄沙堡同大军会师，向大军师部汇报了连县大路边的敌情。师部听了汇报，提出立即集合队伍准备奔袭占据连县大路边村的交警部队，双方商定：大军一个营从大路边北面发起主攻，连支十团控制大路边村前面的红磊顶制高点，从正面牵制敌人，阻止敌人向南逃窜。计划聚而歼之，战斗方案研究完毕，就星夜出发，黎明前到达目的地。战斗先从大路边村北面打响，枪炮声大作，激战正在开始——大路边是一条很大的村庄，周围筑有较高的围墙，当时大军没有带攻坚炮和炸药包，又没有爬墙梯，采取人梯爬墙冲击，反复多次均被敌人击退，伤亡很大，我军处于不利地位，于是决定暂停攻城，只能火力牵制，立即派人回黄沙堡调部队和攻坚武器，敌人趁机从村前冲击，部分兵力占领了红磊顶北面的细奇冲山头，并向红磊顶发起猛攻。当敌人冲出大路边村外时，我十团战士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火力猛烈扫射杀伤许多敌人，但敌人的火力甚强，敌依靠强大火力抢占了细奇冲山头，十团仍顽强战斗，坚守红磊顶阵地。而敌人马上把火力转向我红磊顶，用密集火力压得我部队战士连头也抬不起来，企图冲占我红磊顶高地，另一方面敌增加兵力迂回到红磊顶侧后，下午三时左右敌人已迫近我红磊顶指挥阵地。在十分危急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还考虑到我部队已从天亮打到下午三点，已起到牵制敌人，杀伤敌人的作用，不宜硬拼下去，于是从红磊顶撤退下来，到大圪村向大军指挥部报告。大军接报后，立即通知驻黄沙堡的部队增援，晚上七点增援部队赶到，在当地民兵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大军立即开动大炮、机枪等轻重武器，再度向敌人发起猛攻，

被敌人夺去的两个山头又重新被我大军夺了回来。这时已是晚上九点钟，战斗暂时停了下来，准备天亮再打。这一仗把敌人打怕了。深夜，敌利用村边一条坑冲偷偷溜走了，我二野部队由于有新的任务，也撤离了战场，继续南下穷追残敌去了。

大路边这一仗，是连江支队一个团第一次和第二野战军配合作战，也是连支建队以来一个团第一次参加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共毙伤敌人一百多人，俘获被打散的敌兵一批，我大军部队和地方部队也牺牲三十多人，负伤四、五十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二野部队送了一大批武器装备给十团。

大路边战斗的战报传到韶关，大家对连阳的解放更加关切。此时，作为连支最初的根据地也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以后粤桂湘边纵常驻地区的清远县城，于十月十二日宣告解放了。是日二野四兵团十五军追敌至源潭，击溃敌三十九军四个团，同日二野十四军击溃敌十三兵团二十三军的二一一和二一三两个师，解放了清远县城。当日，连支三团附城独立中队和城工组由黄日、朱志明带队随大军入城，开展支前和维护社会治安工作。这天下午中共粤桂湘边区工委书记梁嘉带领连支三团在回兰歼灭逃敌六十三军一个营，俘敌副营长以下官兵六十八人，缴获轻机枪六挺，其他武器弹药一批，于是日黄昏进入清远县城。第二天，四十三军政治部主任接见了梁嘉和苏陶同志，并向他们介绍了当前形势，要求地方部队迅速成立地方政权，尽快做好接管地方的各项工作。十五日在梁嘉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以苏陶为主任、冯华为副主任的“清远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全力开展支前工作。

到此时为止，连江支队所辖地区的各个县城，除连阳四

属外，已大部解放。形势的发展大大加快了解放连阳的步伐，解放连阳的作战方案已经驻韶关的四野四十八军和华南军区北江军分区同意批准。为了统一指挥解放连阳这一战役，决定由四十八军一四三师王中军参谋长、吕琳政治部主任，和我组成解放连阳前线指挥小组，这个小组研究了连阳的敌情，和解放连阳的作战部署。

连阳，又叫连阳四属，就是连县、阳山、连南、连山。当时敌人在连阳的兵力有从坪石退下来的第十七交警总队二千多人，广东保安队十七团三百多人，敌六十三军残部敌保安四师第七团残部三百多人，县警察队、护航队、乡卫队共二三百人，阳山县保警队三四百人，敌人在整个连阳地区的兵力东凑西凑加起来估计约有三千多人，除交警的装备较精良，战斗力较强外，其余部分，有的是残兵败将，还有的是在乡下站不住脚逃到连县来的各乡乡卫队，都是东凑西凑的乌合之众。敌人只有这么一丁点力量，在大势已去、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顽抗到底？早在我向连阳进军之前，我们已派人送信去连县阳山劝李楚赢、李谨彪投降，他们顽固拒绝了。为什么他们这么顽固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样，顽固的只是一小撮，特别是他的头头李楚赢。李楚赢顽固到底，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李楚赢原来是国民党忠心耿耿的一员反共猛将，曾任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在解放战争中，该集团军被我解放军包围歼灭，他不服输，只身化装逃回老家——连县三江。又重新穿上反共的军衣，一九四八年间出任连县县长、反共救国军第九军军长，一九四九年七月任第五行政督察区（即连阳四县）专员兼保安司令。他明知蒋军已全部覆灭，广州已经解放，人民胜利的大局已定，但他对国民党反动军队卷土重来，和爆发第三

次世界大战，存在很大的幻想；对灭共复国的迷梦还不死心，他认为国军（指国民党的中央军）的失败是暂时的，“国军”还有力量，一定能够卷土重来；还认为第三次世界很快就爆发，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即使“国军”无力反攻，美英法等盟军也会帮助“国军”打回来。那时他就可以当一个大名鼎鼎的反共复国的英雄了。他还不自量力的认为：连阳地区还可以拼凑一支四、五千人的武装部队，又有退下来的交通警察二千多人、广东保安部队第十七团二三百人，后面有桂系支持，上边又有国民党国防部次长李及兰（阳山人）撑腰，只要守住连阳，建立起五岭根据地，不单交警要来投奔接受指挥，隐藏在各地的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残兵败将也大多会前来归附，反共复国的力量就将一天天大起来。李楚赢在这幻梦般的思想操持下，他极其顽固地与我游击队对抗、残酷的镇压人民，迫害游击队员的家属，逮捕同情我们的积极分子和进步民主人士。他还把四县的党政机关纳入战时体制，强制所有党政官员及部分学校师生编成部队，一律过战时生活，准备强迫这些人替他当炮灰，强制别人为他作垂死挣扎的工具。我们研究了连阳敌人的实力、装备、分布状况及其统帅的历史、出身、心理状态，认识其反动性、顽固性、残暴性及其弱点。估计战斗打响，敌人因县城无险可守会弃城上山，一是跑上瑶山凭险据守，一是经鹿鸣关进入连山保存实力，建立他的所谓五岭根据地与我长期对抗，或者是经连山入广西和桂系的残兵败将勾结起来。根据这一分析估计，决定采取如下的作战方针与作战部署：攻击的主要目标是集结在连县与三江的敌人的首脑部，首先要歼灭敌人的首脑部。采取分路分头并进，将敌人逃进瑶山或连山的道路堵死，将其合围于三江小平原、然后以优势兵力彻底、干净、全部歼

灭其有生力量、免留后患。根据这一作战方针决定分北、中、南三路向连阳进军；北路以四十八军一四三师四八八团为主力，以尚未改编的连江支队七团配合，从宜章黄沙堡经周家岱、天光山、黄洞山，直插东陂。消灭东陂守敌后，直插三江后背山，把守住鹿鸣关，堵住敌人窜进连山的道路，然后相机围歼敌人，解放三江；中路以连江支队主力团改编的北江军分区十二团为主力，四二八团一个警卫连和尚未改编的连江支队第十团（已在连县）相配合，中路主力从坪石经大路边与十团会合，直扑星子，歼灭星子守敌后，迅速包围攻击连州城。如敌人弃城逃窜，要立即跟踪追击，务必将其主力加以歼灭。南路以一四三师四二九团两个营为主力，从英德到阳山，与连支五团会合，经大朗、黎埠插到三江之南，堵住敌人窜上瑶山的道路，然后三路合围，聚歼敌人于连州与三江之间。歼灭敌人主力后，由四二八团及连支七团派兵力解放连山。另派由连江支队四团、六团改编的北江军分区暂编第三团及连江支队老三团，共同担负歼灭英德大湾和阳山县城之敌，最后解放全连阳。

解放连阳作战部署制定后，指挥小组立即命令各部队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并通令在原地战斗的尚未改编的几个团武工队、民兵做好支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十一月底，解放连阳指挥小组，再一次向盘踞连阳的李楚赢、李谨彪发布命令敦促他们立即弃暗投明、放下武器，接受改编。敌人漠视我们的严正劝告，拒绝放下装器。指挥小组决定按预定的战斗部署对敌发起进攻。

十二月五日，四二八团及连支七团，在宜章黄沙堡会师后，从黄沙堡出发经周家岱到天光山后，兵分两路，一路直奔东陂，另一路由黄振、黄雄、吴年率领七团两个连配合大

军一个营从天光山经相木冲到达黄山洞，获悉梁家水村驻有从前线退下来的交警六七百人，不消灭这股敌人就不能继续向前推进，于是决定先吃掉这股敌人，为继续前进扫清道路。

梁家水是一座依山傍水的村庄，村的东、西、北环山，南面是一片田野，小河从村的东边流过，村内有座大祠堂，是交警二总队队部所在地。村的东、西、北三面都建有炮楼，形成交叉的火力网，在村后岗的密林中，还有敌兵驻守，居高临下地控制全村。

分析了敌情，决定分三路围歼敌人：一路从岩塘背南下，迂回到龙形洞，切断敌人西逃之路，由四二八团派赵廷贵副连长带一个连，七团派黄雄带一个排协同作战；一路由仙人岭脚从东面包围梁家水，由四二八团派一个连担任；一路是从北面岩塘桥头沿着河边小沟头水沿公路分两路纵队直扑梁家水村。担任正面主攻、由四二八团刘副团长指挥、七团黄振同志协助，兵力由四二八团一个连，七团两个排组成。

部队出发后，西路部队在飞鼠洞首先同敌人后卫接上火，经半小时激烈战斗，打垮了顽敌，占领了龙形洞。在战斗中赵副连长英勇牺牲。接着正面部队以猛烈攻势打垮了正在吃饭的敌人警戒排后，迅速从西、北、东三面对敌形成包围圈，于下午二时四十五分发起总攻，敌人垂死顽抗，直到傍晚，我们才攻入北门巷和河边街，拿下南炮楼。这时以祠堂东侧的小河为界，敌我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天黑以后，我们的指战员在左臂上缠上白毛巾为标志，发挥夜战、近战的本领，同敌人展开巷战，最后把敌人分割在几个狭窄的阵地上，并切断了敌指挥机关同各个阵地的联系。随即展开政治攻势，在阵地上喊话，向敌人指挥机关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半小时之内全部缴械投降。与此同时，从群众中找来大量的辣椒粉

和石灰，包扎在手榴弹上，不时投入敌指挥机关的大祠堂内，熏得他们的老婆、孩子哭爹叫娘。七日凌晨一时，敌指挥机关从窗口竖出一面白旗，表示无条件投降。各个据点还在顽抗的敌人，得悉总部已经投降的消息，也全部放下了武器，战斗宣告结束。老百姓家家户户点亮油灯，打扫战场进行善后工作。

这场战斗、毙伤敌二百多人，俘总队上校队长兼政工主任李学忠以下四百四十余人，缴获轻重机枪三十五挺，炮两门、卡宾枪及其他长短枪共五百余支、电台两部，敌人散失在战场上的武器弹药、事后为群众拾获缴交给我新组建的区乡政府。

战斗中，我方牺牲二十二人，其中副连长一人，排长三人，班长二人，战斗结束的当天下午，就在当地召开追悼会，将烈士的忠骨安葬在边门岭。

在歼灭梁家水驻敌的前两天，四二八团和七团主力，经天光山出洛阳，向东陂镇推进时，沿途敌乡卫队和保警队三中队共九十多人枪，被我俘虏缴械，我乘胜前进。当我前头部队进入东陂镇内控制了邮电总机，发出信号，驻守东陂镇的敌人立即向连州逃窜。七团除留下少数部队及武工队与民兵一起驻守东陂外，其余大部份协同大军四二八团，于同日经西岸向三江推进，于傍晚解放了三江。中路军，原定于六日半夜从东南西北四面包围星子镇，七日凌晨发起攻击，由于负责攻打镇南的部队受阻，未能及时进入阵地，当约定发起攻击的时间一到，东西北三面同时向镇内冲击。敌闻枪声未敢抵抗，即从南面仓惶逃窜，只有驻四甲城炮楼之自卫队一个班未及逃跑，不时向外打枪。为跟踪追击南逃之敌，大部队立即向连州方向追去，四甲城碉堡之敌交由十团留下部份

力量把碉楼炸开。手枪组立即冲进把顽抗的敌人击毙，未死的只有两个，当了俘虏。

是晚，中路部队从东北三面包围了连州城，准备凌晨发起攻击，但敌人早已获悉三江被我占领，当日晚，在我围城部队到达前（七日晚九时）率党政官员、交警队、护航队、便衣队等七百多人，从连州镇南门渡河经乱窰岗、九陂向黎埠逃窜，当时我南路进击部队尚未赶到。我中路进击部队进入连州镇发觉敌人已经撤走，估计尚未走远，于是用急行军步伐向黎埠跟踪追击。敌人意料不到我部队这么快就追到来，立即展开战斗，在我大军猛烈冲击下，敌人不支，李楚赢带了随从部队百多人向瑶山逃走，其大部队失去主帅，无心恋战，部分溃散，部份当了俘虏。

南路进击部队四二九团及连支五团的两个连，在北江军分区参谋长黄云波率领下，四日从英德出发，经浛洺、大湾、青莲、水口，向黎埠进击，计划于七日到达三江，因途中受阻，九日才到达黎埠、寨岗，此时敌人的大部，已为从连州追来的大军击溃俘虏。李楚赢带了亲信部队百多人，逃进瑶山的南岗瑶排。十日凌晨，我南路军向南岗瑶排奔袭，进至南岗和猪屎洞之间，发现李楚赢率部从南岗方向窜来，立即展开战斗，不到半小时敌大部就歼，李楚赢却化装藏于附近的山洞，这时从南岗追来的十二团二营等部也已赶到战斗地点，二营马上组织搜山、终于在瑶胞房大猪六的指引下把李楚赢捉获。

四二八团与连支七团解放三江后，向连山进军，三江防地交由十二团接管，于十二月九日解放了连山县城。

在英德、阳山方面，十二月七日在北江军分区暂编第三团的进迫下，英德反共救国军驻西牛一个中队一百多人宣布

投诚。九日，暂编新三团和六团的一部解放和接收了大湾、十日，敌驻青莲反共救国军团长陈子模率领团一部投诚，收缴武器一批。

十四日连江支队第三团、第五团，及暂编三团各一部解放了阳山县城、反共救国军成家球中队六十多人投降，收缴轻机二挺，长短枪四十多支，弹药一批，反动的阳山县长李谨彪化装潜逃。

至此，连阳四属全面彻底解放。这场战斗共歼敌：活捉广东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反共救国军第九军军长，保安司令兼连县县长李楚赢、国民党连县党部书记长成仕选，连南县县长陈国良以下共三千多人，交警一千多人、缴获轻重机枪四十多挺，炮十多门，卡宾枪冲锋枪数百支，长短枪二千余支，军用物资一大批。

至此，粤湘边区各县连江流域全境完全彻底解放，连江支队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神圣职责，掀开了粤湘边区和连江流域各县人民历史新的一页。掀开新的一页，历尽了千难万苦，人民群众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我不少解放军指战员、游击战士，在战争中英勇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原连江支队司令员冯光同志，也在激烈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当欢庆建国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先烈，追忆往事，谨将会师韶关解放连阳这一历程和烈士们的英雄业绩，以文字记录下来，以志不忘。

为人民解放事业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一九八九年五月于广州

在粤赣湘边战斗的岁月

黄 业

编者按：黄业同志是原广东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二支队司令员，著有《巍巍五岭》长篇回忆录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现经作者作了适当修改补充，同意将其中第九《杜鹃花开》和第十《迎接大军》两章在本刊纪念建国40周年专辑刊登。这篇文章的总标题是我们加的。

杜 鹃 花 开

到 分 局 去

一九四八年九月间，我根据地正遭到摧残破坏，斗争暂时处于困难的时刻，我带了机关和部分主力到了仁化县的洛洞地区。这里靠着湖南，便于集结部队，准备组织力量向敌人反击。这时候，我突然生病了，腹部剧痛，发高烧，经医生诊断，是患了阑尾炎，可能要动手术。但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部队里是根本没有这个条件的。经同志们劝说，地委同意，我决定到香港住院治疗。

虽然是暂时离别同志们和这熟悉的山区，也难免产生依依不舍之情，特别是责任在身，实在感到离不开。建华从油山赶来看我，要我尽快设法出去治疗。我们把工作商量后，

在一个沉寂的夜晚，我就和同志们告别登程了。

机关警卫排长李生贵同志担忧着我的病情，率领警卫排，用担架护送我到了湘南汝城县的大坪村。李康寿同志这时正在汝城地区活动，他和汝城县委取得了联系，商议了送我出去的问题。汝城县委委托地下党员朱亚林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安排了路程和对付敌人的办法，还给我搞了一张仁化县一间中学的教师证件，化名林德全。穿上地方党同志送来的那套深灰色斜纹布中山装，加上我当时患病消瘦的身躯，倒也似一位文弱书生了。

朱亚林同志领着我走了两天崎岖的山路，在一个夕阳西照的傍晚，安全到达乐昌县城坪石。按照事先的安排，住在一家木头结构的湖南式的客栈里。店里黄老板是朱亚林的同乡，有六十岁左右的年纪了，周到地把我们安顿下来。这一晚我用大木盆，好好地洗了个温水澡，感到很舒服。第二天坐上了在坪石停站的火车，直奔广州，下午转车到了九龙。

按照联络的办法，我顺利地找到了香港分局机关。同志们热情欢迎我这个从前线归来的战士，很关心我的病情，办理好了手续，很快就把我送进了医院。当我做切除阑尾手术期间，分局机关阮古明、李文等同志经常来医院看望，转达了分局书记方方同志对我的关怀和慰问，使我感到非常亲切和温暖。

不到半个月，我病愈从医院回到分局机关，分局的同志们要我住下来休养，趁此机会多看点文件。

在分局机关住了没有几天，方方同志在他的住所接见欧初同志和我。欧初同志当时是粤中支队的司令员，他是来分局汇报工作的。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虽是腊月时节，但也不感到寒冷。方方同志在门口迎接我们，在客厅坐下以后就

谈了起来，他说话略带潮汕口音，缓慢清晰。

“这两年多过的真不容易呀，但过得很好！你们回去后替分局问候部队同志们。”

“感谢分局，回去我们一定转达。初留下坚持时，我们还想不到形势发展这么快！”

“是的，形势很好，现在已到了转折关头，我军转入反攻的时候了！”

“南下大军快要渡过长江，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老大哥！”

“对的，回去要很好地部署一下，多打胜仗，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过几天分局还要开会研究这个问题。……”

我和欧初同志屏着气，静静地聆听方方同志对形势的分析和迎接南下大军的工作部署。他精神饱满，情绪很好，谈起话来既随和又明确。我们也毫不拘束地提问一些问题，他都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准备告辞，苏蕙同志热情地挽留我们在一起吃了早饭才离开。

一九四九年春节后，分局召开学习会议。各个地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到了，我和张华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全国解放战争发展急转直下，解放南方的战役即将揭幕的形势下，这次会议不用说是十分重要的。一种兴奋愉快，满怀信心的气氛充满会场，好象办什么喜事似的。方方同志主持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华南党的工作问题》的重要报告，传达了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发展的形势；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军队，依靠群众，组织群众，迅速扩大主力部队，开展春季攻势，多打胜仗，全面发展，重点巩固，搞好大块根据地的建设，积极做好配合南下大军作战，完成支前任务的准备工作。

一个新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在等待我们去完成，一种伟大的胜利前景在鼓舞着我们。我与张华同志归心似箭，急于返回五岭，传达贯彻分局学习会议精神，部署迎接和配合南下大军的新的战斗任务。

为了安全起见，我和张华同志分路而回。同志们看见我健康归来，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不用说有多么的高兴了。我特地带回了三千片扑疟母星，山区里疟疾流行，这是部队所急需的药品，但最重要的还是带回了分局的指示，鼓舞人心的胜利消息和那光荣的使命。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是一个明朗的春天，充满了希望的春天！

阳春三月，在油山地区上下坪的笕箕窝召开了支队干部会议，传达了分局工作会议精神和分局领导对我们的具体指示，转达了分局领导对同志们的问候。会上回顾总结了前一段的斗争情况，认真讨论了五岭地区新的斗争部署。

这次会议，我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特点。去冬以来，全国的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特点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空前胜利；北平和平解放；国民党南京政府惶惶不可终日，正在搬迁南逃。在我党领导下的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现在，解放大军正准备横渡长江，向南推进，蒋家王朝，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注定要覆灭了。蒋介石“智囊团”里的要员，所谓“文胆”的陈布雷在自杀时，发出绝望的哀鸣：“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头号战犯蒋介石不得不以“因故不能视事”作幌子，宣告“引退”，推出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但蒋介石这个大阴谋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他躲在浙江奉

化老家，一方面在幕后策划“和谈”，一方面还想重建四百万军队，企图拖延时间同我继续较量。但人民解放军凌厉的进攻，势不可挡。任由蒋介石怎么样工于心计，也难以逃避他覆灭的命运。形势的发展真是比意料的快得多。

在广东方面，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宋子文感到实难支撑，自动下台，作他个人的私逃打算。留下余汉谋接手广州绥署主任（广州行辕已改为广州绥靖公署），薛岳任广东省主席，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敌人虽作这样新的部署，也不过是临死挣扎罢了。早些时，广东的国民党正规军，大部分又抽调了去北方战场，眼下蒋介石为了安排他们南逃之路，正在把残余的一百万部队相继南调两广、湖南、江西、福建，布置他们的最后战场。南京中央政府也在一九四九年二月间“迁穗办公”。在这动荡的情况下，广东敌人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处于慌乱状态。

在会议上，根据华南分局的指示，我们充分地研究了当前全国和广东形势，具体分析了五岭地区的新情况，我们决定抓紧时机，乘敌混乱，集中主力，向五岭平原开展春季攻势。要求部队多打胜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扩大部队，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积极地以实际行动，争取时间，做好迎接和配合南下大军的准备。

全国大好形势的东风，华南分局学习会议的精神，鼓舞了我们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勇气。同志们斗志昂扬，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接连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满怀激情迎接又一次大发展的高潮的到来。

油 山 伏 击

在那春光明媚，五岭山上杜鹃花盛开的时节，我们在全

国解放战争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整顿主力部队，向敌人展开了一个新的攻势，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使五岭地区度过了艰难曲折的阶段，走上了新的胜利的道路。

这时，我们重新组建了一个主力团，由叶昌团、戴耀团和始兴的唐胜标大队三个单位组成，集结于油山附近，支援群众春耕，并随时准备出击。

正在这个时候，地方党的同志来告诉我们，驻在大庾和南雄的保安团近日调动频繁，有进攻油山之势。接到这个消息后，叶昌、戴耀等同志都下决心要打个伏击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大庾和南雄之间，有个地方叫上杨梅龙头山，这上杨梅龙头山，实际是一条狭长的山径，两边高山，中间一条山路。以前我们向平原发展时，它已成为我们的交通要道了。它处在油山脚下的“外山”，是“里山”和平原接壤的半山区，打伏击倒是个理想的地方，敌人如进入伏击圈，两头一封锁，真是兔子也难逃得脱的。如果敌人不用汽车运送而是步行的话，这是必经之路。我们经过反复分析研究，就选择这里打伏击。

这一仗是建华、叶昌和戴耀指挥的。设伏的打援的都分好工，深夜十二时部队各自向大塘方向出发，下半夜三、四点钟全部进入阵地，等待敌人出来。第一天，等了一天，夕阳西下了，还不见敌人出现，晚来的山风有点寒冷，估计敌人晚上是不敢行动的，便将部队撤回休息。到了第二天，还是没有半点动静。直到第三天下午两点多钟，从后边大庾城方向来了一股敌人。因为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部队没有在油山出现，敌人很麻痹，大摇大摆长驱直入，足有一个营的样子。当前头一个连全部进入伏击圈以后，我们即发起攻击。子弹从两面山上居高临下向着山坑射击，我们占

樟树下又叫樟树窝，顾名思义，地形象个口袋。从夹河口进去足有一里多地的险隘山径，迎面一座大山，形成一个袋形的山谷。谷里两边高山，中间一条小河，小河一边靠山，一边比较开阔，有条蜿蜒的山路沿着小河直通谷底。那小河有些地方已被泥沙淤塞，更形成其曲折迂回的态势，河边长着高低不齐密密麻麻的芒草，我们作战部队由邱才、周来、张发等带领，埋伏在两边山坡的芒草丛中。苏权带着他的小鬼班，机灵地钻进夹河口的芒草丛里，准备堵塞敌人的退路。戴耀同志问他：“这个门，你们关不关得紧呀？”苏权大声地回答：“就是老虎，我们都要关住它！”的确，我们这次战斗的决心很大，誓要全歼这股进犯的敌人。我们的指挥部，就设在谷底那大山的脚下，茂密的竹林把我们掩蔽得很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夹河口的一切动静。

果然，上午八点多钟，敌人从大塘那边大摇大摆地朝这边走来，看样子足有一百多人。

敌人走进夹河口的小道，根本没有发现我们。他们的前卫不作搜索，后续部队也就以密集的行军队形走进这狭隘的山沟。等到这一百多人都进了口袋以后，戴耀指挥的机枪咆哮了，跟着整个山谷发起了攻击，两边山坡的战士向沿着河流小路猛烈开火。枪声震撼山谷，山岗上一片“冲呀，杀呀！”的喊声。敌人遭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在埋伏圈内昏头转向，乱作一团。地形于他们不利，无法发挥其优势装备的战斗能力。因而争相跳进河沟，就象一群受惊的野鸭，在水里乱窜乱叫，完全失去了指挥。有些敌人企图向来路突围，又给苏权小鬼班封锁得不能前进一步，只好又回过头来，跳进河沟，利用地形，向我们山岗上猛扫机枪。

这时，我们的战士象一群猛虎跑下山岗，冲下河谷，“缴

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声四起。敌人完全被压倒了，一个个举手投降，有的从河沟爬上来，纷纷放下武器。这个美式装备的“护路队”，不到半个小时就给我们干净、彻底、全部地歼灭了。在这次战斗中，打死打伤敌人四十多名，俘虏他们少校队长以下八十多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七十多支。

这次伏击战，可真是威震南雄，声扬五岭，也是我们五岭地区粉碎敌人重点进攻，从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

奇袭龙口

樟树下伏击战胜利以后，我们当即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进一步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决定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抓紧战机，乘胜前进，从油山打出南雄平原，扩大战果，与始兴方面取得配合，恢复和发展我们的根据地。因此，战斗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们部队便向南雄平原地区推进，拂晓之前进驻了乌径水松村。

水松村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很早便开展了革命活动，是南雄县和信丰县之间公路旁边的一个大村庄。有数百户人家。村里有地下党的组织，有民兵队伍，群众对我们部队十分熟悉。自从一九四八年春天叶肇对我开始重点进攻以来，我们部队向山区转移，只留张定、李方等同志带着小部队在这一带坚持活动。敌人不断向这些老区侵扰，群众受到迫害，天天盼望着自己的队伍回来。现在部队突然回到村子里来，虽然天还没有亮，群众都纷纷起床，点着小油灯，开门迎接亲人。

我们指挥机关住在村中的大祠堂里。天亮不久，村里党支部的同志来谈了一下情况，说近日国民党军队受过我们几次打击以后，缩在据点不大敢出来。但他们的催粮队却经常

到各个村子催粮，强迫老百姓为他们挑谷的事还常有发生。

老房东李大娘，听说部队回来了，赶紧来到祠堂找我们，拉住我们的手，亲亲热热地说：“走，到我家里住去，我们厅下不是空着吗？”我说：“好！大娘，等安排队伍住下后，我们就搬到你家来，还是住在原来的厅下。”李大娘满意地笑了。

“唉！老黄哥呀，这次队伍回来，可不要走了！”李大娘诉苦地说：“这些死鬼联防队，把我们老百姓搞得好苦啊！”

“可不是，催粮、抓丁、捉猪、打鸡，该死的白狗子！”身旁的老乡们你一言，我一语，诉不完的冤屈。

“大伯、大娘，我们这次回来不走了！”我安慰着乡亲们。

“可不是吗？红军走了盼红军，游击队走了盼游击队，真不知盼到什么时候才了结呢！”李大娘的声音有点颤抖了。

“好大娘，这回不单只盼回了游击队，红军也快给乡亲们盼回来了！”我忙接着说，并把解放大军已经过了长江，不久就要解放南方的好消息告诉乡亲们。大家听了十分高兴，欢慰地说：“那就好了，那就好了，我们穷苦人真有出头日子了！”

刚刚吃过早饭，老乡跑来告诉我们：“白狗子又出动来催粮了。”

原来是附近龙溪乡的龙口村，住有敌人一个联防中队和一个自卫中队，这是叶肇重点进攻期间，特地在这里安下的一颗钉子。他们以一部分军官和老兵为骨干，招来了一批兵痞、流氓，又抓了一批壮丁，组成了这两个大杂烩的队伍，共有一百多人，几挺轻机枪。不用说，他们的粮食都摊派在附近几个乡村的老百姓身上了。他们三天两头就来一次。老乡交不起粮，就捉猪牵牛，甚至抓人。老乡们真是受尽其苦了。

我和叶昌到村口去实地观察一下情况，眼前就是一条通向龙口的乡村大路，远处黑压压的一群人正朝这里走来。越走越近，越看越清，走在前面的是一些老乡，有三十多人，多是妇女，挑着箩筐。后面是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肯定是联防队下乡催粮来了，

我们的部队立即作好战斗准备，民兵也忙了起来。周来营长原是个急性子的人，恨不得一口把敌人吞掉，要求派他们部队出去把敌人消灭。

“黄同志，怎么办，放进来吧？”叶昌同志问我。

“看来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对，放他进来，抓活的！”我说。

“好，马上埋伏！”叶昌同志当即布置队伍，埋伏在进村的一条小巷里。群众也进入屋里，村子里顿时鸦雀无声。

敌人果然押着挑粮的妇女进到村子里来，正走进巷子。就在那两边高墙只有一米多宽的小巷里，突然出现了我们英勇的手枪队，带着红绸缨的闪闪发亮的驳壳枪正对着他们，“别动！”“别动！”“缴枪！……”一下子吓得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插翼难飞，七八个人惊惶中举手就擒，里面有个带队的小队长。

俘虏中，有个二十来岁的壮实小伙子，是附近农民被抓来的壮丁。他对国民党的累累罪行，早就愤恨万分，对游击队的英雄事迹，亦早有所闻。我们对俘虏进行教育时，他毫无顾忌地诉说当那联防队的苦楚和不满，诚恳直率地回答我们对龙口情况的询问。最为重要的一个情况是：龙口的敌人听说上下杨梅及樟树下游击队取得胜利以后，把炮楼大门口架在河沟上的木桥改为吊桥，平时吊起来，有事出去才放下，学日本鬼子守据点的样子，以防游击队袭击。这龙口村的地

形有点特别，四周有条小河围住，村门是一座用石头砌成的炮楼，只有一道木桥和大道相连，切断木桥就是一座孤围子。联防队以为有这个地形很好的土围作据点，便十分安全的了。

“我们每次挑粮回去，吊桥才放下来。”青年士兵说。

“我们现在就去，你带路，好吗？”我说。

“不行，他们看见游击队要开枪的。”他说。

“我们有办法，化装！”叶昌同志说。

“如果哨兵问话，你说押粮回来了，就行啦！”我对士兵说。

“那试试看……”士兵也不害怕。

我们又向那小队长反复交代了政策，指出了只有将功赎罪才有出路。他答应给我们带路。

部署完毕，我们的队伍就立即出发，急行军向龙口前进。

化装挑粮妇女的战士，由刘裕安营长率领，周来营长则化装押运队伍的。我和叶昌带着部队，和前头部队保持相当的距离，一路上快步前进。将到龙口村时，封锁了路口，在道旁的山坳里隐蔽起来。

二十多华里的路程，一个多小时就走到了。当我们化装的队伍走到吊桥附近时，哨兵以为是自已人运粮回来了，赶忙放下吊桥，准备放人过桥进村。但当大家正要过桥时，只听炮楼里的敌人喝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走在押运队伍前面的青年士兵用地道的南雄话答道：“运粮的，从水松回来！”

“我们回来啦！”敌小队长也按照我们的布置回答。眼看我们的人已快要跨上桥了，突然炮楼上一个头目，歇斯底里地高声叫喊：“婊子养的，不象我们的人，快拉起吊桥！”

吊桥顷刻间被拉了上去。接着，响起了枪声。我们的前头部队也就当机立断，立刻跃入河沟。幸好河水不深，涉水

二三十步脚，便到了水围脚下，利用死角，迅速接近村门炮楼。爆破手取出预先扎好的炸药包，在同志们的掩护下，把炸药送到了楼门口。

我和叶昌听到枪声，知道前面队伍暴露了，便带领部队跑步前进，向前头部队靠拢，投入战斗。当我们接近时，一声巨响，楼门炸开了，吊桥也同时放下，部队于是象潮水般进入龙口村。前头部队主要解决炮楼上的敌人，后续部队即向村中心进攻。那些以为有了水围保险的敌人，没想到却有“神兵天降”，一时慌了手脚。眼见大军压境，大势已去，又慑于前两天连美式装备的“护路队”都给吃了，他们那杂七杂八的兵丁，又能顶些什么事？只好乖乖地向我投降。

这是我们继一年多以前新田战斗以后，在南雄平原地区又打下的一个地主封建堡垒。这次奇袭，拔除了敌人在南雄平原的一颗钉子，重新解放了龙口地区，消灭了四十多人的联防自卫队，缴获轻机两挺，步枪三十多支，没收了当地反动头子一屋子烟叶。

群众平日恨死了这恶狼饿狗般的联防队，现在云散天开，真是欢喜万分，纷纷奔走相告，热情洋溢，欢天喜地地迎接自己的子弟兵。

激 战 南 亩

南雄平原的南亩圩，是在乌径与龙口之间的一处颇大的圩场集市，有数百户人家，百十来间商号。原来驻了国民党部队，在我们袭击龙口之后，他们见势不妙，连夜撤回南雄城去了。解放龙口以后，我们随即进驻了这个圩场。这样，南雄平原就恢复了一年多以前斗争发展高潮的局面。保安团龟缩在南雄城里，这个山城又变成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了。

我们住在南亩圩，部队稍事休整，补充粮食给养，布告安民，开展群众工作，动员青年参军，扩大队伍。地下党组织和部队的同志都忙了起来。群众受到连续打胜仗的鼓舞，情绪高涨。

敌人是不会甘心就这样失败的。我们估计他们必然还要进行反扑，因此，即又作了准备连续战斗的部署。

果然不出所料，粤北、湘南、赣南的敌人，经过密谋，以驻南雄城的保安团为主力，联合向我进行反扑。这是粤赣湘边区敌人临死挣扎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敌人的主攻方向指南亩圩。

这也正合我们的意图，我们一下还没有攻取南雄城的条件，把敌人引出来打是最好不过的。为了有力地挫败敌人的反扑，我们集结了兵力，陈中夫、吴伯仲、邓文礼、云昌遇等同志也奉命率领始兴部队来到南亩圩，与南雄部队会合。两地部队会合，人强马壮，信心也更足了。

我和建华、中夫等同志一起讨论了这次战斗的计划和部署，决定把部队隐蔽在南亩圩附近的丘陵地带，占领有利地形，在敌人的来路派出小侦察分队，把敌人引进我们的伏击地区，主力部队再突然出击，相机歼灭敌人。

六月中旬的一个中午，南雄出来的敌人同我们始兴部队遭遇了。原来敌人没有走我们预备伏击的那一条大路，而是沿松林小路来，刚好跟我们叶福中队长带领的一个连碰上了，短兵相接，打了起来。

叶福同志是从东江北上五岭，后来又留下坚持的一位同志，是一名年青优秀的军事干部。他作战勇敢，指挥若定，在战士中有威性。因为他出身香港理发工人，有一手好手艺，没有理发工具，只凭卫生员的一把剪刀，也能把你的头发理

得整整齐齐。在战斗间隙空闲，他左右总是围着一群战士，不是要剃胡须，就是要剪头发，他总是乐呵呵地应接不暇。

这次战斗从叶福那儿先打响，他指挥着队伍战斗。为防止敌人向后逃跑，中队长胡亨带了他的第三中队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后续部队也赶了上来，把敌人一个营包围在一个小山上。敌人在山上，指挥陷于混乱，只是一个劲地胡乱放枪。我们迅速地紧缩了包围圈。

我们指挥位置原在南亩圩后面的松林，见到这情况，便带着炮连向战斗打响的山头转移，为使敌人不能突围逃走，我决心动用六〇炮了。因炮弹不多，这两门六〇炮不到关键时刻是不动用的，现在看来非用不可了。我下令打了两炮，都命中敌人密集的山头，给敌人很大杀伤。我们的战士，径直向山头上的敌人猛冲。刘桂明小鬼班，象小老虎一般，活跃在枪林弹雨之中，政治服务员关惠明同志，看见敌人的机枪就眼红了，悄悄地爬到半山腰，抓住敌人的机枪脚架了，准备把敌人的机枪拉下来，哪知敌机枪手是大高个，小个子关惠明哪里够他力气大，而且地形对他也不利，敌人拚命端起机枪，对准他直扫，他受伤了，滚到山脚下。胡亨中队长一边射击一边向敌人大个子机枪手冲去，他右手也被打伤了。班里两挺冲锋枪对准敌人的机枪打，机枪才哑下来。

在山的另一边，勇敢的班长陈志，认准半山腰的敌人一挺机枪，便利用地形的死角，朝着敌人机枪目不转睛地冲上去，一脚踢翻敌人的机枪，收拾了机枪手。副射手想反扑，结果也给他一枪打倒在地，把敌人的机枪夺了过来。

到下午两点时分，这边山头的战斗还没解决，从梅关那边增援的敌人到了。叶昌带了部队在那里阻击敌人。正象我们所预料的，这一路敌人是比较弱的，他们不敢进入平地

区，只占领黄坑西面的高山，在那里放些冷枪，虚张声势，应付差事。

有一股敌人还窜进南亩圩场来，经过激烈的巷战，后来还逐屋凿墙搜索，才把这股敌人肃清。

这次战斗，没有达到伏击的愿望，未能全歼敌人，只杀伤敌一百余人，俘虏二十多人，缴获轻机一挺和一些步枪。战果不大，但给敌人的威胁很大。敌人十分惊慌，连夜收集残部，撤回南雄城。

这次战斗，我们也付出了代价，伤亡十多人。三团的小队长王作明，带领着部队往山头冲击，正在喊“冲呀！”的时候，一张嘴，一颗子弹从他的口腔打入，穿过牙床，从腮部后边出来，幸而没有多大危险。关惠明同志滚下山坑以后，昏倒又爬起，想找个草堆躺一下都不可能，后来被自己人发现才救了出来，经医生检查，发现手臂骨头已被打断，连接不起来了，不得不割掉。但又没有手术刀，曾松就用一把剃头刀小心翼翼地把他左臂割了下来。

叶福中队长，正当他带领部队冲锋的时候，敌人子弹穿过他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把他抬到陂头村时，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只是伤痛和流血过多使他麻木了。当时我们药物也太缺乏，技术条件更不用说，非但不能输血，就连止痛片也没有。

我们几个领导，赶到叶福同志身旁，见他安详地躺在山坡下的草地上面，曾松等几个医务人员正在进行抢救，只见他脸色苍白，两眼微微睁开，好象还有什么话对我们说似的。后来他中队里的三个小队长都到来了，他们跑上前在他面前蹲下，拉住他的手。多年共同战斗，看他伤成这个样子，大家都难过得滴下泪来。叶福同志安详地看着他们，用东江口

音的话对他们亲切地说：“我死了，你们几个小队长要努力……。”不一会就闭上了眼睛，光荣牺牲了。他对三个小队长的话，也是对我们全体同志的遗言，也是一位即将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同志弥留之际，对革命后人的感人肺腑的期望与嘱托。

我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把叶福同志埋葬在陂头村后山上，他那高大的英雄形象和那挺直的青松并立在一起。

不久，我们部队进驻南雄古城村。群众十分高兴。自从土地革命、三年游击战争直到现在，这一带地区部队与群众确已形成鱼水关系，不管在任何艰苦的情况下，群众都心甘情愿付出极大的牺牲来支持自己的子弟兵。现在部队打了胜仗，大军要南下，当年的红军就要打回来，乡亲们更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地欢迎我们。

在古城村住下没几天，村子里的群众舞起龙灯来。这龙灯是用稻草扎成一条好几米长的草龙，有精致的龙头，尖尖的角，长长的嘴，再逼真也没有了。四条腿是用人来舞的。扎好以后，全身插上香枝，到晚上耍的时候才把香枝点燃起来。当这火龙起舞时，受到微风吹拂，香火很快就烧旺了。伴着那八音锣鼓，采茶曲调，有节奏地舞动起来，在那漆黑的夜空中，活象一条金色的蟠龙在欢快地游动。随着音乐的一阵儿快，一阵儿慢的节奏，把老乡们的心弦也扣得一忽儿紧，一忽儿松。大家一时沉浸在欢乐中。舞龙灯，在农村中是吉祥的象征。老乡们就是用这吉祥的征兆，来表达他们对大好形势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庆贺部队打了胜仗，预祝不久将来的伟大胜利。

五月，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又盛开了，这五岭的杜鹃花，开得那么美丽，那么鲜艳。正好象我们五岭地区的斗争，经

过一段艰难曲折的坎坷道路，又取得新的发展和胜利一样。这时，我们按照香港分局和粤赣湘边纵队指示，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五岭部队整编成三个支队：即北江第二支队，由黄业任司令员（后张华）、张华任政治委员，叶昌任副司令员，袁鉴文任副政治委员，陈中夫任政治部主任（后张尚琼）；湘南支队由刘亚球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林任副司令员，李同文任副政治委员，耿俊猛任参谋长，金阳任政治部主任（后唐麟）；赣南支队由刘建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戴耀任副司令员，金阳任副政治委员，云昌遇任政治部主任。三个支队统为粤赣湘边纵序列。

同时，党的组织，五岭地委仍继续统一领导粤赣湘边区工作。另成立湘南地委，由刘亚球任书记，李同文任组织部长，金阳任宣传部长，李林任军事部长，谷子元任统战部长。谷子元原是湖南郴州工委负责人，五岭地委根据华南分局指示，派陈遐瓚和他取得联系。赣南方面也由刘建华、金阳、戴耀、云昌遇等组成工委，刘建华任书记。我和陈中夫奉命调回东江九连山，参加粤赣湘边纵队的主力部队工作。

迎 接 大 军

活 捉 胡 匪

一九四九年六月间，张华、叶昌同志从南雄带着北二支主力开进湘南，在汝城地区会同湘南部队，准备扫除湘南反动势力，巩固和扩大湘南地区，以配合大军南下。

当时窃踞汝城地区的“湘南剿匪副司令”胡风璋，是我们要打击的第一号目标。

胡风璋是湘南汝城地区的大土匪、大恶霸、大地主。他

上与官僚党棍沆瀣一气，下与流氓痞匪互相勾结，组织了一支反动武装，盘踞在湘南、粤北、赣南边区一带达三十年之久。他控制的地方就是他的天下，人民遭其荼毒，乡里任其蹂躏，三十年间，打家劫舍、绑票勒索，包烟包赌、武装走私、走马圈山、强占民田，真是无恶不作。这条狠毒残忍的地头蛇，早就为反动统治阶级所赏识，从兵痞、土匪当到挨户团主任、游击司令、警备团长、保安团长、汝城县长、湘南剿匪副司令，曾经得过国民党“陆军中将”的头衔，集兵、匪、政客于一身，政治上积极反共。在这大军渡江，南方震动的形势下，如能消灭胡凤璋，湘南地区的其他反动势力，就会土崩瓦解。

一九四八年间，胡凤璋因杀了某党棍的父亲，吃了官司。当时湖南省的一些头头听说胡有很多金子，意欲乘机敲他竹杠，关了他半年班房，胡交出十二斤金子以后就被放了。而且还派了湖南省保安第四旅第十一团团团长李可才带一个团到了汝城，助他的威势。胡凤璋回汝城后，又马上投靠薛岳，薛岳给了他一百多条枪，利用胡凤璋控制汝城、桂东一带作为他们的后退基地。

张华、刘亚球等同志对胡凤璋的情况作了认真分析，便下定决心，消灭胡凤璋，不能让他控制汝城、桂东，为迎接大军南下扫清道路。

要消灭胡凤璋，首先要解决汝城守敌李可才。当时县自卫大队队长何彪也带领所部二百余人守在城内。所有敌军官兵，把胡凤璋在城里的几栋楼房都住满了。这几栋楼房盘踞在县城南门，一湾流水横在楼前，一道石桥通向县城中心，桥头放了哨兵，乌鸦飞过也看得清清楚楚。此时胡凤璋已感到这里并不安全，搬回了他离城十五华里的石泉村上古寨的

老巢，只留李可才和何彪在县城充当第一线。

在统战工作上，汝城地方党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敌人内部，开展了上下各方面的策反工作，联防大队中队长朱亚雄，通过他的弟弟朱亚林同志的策动，三月间带了他的中队起义过来，我们主力到后第一次解放汝城，李可才保安团来时我们才暂时撤出。自卫大队长何彪，也是汝城人，由于我们做了他的下层工作，他站不住了，不跟着走也不行，眼看跟着李可才也是死路一条，跑出来还可以保全性命，也拉了两个中队二百余人过来，被我编为独立大队。

这时城里只剩下李可才保安团，被我们围得水泄不通，更加孤立。城里粮食供应无继，他们又是外地人，情况不明，军心浮动，无法久守，只好突围出去，缩到胡风璋的寨子里。我们在汝城与石泉之间的马桥，和李的突围部队打了一仗。这样，我们又一次解放汝城。

石泉村是一个大村庄，住得下千把人马。李可才残部到此，即在四周构筑工事。胡风璋这时住在他的土围子上古寨。李可才当时还有二三百人，我们连民兵在内有千多人，将石泉村围了几天，李可才支撑不住，又突围逃回郴州去了。我们部队随即进驻石泉村，进一步对付龟缩在上古寨的胡风璋。村里一千二三百群众，不到一天，就协助我们部队将李可才的防御工事拆毁殆尽。那时，我们的主力叶昌的部队从廊木坳开过来，在李林同志带领的汝城部队配合下，抢占了村子南面虎形山胡风璋的主要碉堡，包围了上古寨。

这上古寨，确实是一处非常险峻的所在。从前面看去，是一座拔地而起的铁青色的石山。左右后三边有山峦拱卫，却没有可通山顶的道路，只有正面一条陡峭的小路可以上去。

在石山的半腰，筑有巨石围墙，长达四百余米，四周筑有八座炮楼，围墙上遍布枪眼，象个大石桶似的把整个寨子装在里面。从山腰到寨上有青石阶三百余级，山腰围墙小路口锁以铁门，平时住着两户农民，为他看守，现在则放上岗哨。寨顶原有一间古庙，胡风璋霸为已有之后，即将庙宇拆除，在山顶上修建房屋百余间。最高的一栋有五层，室内全用罗汉砖铺地，形同宫殿，胡匪一家就住在这山寨的“宫殿”里。朝着石泉村的那一角上，筑有八角亭一座，登之可眺望四面八方。寨上蓄水池、粮仓、军火库、食品库，猪、牛、羊圈，布匹房，一应俱全，足够二三百人一年半载的用度。据说胡匪还用杀人灭口的狠毒手段，在此修筑了一处秘密金库。这家伙真是财不要命，被俘后仍不肯供招出来。

胡风璋名为“剿匪副司令”，实际没有几个兵。他身边经常带着的是一群卫队、爪牙、打手和拜把兄弟，现在都跟着他躲到寨子上来了。他还抓来一些群众为他砍柴、烧饭、服劳役。寨上总共有三百多人，胡匪带着他五房妻妾、两个儿子，都躲在这上边。他以为我们没有大炮，没奈他何，曾夸口说：“除非他们从天而降，否则休想越我雷池半步。”尽管我们围了他一个星期，劝降喊话，他都充耳不闻。到了第七天，胡匪尚不投降，我们决定强攻了，于是把两门六〇炮调来，把剩下的三发炮弹，都派上用场。“轰，轰！”两炮，打中八角楼，把一只角崩掉了。胡风璋听到炮声，才知道这游击队不比寻常，居然有炮了，才慌慌张张地从炮楼的枪眼里伸出一面白旗。

接着，半山腰的铁门打开了。从铁门到山顶还有很远，胡风璋和他的大部分人马都住在山顶上。我们派出突击队去收拾围墙和炮楼的卫兵，同时布置好阻击，防止敌人突围。

大部队迅速占领山顶，缴了敌人的枪，直奔胡风璋的厅堂。他和他的第五房小妾迎了出来，一个劲地打哆嗦，请求宽大处理。

这样，胡风璋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巢穴，终于被我们人民游击队的革命势力摧垮了。这次战斗，震动了整个湘南地区。湘南四乡的土顽都惊慌失措，预感末日的到来。

这次战斗缴获机枪十余挺，步枪二百余支，有些是从地下挖出来或从鱼塘里捞起来的，都已经生锈了。还有弹药、粮食、布匹一大批，很好地补充了部队的装备和给养。

半月来的战斗，我们部队本来无一伤亡，但撤出上古寨到文明圩时，却在与敌人遭遇战斗中牺牲了两位同志，一位是我们的五岭歌手、教导员劳火同志，一位是机枪连程光宝同志。劳火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从香港回来参加东江纵队的知识青年。回想起和他并肩战斗一起歌唱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同享胜利的欢乐，共度困苦的难关，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始终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叶肇围困，我们缺食缺衣的时候，他谱写出“六两米，口盅饭，破衣烂袄不稀奇，……困难难摧革命志……”的欢快豪迈歌曲，振奋着游击战士的斗志；在绝对掩蔽时期，他谱写出洋溢革命热情的《帽子峰颂》，为广大战士所欢迎。那时，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每一座山头，每一片丛林，都飘荡着这战斗的歌声。很多时候，我写词，他谱曲，我们合作得很好。在活跃部队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他与我是革命战友和“知音”。现在劳火同志把最后一滴血流在五岭山头上，把青春献给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战斗的一生，使我们深深怀念，他那高亢的歌声，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同志们在汝城附近的山头上，怀着悲愤的心情，埋葬了自己的战友。松涛响处，仿佛飘荡

着烈士雄壮的歌声：

啊，帽子峰，

你是我们革命的堡垒。

那人民英雄，

陈毅、项英和无数的红色战士们，

曾在你那高高的山峰上，

密密的丛林里，

战斗，战斗，战斗，

和那疯狂的反动派战斗！……

饶 部 起 义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钟，始兴县城建国路茶楼的三楼上，灯火通明，几台麻将打得辟辟拍拍。敌驻军三十九军二七一团团长周治成突然发现卫士空无一人，感到情况异样，便将眼前的牌子哗啦一声推倒，猛然站起身来，大声呼喝道：“卫兵，来人呀！”哪知全无声息。原来十来个卫兵早就被圈禁在楼下，被起义的士兵用枪口紧紧抵着了。坐在他对面的县自卫总队少校参谋长杨泰湖倒是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拔出手枪对准他，用并不高亢但十分威严的口气命令道：“不许动！缴械投降，可免一死！”那时，自卫总队营长叶干辉等，也都拔出枪来，命令周治成等人：“站过一边去，不准妄动！”杨泰湖同志随即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北江二支队的命令，要周治成无条件地饬令全团缴械投降。这一突然行动，使前来赴宴的该团一些官员都愣住了。只有那平日专横跋扈的周治成和一名营长贼心不死，一边大声呼救，一边夺路下楼。但他们还未下到二楼，就被我们预先埋伏着的战士开枪击中，当堂倒毙。那个政训室主任和另一名

营长，则被吓得面如土色，束手被擒。只有一个副团长十分狡猾，乘人不备，在混乱中从后窗跳下墨江河，负伤逃命……。

始兴县县长饶纪绵为弃暗投明，实行武装起义而摆设的“鸿门宴”就这样散席了。餐厅上的枪声，便成了起义的信号。

饶纪绵原是国民党军中的“少壮派”，毕业于广东军阀陈济棠所办的燕塘军校，曾在国民党部队担任过团长等职务，两年前回归故里，靠张发奎的支持，当上县长，并从张手里弄到了数十挺机枪和百支以上的冲锋枪，亲自任县自卫总队总队长，属于当时的所谓“实力派”。由于解放军已横渡长江，席卷江南，眼看蒋家王朝覆灭为时不远，鉴于形势逼人，不得不找寻出路，后来选择了起义的道路。

饶部起义，已于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开始酝酿。由饶纪绵同乡张显岐在香港找到我党组织负责人搭上关系，随即将我北二支张华同志的代号——“刘所长”，转告饶纪绵，叫他就地直接找北二支联系。张显岐原是国民党一三一师师长，他的部队在山东战场曾吃过我军败仗，后来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于是称病回来广东。张与饶是同乡，在国民党部队又曾共过事，两人间颇为知己，对时局的看法也颇有同感，因而共同选择了向人民靠拢的光明道路，积极行动起来，与我部取得联系。

我们北二支接到香港分局的通知以后，即加强发动饶纪绵起义的工作。陈中夫同志是始兴地区负责人，对这一件事特别关注，当即赶到油山，同张华、袁鉴文等领导同志研究这一工作的计划进程。他兴致勃勃地说：“现在国民党在粤北的兵力，主要是放在韶关、南雄、始兴这三个点上，如果始兴问题解决了，就去掉三分之一的阻力！”

袁鉴文同志这时已回到部队来，他同意陈中夫同志的意见，认为应该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为解放大军南下扫除障碍。

陈中夫还认为：既然饶纪绵有起义打算，就叫他马上起义过来，这对于韶关、南雄的敌人，将会有很大影响。因而主张说干就干。

一直在旁边考虑这个问题的张华同志，他在考虑问题的另一面。他认为饶纪绵起义应该欢迎，现在看起来条件好象不够成熟。第一，饶纪绵的底细我们还没有认真摸透；第二，在人员和装备上，饶还有相当的优势，一下子过来了，我们始兴部队是否驾驭得了？

大家也觉得这是个问题，感到起义时机，最好是南下大军接近始兴时，里应外合。于是决定先稳住他，同他约法三章：第一、双方今后加强联系，指定联络人员和联络地点，没有我们的通知，不作起义行动；第二、不打我们，有情况要向我们先通消息，实在摆脱不了时，枪口朝天放；第三、要向那些乡长、区长做工作，要他们认清形势，留有后路，但最为重要的是不要暴露起义的意图。我们立即将上述作法向分局和边纵作了汇报。上级也同意我们的部署。

饶纪绵起义是否真有诚意，我们也不能光听其一面之词，于是通过一些事实来对他进行考验。当时我们有两个女卫生员在一次战斗中被俘了，敌人把她们送到饶纪绵那里。我们要他设法放人。结果，饶布置他的心腹把小黄和小张两个卫生员深夜押到五里山，实行假枪毙，暗中把她们释放了。我们部队缺乏药品，叫他设法弄一些送到部队里来。他建议用船运到罗坝附近的吉龙湾，他派一个班押运，作为送给他们自己部队的样子，游击队在吉龙湾等着，船一到，向他们突

然袭击，把药品缴去。另外，在他的队伍中，虽然绝大部分愿意跟着他走向光明，但也有一些不可靠分子从中作梗，有些已被饶纪绵个别处理了，但有一个中队还在不可靠分子的掌握中，他问我们怎么办，我们建议他把那个中队支使出城外来，由我们把他消灭掉。果然，在一天的早晨，那个中队被派进山来了，我始兴部队以几倍于敌人的兵力，预先埋伏在山口的竹子排，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敌人八十多人全部被缴了械，中队长也被我们活捉了。

通过以上事实证明，饶部的起义，是有一定的基础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旬，饶纪绵要求和我们的领导直接见面，商谈起义的具体事宜。张华同志派在始兴南山活动的邓文礼同志为代表，约好饶纪绵在屯岗附近的田心村山头见面。为了小心起见，双方所带警卫人员都停在山头的百米以外。邓文礼同志随同我地下党交通站的同志到达预约地点时，饶纪绵已在翁源中学教师包三易的陪同下先到了。相谈之下，饶纪绵首先表示投降人民的决心；邓文礼同志代表北二支的领导表示热烈的欢迎。双方交换了意见以后，邓文礼对饶传达了北二支领导的指示：第一，对他们弃暗投明表示欢迎，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今后要为人民立功；第二，确保防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准备粮食物资，迎接大军南下；第三待机起义，没有我们的通知，不要过早行动；第四，提供韶关方面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兵力部署情况。饶纪绵欣然一一答应，还提出要求派党代表到他那里，领导他们起义的具体行动。邓文礼同志回来汇报以后，我们决定派有地下斗争经验、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少校营长的杨泰湖同志去始兴参加领导起义工作，由饶纪绵委以始兴自卫总队参谋长的职务。和杨泰湖一起去始兴的同志，也分别委派了县政府科员等名义作为

掩护。一切有关起义的准备事宜，就由杨泰湖与部队取得联系，并代表党具体领导这一工作。

随着解放大军南下，战事重心逐渐向南推进，起义的时机也日益临近。为指挥方便，杨泰湖同志建议将始兴二十多个自卫中队统编成三个营，两个独立中队，统一由总队指挥。另外，张发奎的家乡清化区，原有广州行辕派驻的一个加强连，该连配有无线电台，直接由广州行辕指挥。现在粤北紧张，饶发动乡绅联名请求拨归始兴县政府统辖，以加强实力，还将部队逐渐向县城靠拢，以便应付紧急情况。同时，以县府的名义同国民党驻军交换情报，以便随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县府职员也集中训练，集体开膳，组成一个职员队，由县府秘书负责指挥，以便随同起义部队行动。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旬，向广东进军的野战军，已越过梅关逼近南雄。九月十九日，张华同志以北二支司令员的名义，命令饶纪绵率领始兴自卫总队于二十二日起义，并负责消灭驻防始兴县境的蒋军三十九军二七一团。二七一团是反动派军队中属于“装备最好，纪律最坏”的那种部队，当时在始兴县城驻有一个团部和两个营，分散驻在县城的东、西、北街道及汽车站等八个据点。士兵多是从北方败下来时收容的一些地主、恶霸、还乡团之类的反动分子，亡命之徒，顽固强悍，另一营则驻在离城四十华里的马市。这个部队成为我解放大军南下解放韶关的一大障碍。

饶纪绵与杨泰湖接到命令后，首先以点验为名，调动全部武装力量集中县城，同时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当场宣布了北二支张华司令员的命令。在这之前，关于起义问题，已在主要人员中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现在主要是研究作战计划了。大家情绪高涨，决心很大，都认识到成败利钝，在此一

举，表示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命令，全力以赴，务求必胜。同时决定以自卫总队的名义邀请二七一团营以上军官饮宴的方式，摆设了一席上述的“鸿门宴”。

起义部队在我始兴部队配合下，歼灭驻始兴县城的敌军以后，始兴城宣告解放。起义部队即按预定计划向南转移，集结于新村一带，和我始兴部队会师，并改编为北二支新一团，饶纪绵任团长，杨泰湖任参谋长，支队还派了教导员、指导员，担任连队的政治工作。

饶纪绵起义后当天，敌三十九军四四〇团约六、七百人，在团长张扬的率领下，分乘十多辆卡车，由韶关开赴始兴增援，并护送新县长前来。哪知道始兴二七一团已被解决，我军已解放南雄。张扬中途闻讯，惊慌异常，企图率部逃返韶关。我们当即命令新一团配合我始兴部队，到曲江、始兴交界公路崖婆石附近的隘路口上，截击敌人，结果把张扬团打得落花流水。除张扬及小部分队伍拚死逃脱外，其余大部分被我军歼灭。至此，敌人在周田一带的防线动摇，南雄到曲江的敌军部署，大部已告崩溃。从此，新一团在五岭地委和北江第二支队的领导下，配合南下大军，为解放粤北广大地区作出了贡献。

亲人会师

一九四九年七月间，南下大军势如破竹，直指江西。9月7日，叶剑英同志主持赣州会议，根据党中央的进军战略方针成立华南分局，作出解放两广的重要战略部署。五岭部队，不论在赣南、湘南、粤北到处都在发动群众，扫除反动势力残余，拦截南逃的敌人。士气空前高涨，到处都在打胜仗，要以战斗的胜利迎接南下的亲人。

在湘南，桂东、汝城、资兴、桂阳等县敌人纷纷携眷逃遁，我军乘势解放上述各县城。郭名善同志当了解放后的桂

东县第一任县长。他们一进桂东城，首先打开监狱，放出被关押多年的政治犯，郭名善同志的母亲、妻子、弟弟、妹妹也得以重见天日，骨肉团聚。

这时，湘南支队的领导机关在桂东县的沙田村。

获悉陈赓同志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的部队已到了吉安，支队司令员刘亚球同志派李林同志带领一个连去吉安找到了陈赓同志，陈赓同志亲自接见了他们，问道：“你们是哪里的游击队？”李林同志回答说：“我们属粤赣湘边纵队领导的，我们支队司令员是刘亚球。”

“哎呀呀！我遇到刘亚球游击队啦。”陈赓同志高兴地说，原来他与刘亚球同志是老相识。这样，四兵团和湖南支队汇合了，大军的敌情侦察，筹备粮草，带路当向导等问题也在湘南支队配合下得到解决了。陈赓部队是快速部队，他们到了吉安后，就要向广东仁化方面进发，跟着插向广西边界堵截西逃的白崇禧部队。

陈赓部队晚上经过汝城没有停留，急行军前进。那时候行动非常紧张，因为白崇禧已从汉口败退下来，他在郴州下了车，要从新亭过广西，想在湖南、广西边界搞条防线。陈赓部队一插过去，这条防线就不起作用了。

陈赓部队接着向西挺进，沿路俘虏了不少敌人，湘南支队设立兵站负责转送。六十华里一站，给俘虏饭吃，发给路费，是哪里的人送回哪里去。从嘉禾、兰山开始设站，一直到郴州、耒阳、衡阳，处理那些俘虏，足足搞了一个月。同志们都怀着兴奋的心情，配合南下大军，作好这些后勤配合工作。

与此同时，赣南支队活跃在赣州至大庾的公路上，等候南下大军的到来。据情报人员报告，第四野战军邓华同志指挥的第十五兵团正向赣州进军，国民党在江西的二十三军、七

十军和江西省主席万天带领的地方部队，正向广东逃窜。这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刘建华、戴耀等同志立即把部队拉到公路上，阻击逃窜的敌人。同时，组织人员展开宣传攻势，贴标语，撒传单，还派人设路障，埋地雷，破坏桥梁，袭击敌军车，拦截敌人，收缴武装。搞得敌人草木皆兵，惊恐万状。狡猾的敌人挨了打，急忙改变退却路线，从新城渡河，抄小路到信丰，经三南逃入广东。在定南县属的一个山头上，被我始兴邓文畴率领的部队兜截阻击，俘虏敌人一百多人。

八月十七日，一位老表跑来报告说：“新城来了好多穿黄衣服的大军，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就是听不懂话。”刘建华听他这样说，马上写信派人去联系，果然是我南下野战军的部队。便亲自去新城与南下的四十八军一位团长会见。赣南支队与南下大军会师了。

还在八月上旬，北江第二支队在湘南资兴县接纵队电报通知，南下大军主攻方向在江西，不久即将近赣州，由于主力不是沿铁路南下，北二支应立即回师赣南。这样，北江二支队就沿途解放了文英、聂都、内良、吉村等地，走了六天六夜，爬过了八面山，到了大庾附近。大庾城内敌人闻讯惊惶弃城逃跑。我们部队当即接应大军一起进入大庾城。

第三天，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的一个团，和赣南支队、北江二支队的部队一起，在大庾举行了入城式。大庾城的群众热烈欢迎自己的亲人，都说：“红军又回来了！”

部队在大庾城住下以后，大军派出一个连，协同赣南支队接收了大庾附近的西华山钨矿。由于事先做了工作，工人和矿警把矿场保护得很好，而且当即复工。工人群众在胜利的鼓舞下，发扬了主人翁的光荣感，保证了接管工作顺利进行。

残留在粤北的敌人虚张声势，叫嚣要在曲江同我们决战。所以南下大军在大庾停留了五天，即提前进军广东。除赣南支队留在赣州地区外，北江二支队配合大军同进粤北地区，主要的任务是带路、侦察、支前、收容俘虏和配合作战。

当大军刚跨越梅关，进入广东地界时，与北二支队主力会师，然后分三路进攻南雄县城，歼守敌七百余人，还抢占了敌人企图破坏的南雄桥，九月二十四日拂晓南雄城宣告解放。始兴县由于饶纪绵起义，南下大军和游击队在起义部队配合下，于二十五日进入始兴城，始兴亦宣告解放。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粤北各地人民欢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北江二支队配合南下大军，解放粤北名城曲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地下党李凌冰、赵学光等同志领导的护城工作做得很好。曲江大桥、车站和通向东、西河坝的那几道用大木船架成的浮桥，都没有破坏，畅通无阻。风度楼和风采楼亦雄踞城中，英姿无损。至此，粤北广大地区除连县还有小股敌人之外，已告全部解放。

张华同志率领北二支队到了曲江以后，除组织一个向导小组配合大军的作战行动外，他与袁鉴文、吴伯仲等同志带领部队留在粤北地区继续做支前工作。因为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向西南挺进，要经过粤北；第四野战军邓华指挥的十五兵团也要从这里向广州进军，保证这两支大军的粮食给养、交通运输，便成了我们刻不容缓的光荣任务。在地方党同志的努力，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这个工作完成得很好。

从此，北二支的大部分同志留在北江地区，与广大人民

群众一起，扎根在这岭南山区里，迎接清匪反霸，建设粤北革命政权的新任务。

依靠人民建设新韶关

——解放初韶关建设回忆片断

曾 东

1949年10月初，正当全国人民欢庆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我们按照北江第一支队司令部的部署和迎军支前的指示，率领北一支第二团奋战于翁江下游的英德东部，深入宣传和组织群众，积极支援大军南下。10月10日，配合大军解放并接收英德县城，同连江支队派来的队伍一起，迅速展开了各项接管工作，建立新的革命秩序。10月20日左右，我奉调韶关，担任曲江县副县长兼城关区长。过了约一个月，广东省人民政府电令韶关改为县级市建制，我被派主持市政工作。1950年5月，省人民政府又令韶关由市改为镇，隶属曲江县。1951年6月又奉令重新恢复韶关改为市的建制。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顾1950年韶关市初建这一页，是令人难忘的。

韶关，这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粤北重镇，向来是粤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抗日战争期间，曾是广东战时省会。但由于长期被反动派统治和战争的蹂躏，各种建设甚少，工业生产十分落后。解放初期，真可谓“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到处可见破烂不堪的景象。我们始建市时，市人民政府想找个好一点的办公地方都很困难，最后不得不挤到

风度南路一间破旧楼房里（即现市总工会旧址），权且作为韶关市首脑机关的办公地址。好在当时市府新建，机关比较精简，市府机关内仅设置有秘书、民政、工商、财政、文教等几个科室，干部、职工人数合共有40人左右（干部职工来源，是由原北一支、北二支、连支和南下部份同志组成，以后也从教师、学生和工人中抽调来一点）、干部都是青年人，当时是搞供给制，吃、住基本都在一起，过着艰苦朴素而又十分愉快的集体生活。当时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刚从农村搞武装斗争转入城市的，许多工作都不熟悉，一切都是从头学起，因此，大家表现得团结谦虚，并且仍象过去战争时期一样，既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十分注意宣传发动群众，积极为建立和巩固革命新秩序，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农业生产而努力工作。

由于当时党十分重视发扬人民当家作主精神，很快就建立了人民代表会的制度，因此也就较好地完成了解放初期的各项任务。建市不久，我们根据上级指示，参照其他已早解放城市的作法，于1950年1月，召开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上，我代表市人民政府作了题为《为建设人民的新韶关而奋斗》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建市初期的七项任务：一、要加强市区治安管理，肃清土匪特务，进一步巩固革命秩序；二、要继续稳定金融，恢复发展工商业，在恢复发展工商业基础上，创造发展工业的条件，在可能情况下积极扶持和组织工农业生产；三、要继续发动和组织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扩大人民团结；四、要依靠发展经济，增产节约，开辟财源的原则去解决财政问题；五、要争取、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积极整顿学校教育，有计划地开展社教工作；六、要实施必要的市政改革和建设；七、要建立与健全机构，树立新制度、新作风。

这一届代表会，有市区太平、武城两个镇的街道代表及当时市郊东、西、北厢三个乡和工商、文教、医务、青年、妇女等各界代表约100多人参加。会议中热气腾腾，充满欢声笑语。代表们对解放后的新气象、新作风、新政策一致表示满意并大加颂扬。会议期间，对报告中所提各项任务，代表们展开了讨论，还逐项进行了认真审议，最后一致通过了一项相应的决议。在这一届代表会议上，当时的中共韶关市委书记王可夫也作了题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为完成会议的决议而奋斗》的报告。会上，选出了第一届协商委员会委员10多人，作为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监督、执行和继续协商的机构。1950年上半年，我们的工作，是沿着依靠人民建设新韶关的轨道和韶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而展开的。

在建国初期，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委员会议制度，确实起到发扬人民民主，加强政府与各界群众之间的联系，起到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作用。1950年一月首届人代会和协商会及其后至1952年历届人代会和协商委员会为建设新韶关，为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及其他各项政治运动，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目前，经过40年的努力，人民的新韶关已大大向前发展了，面貌全新了。现在，这个过去粤北的山城，已成为以重工业为主，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的新兴工业城市，成为了全广东省的重工业基地，成为城乡经济紧密结合、经济比较繁荣、文化比较发达、市政设施逐步完善的一个新型城市。当此韶关解放40周年快要来临之际，我衷心祝愿人民的新韶关市，在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道阔步前进！

解放北江地区概述

廖桂洲

解放战争后期，北江（粤北）地区除所辖南雄、始兴、曲江、乐昌、仁化、乳源、英德、翁源、佛冈、新丰、清远、阳山、连县、连南、连山十五个县外，还有赣湘边界的大余、宜章亦属北江地区范围。上述这些县都分布在大小北江流域。根据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的需要，当时又把这一地区划分为翁江、五岭、连江三个地区，并分别成立翁江地委、五岭地委、连江地委（又称粤湘边临时工委）领导这些地区。翁江地委管辖和领导翁源、新丰、佛冈、浈江（清远属）、英东、曲南和江西虔南等县区；五岭地委所辖和领导南雄、始兴、曲江、仁化、乐昌、乳源、大余、宜章等县；连江地委所辖和领导清远、英西、阳山、连县、连南、连山等县区。

这些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大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锻炼和考验，使地方党的建设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使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亦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形成较大的武装斗争阵容，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一支队、北江第二支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连江支队，并依靠这几支武装队伍，与濒临灭亡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敌后斗争，还配合由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四

兵团组成的南下大军，胜利地解放了北江广大地区。

随着北江各地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北江的反动政府彻底覆灭，各县也陆续建立了新的人民政府，在韶关也成立了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和军分区，担负着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北江的历史重任，把北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逐渐地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北江解放战争，是一场彻底推翻国民党地方反动统治的人民战争，它给人民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为把这段光荣的斗争历史重新展现出来，现根据所掌握的历史资料，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北江游击武装及人民群众配合作战，解放北江的历史作一简单概述，并以此文奉献给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先烈们，奉献给参加过解放北江的革命老同志和北江人民，借以纪念解放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的湖口、东至江苏的江阴一千多里的战线上，发起了渡江战役，强渡长江天堑，迅速摧毁敌人苦心经营的海陆空立体式的千里江防。在短短的20多天里，先后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和苏、浙、闽、赣、鄂等广大地区，为进军中南、西南、华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加速了全中国的解放。

9月，陈赓、邓华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经过千里追击敌人，先后到达赣粤交界的江西赣州和湘南地区，准备向广东进军。此时，党中央派叶剑英前往赣州，组成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直接领导和指挥解放广东的战役。在赣州，华南分局于9月11日、16日和19日，召开了三次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解决了三个方面的主要问

题：一是华南分局、军区、省市政府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干部的配备；二是解放广东的部署；三是接管城市和乡村的重要政策。与此同时，华南分局还就作战、后勤、支前等问题召开了专门会议，解决了军事行动、后勤供应、支前工作、统一思想、团结会师等一系列问题。

在进军广东的军事部署方面，华南分局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根据敌我态势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一是，如果敌人扼守曲江（韶关）、英德之线，则我四兵团除以一部由铁路以西迂回敌之左侧外，主力沿粤汉路及东西两侧并进。十五兵团由三南插至英德或其以北，断敌归路，求得歼灭敌四个军。以两广纵队经惠阳向南迂回并相机占领惠州。华南分局主力，则积极向潮汕方向佯攻，牵制与迷惑敌人。二是，如果敌军集中退守广州、虎门，我以四兵团沿粤汉路南下进至广州以北、以西，十五兵团进至广东以东，两广纵队则插至广州以南，截断广州与虎门之间的关系，合力聚歼广州之敌。华南分局部队，仍监视与牵制潮汕之敌。

在南下大军部署解放广东的同时，国民党“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亦加紧部署固守防御广东的战略。于9月底、10月初令三十九、六十三军以曲江为中心，在南雄、乐昌地区设第一道防线；令方天指挥第十三兵团第二十三、七十军，以英德为中心，沿铁路线及翁源地区设第二道防线；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刘安琪指挥第三十二、五十军，在广州以北铁路线清远、源潭和从化、佛冈地区设第三道防线；其余的胡璉十二兵团等部，分别在潮汕和南路地区设防，以抵抗大军的进攻。

9月28日，叶剑英、陈赓联名签署发布了向广东进军的命令，南下大军分左右两路向广东进军。在发布命令之前，

以邓华率领的十五兵团为左路军的先头部队四十三军，经江西全南、定南、龙南地区，于9月15日直插翁源地区，汇合地方部队北江第一支队主力团，解放了翁源县城龙仙镇，消灭了翁源地区之敌，完成了左路包围曲江和截断敌人沿公路南撤的任务。9月22日，以陈赓率领的第四兵团四十五师率先插至梅关，与五岭地委所属的北江第二支队胜利会师。会师后，于23日夜与北江第二支队紧密配合，分三路奔袭南雄。南雄为韶关东部边境县城，是北江重镇曲江（韶关）的屏障，敌军有一个师在南雄、始兴一线布防。为取得进攻韶关的主动权，大军先头部队第一三四团急行130里，在24日拂晓到达南雄城郊，先在北二塘歼敌保安团一个营；一三四团另一部与北江第二支队，经上龙山直抵南雄西北的琵琶岭，歼俘逃敌200余人；军属侦察分队，又在南关河南街截歼逃敌300余人；该团第一营，迅速以炸药炸开东门，进占城中心区的县政府。第二营则迅速进至城南架在浈江上的大桥。这时，据守桥头的敌军正惶乱地浇上煤油烧桥，但大军以勇猛动作扑向桥头，冒着烟火冲过桥去，把惊慌失措的敌军全部消灭，扑灭了桥上大火，解放了南雄县城，保证了大军主力的顺利前进。当天夜晚，部队沿着通往曲江的公路紧追逃敌，抢占百米以上公路大桥两座，歼敌第六十三军一八六师五八八团大部，俘敌1390多人。我军以长距离的突然行动，25日进逼始兴县城。在大军进至始兴之前，五岭地委经过长期做艰苦的统战工作，曾派袁鉴文、杨太湖等到县政府与有进步倾向的县长兼自卫总队长饶纪绵加强联系，宣传党的政策，争取他在大军到来之前举行起义，配合大军解放始兴县城。饶纪绵按照党的指示，于24日举行起义，配合大军于25日顺利地解放了始兴县城。

这个时候，由曲江前往支援的敌第一四七师四四〇团进至始兴以西地区，企图扼守始兴西北面的小江坝大桥、沈所里之线阵地，阻止我军前进。大军第一三四团追至罗所发现该敌，立即主动发起攻击。该团第八连在夺取小江坝大桥的时候，以一个排由正面攻击，两个排沿稻田迂回，由东面突然抢占敌桥头堡垒，有效地歼灭守桥的敌人。至此，大军右路先头部队，打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完成了从东面中路包围曲江的任务。与此同时，大军第十四军从湘南桂东、汝城进逼乐昌，于10月6日占领乐昌；第十三军从五岭出发，于10月6日进占仁化，完成了西侧包围曲江任务。形成东南西三方面对曲江的钳击之势。

10月初，南下大军从东南西各路开始进攻曲江。先有大军一支轻装部队从始兴出发，经由始兴西南面人烟稀少的老龙坑岭，攀登悬崖绝壁的山地迂回前进。正面部队则以惊人的快速，沿始兴至曲江公路前进，追歼沿路闻风而逃的敌人，经130里急行军进逼曲江。曲江守敌第三十九军，先于10月初便沿铁路撤往英德以西地区，以加强第二防线，第三十三军迟至10月6日才沿北江西岸向南逃窜，留有少数守敌于10月7日晨用汽油燃烧曲江公路大桥。这时，大军一三四团第二营见桥头燃起熊熊烈火，便令第四连跑步到桥上扑灭火焰，第二排排长靳可明即带三个班向前冲去，并分出大部分战士，穿过火焰到桥那边的城关警戒，留下9个人在桥头救火。战士们忘记夜行130多里的疲劳，使用各种灭火工具，很快把桥上大火扑灭，保证了大军后续部队顺利通过大桥进入曲江城内。于10月7日凌晨，解放了北江重镇曲江县城韶关市。

韶关刚解放，大军各部队立即收到新的命令：“敌人弃守曲江南逃，我们必须立即改攻坚为追击，敌人逃到哪里，我

们追到哪里，扭住一股歼灭一股，兼程向广州前进！”据此命令，南下大军象潮水一样，沿着所有通往广州的道路，奋勇追击。各个部队夜以继日地前进，每天行程都在130里以上。在大军这样勇猛的追击下，敌人虽然已在许多重要桥梁上安装了炸药，准备破坏，迟滞大军前进，但是，大军压来，准备炸桥的敌军，不是当了俘虏，就是仓皇逃散。

大军十五军四十五师日夜兼程前进。9日16时，向英德城及英德车站守敌发起攻击，敌人顿时混乱。大军以正面攻击与侧翼迂回的手段，突然进攻敌人。一三三团七连第一班副班长郭贵喜，和第三班班长葛凤荣带领的战斗小组，仅五分钟就冲上了山顶。后继部队紧接着涌上来，迅速占领车站以东高地，将敌人一个团部和两个营打垮。敌人东逃西窜，缴枪的缴枪，逃命的逃命，有些象猪一般地钻进草丛和竹林里，动也不敢动。经过4小时的缴战，把敌人完全解决并控制了全部阵地。但在英德车站南边的遥步圩大铁桥，还有敌第三十九军的一个团。这座铁桥架在翁江河上，长达280米，是粤汉铁路南段最大的一座铁桥。敌人企图在守不住车站时，炸毁遥步圩大桥，凭险在翁江河南岸顽抗。当夜10时，第九连奉命抢桥。我军掩护冲锋的机枪一齐吼叫起来，枪榴弹象冰雹似地落向敌人的阵地，守桥的敌人狼奔豕突地逃向草丛、山上、竹林和村庄里去。九连一排机智灵活，三分钟即冲过近300米宽的铁桥，将敌人已经安装好的炸药导火索剪断，并且勇猛冲击，将守敌大部消灭。敌人一个团被我歼灭，遥步圩大铁桥也完整地保护下来。

当天，大军解放了英德县城，歼灭敌九十一师二七二团一个营。10日上午，大军四十五师进至英德南50公里的万公桥，遇敌九十一师两个团抵抗，当即向敌发起攻击，占领两

个高地，当晚完成对敌人的包围。11日晨发起攻击，该敌在空军及铁甲车配合下，与大军激战5小时，被歼千余人，其余向南溃退。当天下午，大军乘胜攻占万公桥的黎洞圩车站，并尾追敌人。13日中午渡过湟江，当日14时在源潭击溃敌一〇三师、一四七师四个团，俘敌千余人。残敌一部乘火车南逃，一部向西逃窜。大军不顾敌机轰炸扫射，继续追击。20时直出银盏坳车站，逼近广州城郊。

大军第十四军四十师先头部队一一九团，于10月9日经曲江以西乳源牛尾岭解放县城，随即沿北江西岸急行直下清远，13日拂晓逼近清城附近，与连江支队苏陶带领的三团互相配合，在距清城40里的塘口展开攻击，击退敌二十三军二一一师、二一三师的阻击，于傍晚进入清远县城，前后战斗9小时，解放了清远县城，打破了敌人尚未部署完毕的防护广州的最近防线，直接威胁广州敌人，广州守敌也仓皇逃走。

以第十五兵团组成的左路军，在解放翁源后，沿翁源至广州的公路快速前进，先后解放了北江南部的佛冈、新丰，直逼广州。十五兵团先头部队四十三军一二七师于10日完成对佛冈之敌三十九军一〇三师三〇七团之包围，12日攻克佛冈，歼守敌三〇七团及保安团全部。四十四军于11日进入新丰及以西地区，其先头一三二师于12日展开向良口圩、从化等地攻击前进，直逼广州。至此，南下大军与北江军民，解放了大北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从化、花县至清远一线包围了广州，并于14日解放了广州。

大北江流域地区解放后，在韶关成立了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和北江军分区，继续领导北江各地武装部队和人民群众，配合留守北江的南下大军，消灭地方残余势力，解放小北江地区连阳各县。10月中下旬，连江支队主力团（一、二团）

奉命前来韶关接受改编，原连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改任北江军分区副司令员，连江支队主力改编为北江军分区第十二团，下设三个营。戴耀任团长，蔡雄任政委，黄正德任政治部主任。11月，成立了以大军四十八军参谋长王中军、政治部主任吕琳和原连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周明组成的解放连阳指挥部，并研究确定了分三路向连阳进军的作战部署，一路由四十八军四二八团和连江支队七团组成北路，由黄沙堡到周家岱，转天光山直插东陂等地直逼连县；二路由军分区十二团和大军一部分，加连支十团打正面，从坪石通过宜章境直下大路边，攻星子进连州，再兜入三江；三路自四十八军一个团的一部分和军分区十二团的一部分，从南路英德到阳山，与阳山的连江支队五团配合，向阳山黎埠方向前进，插到三江，形成南北两路夹击连阳之敌，达到解放连阳各县的目的。

这时，连阳一带敌人的分布是：以李楚瀛为首的“反共救国军第九军”，共三个师、约四千人，分驻连县、阳山；其次还有交警和残余土匪一千多人，分驻东陂梁家水村、大路边、星子等地。

根据解放连阳的部署，各路部队按原定路线进军。在此之前，即10月底，连支十团和大军的一个师部及两个团在宜章县的黄沙堡会师。会师后，部队直插连县大路边。大路边村在连县至坪石之间，是个大村庄，四周有围墙，村内筑有炮楼，西北面靠山，前面为稻田开阔地，东南面的红磊顶山为该村的制高点。敌交警总队1000多人，凭据有利的地形和优良的武器装备，固守该村。我军以大军从正面进攻敌人，连支十团控制村东南面的红磊顶山。11月5日黎明发起攻击，大军先从北面进攻，迅速逼近围墙，并越墙进攻。但敌火力很猛，致大军前进受阻，伤亡较大。战斗至三小时，敌突然从

村前冲出，向红磊顶我守军反攻，十团与敌人战至下午3时撤出战斗。约晚上7时，我增援部队赶到，经过猛烈炮火的轰击和各方努力作战，至凌晨结束战斗，毙伤敌1000多人，俘敌3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大军伤亡也不少，牺牲数十人，负伤数十人。连支十团牺牲两人，缴机枪一挺、汤姆生冲锋枪4支。这一仗，为北路进军连县扫除了障碍。

此后，该路部队沿公路攻击前进。12月6日解放星子，8日解放了连阳地区的中心城市连州城。与此同时，北路另一部队，于12月6日行至东陂黄峒山下，遇驻守在黄峒至梁家水一带的敌交警600多人。他们企图阻止我军前进。我军于6日下午分三路围歼了该线敌人，逐步缩小包围圈，把敌人围困在梁家水村，并发起猛烈进攻，战斗至7日凌晨，在强烈炮火的猛攻和我军政治口号的攻势面前，敌人被迫缴械投降。这次战斗，歼敌大队长以下600余人，其中俘敌44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35挺、长短枪500多支、炮两门、电台两部、弹药和战利品一批。我军牺牲22人。12月10日，连支七团配合大军，解放了连山县城。

在南路，北江军分区派苏陶带领连江支队三团的两个连，沿北江而上，到达英德与大军一部汇合后，再与连支五团配合，于12月14日解放阳山县城。从此，小北江的大部分敌人已被消灭，大部分地区也获得解放。

为彻底肃清连阳敌首领李楚瀛及其少数残余势力，在解放了连县、连山同时，便集中主要力量从东陂、西岸、石角等方面，向三江（现连南县城）挺进，于12月7日傍晚包围了三江镇。8日，解放连南。李楚瀛在解放连县前夕，慑于我军的压力，率警卫营、护航大队和便衣队700多人，从连山城南门口逃出，过浮桥，经瓦寮岗、石街头到沙冲，8日到

黎埠凤山村，在刘晋丰和陈国良（国民党连南县长）家宿夜。9日往瑶区的南岗排，11日复由南岗到沙冲村，东逃西窜，住无宁日。大军四二九团在沙冲村与李部相遇，战斗一小时，李部溃散，俘敌20余人。另连江支队十二团麦永坚营到达三江，即得悉李带心腹部下，买通南岗瑶胞房大猪六带路，躲进矮欖坳的石洞里，企图逃过我军的追捕。我军在瑶区发动群众，找到知情者李昌夫、谭维尊做响导，前往包围李匪的最后巢穴。正在此时，12月17日，房大猪六主动到三江镇我军营部报告了李匪情况。经研究，我营干部钟炳南带一个班于当日5时逼近矮欖坳山洞，出其不意地捉住洞口的敌哨兵，后继部队亦迅速把守洞口两侧，并急速开枪警告，大喊缴枪不杀。在我军严密的包围攻击下，李楚瀛只得带着42名官兵出洞投降。

至此，小北江全境4县获得解放，全北江15县也取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本文根据《叶剑英光辉的一生》、《南线巡回》、《两广追击记》、《广东战役详报》、《北一支队简史》、《北二支队简史》、《连江支队简史》等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附： 北江各县解放时间表

县 名	解放时间	资 料 来 源
曲 江	1949、10、7	《南线巡回》、《曲江组织史资料》
始 兴	1949、9、25	《南线巡回》、《始兴组织史资料》
南 雄	1949、9、24	《南雄巡回》、《南雄组织史资料》
乐 昌	1949、10、19	《解放乐昌追记》、《乐昌组织史资料》
仁 化	1949、10、6	《南线巡回》、《北江解放战争大事记》
乳 源	1949、10、9	《广东战役详报》
英 德	1949、10、9	《南线巡回》、《英德县革命斗争大事记》
翁 源	1949、9、15	《北一支简史》、《难忘的日子》
新 丰	1949、6、13	《五擒新丰县令》、《新丰大事记》
佛 冈	1949、10、12	《广东战役详报》
清 远	1949、10、13	《两广追击记》、《黎明烈火》
阳 山	1949、12、14	《连江支队简史》
连 县	1949、12、8	《连江支队史稿》
连 南	1949、12、8	《连江支队史稿》
连 山	1949、12、10	《连江支队简史》、《解放连山》

回忆解放翁源龙仙始末

林奕龙

我原在北江第一支队（以下简称北一支）司令部工作。1949年9月中旬，我受部队领导的指派随同南下解放大军一起参加了围歼解放翁源龙仙的战斗，现将记忆所及的这一战斗经过的始末记述如下：

1949年4月下旬，我解放军强渡长江，直捣国民党老巢南京，彻底摧垮了国民党政府，粉碎国民党最后妄图以长江划分为南北分治的梦想。为了迅速解放全中国，我军强渡长江之后，立即挥师南下，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进军华南。1949年9月初旬，南下大军先头部队第48军143师即已到达江西赣南的乌邱坝、大吉山与北一支三团北极区驻乌邱坝武工队长梁增托取得了联系，随即我北一支队司令员何俊才便率领主力五团前往大吉山迎接大军，并即与大军共同研究和部署了解放翁源的作战计划。

为了配合大军解放翁源，按作战计划的部署，由司令员何俊才率领主力五团到翁源的新江截击国民党翁源县长官家骥南逃的后路，由北一支三团团长沙锡朋率该团一个连与北一支一团配合在翁源周陂、陈标一带堵截可能向翁源西南逃窜之敌。这样，就布下了全歼国民党翁源龙仙官家骥以下顽固派全部武装的天罗地网。

1949年9月13日，我军143师429团从大吉山夜行军分别开到翁源的小砾、中洞和贵圻一带隐蔽，第二天（14日）下午四时许分三路向翁源的坝仔、南浦、龙仙包围攻击：一路由北极区的童少明等陪同该团参谋长孙纪纲率山炮营围攻坝仔自卫大队肖大明部，追歼地方反动武装头目黄炳中；一路由北一支李群等陪同该团副团长杨贵生、副政委彭候枫率南下大军429团二营，由贵东出发解决南浦国民党乡政府；另一路由北极区委副书记、翁源岩庄地区特派员林奕龙陪同429团团团长梁岐、政委薄能贵率领该团一营及团部包围龙仙。14日下午三时许，吃完晚饭，我进击龙仙部队由翁源中洞经半溪、焦坑、饶村、石灰夹出江头安宜坑等村庄小道，绕过江尾左侧直插龙仙翁源县府的背面（社岗下），与二营汇合，形成对国民党政府的包围。当时我们的作战指挥部就设在社岗下。我跟随梁团长、薄政委在社岗下的山岗上观察战斗情况，15日凌晨四时开始，我向县府周围的碉堡全面发起攻击，经过约一小时的战斗，很快将冬瓜沥（现翁源中学的山顶）自卫队的碉堡拔掉，到天亮时，相继解决龙仙东面（去南浦的山坳、山顶）的碉堡。这样一来，龟缩在当时县府档楼里（现县广播站）的敌人，就再不敢出来。至当日（15日）上午10时，我军用广播展开宣传攻势，命令县长官家骥投降，并通过当时翁源县商会会长马云章去劝降。但官家骥误认我们仍是“土八路”（地方游击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拒不接受投降，并利用其早已修好的坑道防御工事（这条坑道可由县府直通县府背后的碉堡进行指挥）继续进行顽抗，因此，劝降不从，我军接连数次发起冲锋，也仍不能奏效，且还牺牲了10多名战士。正当战斗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我在龙仙河口大桥东南边山上的排哨，突然发现在龙仙南面南龙站方向

的公路上，有一股穿黄军衣的武装。最初我们判断可能是国民党派来解救龙仙之围的增援队伍，因而据此情况，我方立即将全部非武装人员和伤病员转入社岗下的楼房里，并在楼房门口架起重机枪，准备迎接战斗。此时，大军429团梁团长在外面仍继续指挥攻击龙仙县政府，我则留在楼房里协助薄政委做老百姓的安定工作（当时，楼内仍有约10多户居民）。约经过一个多钟头后，我们才弄清楚，并不是国民党派来什么援军，而是驻翁源江尾黄炳中的国民党地方自卫联防中队向南逃窜（按：黄炳中率领的这支联防中队，是我大军围攻坝仔时仓皇潜逃出来的）。

到10月15日下午4时许，我围攻坝仔的山炮营一个连先行开到龙仙，我们就立即组织炮击，即在岗下山顶架起一门大炮对准县府档楼，一炮就打掉档楼的一个大角。为了保全龙仙城内的建筑和居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开了一炮之后，我们又继续采取政治攻势，并再次通过商会会长马云章去向官家骥劝降，转告我军的警告和我们优待俘虏的政策，指明只有投降才有生路。与此同时，还要马云章转告官家骥，令他于当日（即15日）下午5时前无条件投降，否则就继续组织炮轰官家骥用作指挥部的县府档楼。此时，官家骥已认识到自己面对的并不是什么“土八路”，而确实是被南下大军重重包围了。为此，他被迫立即答复表示接受无条件投降，但要求给予保障生命安全。嗣后经马云章先生数次往返传达，于是日下午6时许，我方派我代表接见了县长官家骥，警察局长陈遐观，谍报组长赖剑夫三人。接见时，我即向他们说明我军对投降人员的政策，并责令官家骥立即下令其全部武装人员放下武器，等待接收。至此，围歼龙仙之敌的战斗结束，翁源县城龙仙宣告解放。

1949年10月17日，我北一支队三团团长兼政委涂锡朋，三团政治处主任苏秉鉴率三团一营由翁源周陂赶来，进入龙仙接管建立翁源县新政权的工作，并根据我边纵区党委及翁江地委的命令，宣布涂锡朋任中共翁源县委书记兼县长，苏秉鉴为副县长，张国青、许先觉、官平等分别担任县人民政府各科室的主任、科长，陈心镜、黄社珍分别任新政权的龙仙镇正副镇长。我在完成代表地方与南下大军的联系，及对国民党翁源县政府的接管工作后，又回到翁北区（五个大乡）任区委书记，主要任务是组织筹粮和抢修公路桥梁等支前工作。

在这次解放龙仙的战斗中，合计俘虏了国民党翁源县长官家骥、警察局长陈遐观、刑警队长（特务头子）赖剑夫、赖亚正及保安队一个营的反动武装军警人员等共360多人，敌党政人员155人。我们入城后，还处理遣散了一批敌党政人员，释放在狱犯人（包括政治犯）张成等42人，缴获迫击炮二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18挺，冲锋枪12支，步枪346支，短枪62支和弹药一大批。

在这次战斗中，由于官家骥反动顽抗且筑有加固的防御工事，因而战斗比较激烈，战斗时间也比较长，致使我方在战斗中也共牺牲了二十四名战士。

现在，40年已过去，回忆起在这次战斗中，解放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实在使人敬佩。

谨向为翁源解放付出鲜血牺牲的烈士致敬！烈士们永垂不朽！

笔者按：以上列举有关这次战果的数字，是根据陈心镜同志写的《解放翁源县城龙仙实况》一文引用的。

解放新丰城 俘虏陈中瑞

龙 景 山

1949年1月，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派陈中瑞为新丰县长。陈中瑞接到委任状后，盘算怎样才能安全到达新丰上任；他怕重蹈罗联辉、张汉良两个国民党县长被捉的复辙，避开畏途，率领保安团兵营300多人，从广州出发绕道河源、连平经隆街马头到新丰城上任。

中共东二支二团获悉陈中瑞的行程计划后，由团政委卓扬、团长龙景山等带部队于马头甑洞木棉树地方打伏击，打得陈中瑞抱头鼠窜，钻山道经岳城逃至新丰城，在书院挂牌办公。

陈中瑞上任后，一方面积极搜集反动武装400人，组成国民党县自卫总队，陈德馨任总队长；'下设两个营九个中队，配有重机一挺、轻机五挺及六五步枪数百支，弹药充足。一方面在县城北楼背山（又叫西门岭）筑起两座碉堡，在县府右侧角建起一个炮楼，藉此防御工事护身，企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但因力量所限，他又不敢轻举妄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直下浙赣，逼近粤境，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挺进，新丰解放指日可待。其时，有一个与陈德馨总队长要好的民主人士名叫侯和，他根据新丰面临的形势，表示要为人民立功，试图去劝陈德馨起义。

他先到新丰马头找到东二支二团负责同志；再由二团派人作向导，带他进入新丰县府见陈德馨。侯和劝陈弃暗投明，走傅作义的光明道路。陈说：“我没有意见，只要陈中瑞怎样做，我就怎样做。”

陈中瑞是个狡猾家伙，内心鬼计多端。他借口说新丰绅士不同意。侯和只得返回马头，找新、连、河边第五区（隆街）区长赵准生出主意，赵立即写信介绍侯和亲找县参议长李福初面谈。李议长当即表示：地方人士没有意见，要陈中瑞自己选择道路。侯和急忙又进入县府，面对陈中瑞晓以大义，劝其和平解决。陈中瑞却以“拖”的态度，既不同意，也不拒绝，说要等一等，劝告形成僵局。

侯和只好向北一支队部何俊才、邓楚白、林名勋等领导汇报了上述情况。支队领导认为陈中瑞既然顽固不化，拒不投降，唯有采取军事攻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来解放新丰城；并布署作战计划，写信通知东二支二团配合行动。支队干部廖方明，自告奋勇，与侯和一起深入虎穴，做陈中瑞的思想工作。说来说去，陈中瑞的态度依然顽固。廖方明当面指出：“你陈中瑞有体面的和平解决却不干，以后你就会当俘虏。”陈中瑞骄横地回答：“难道我的碉堡挡不过你们的肚皮吗？”

按支队的作战布署，6月12日早饭后，邓楚白同志带领一、四团900多人，从梅坑出发向新丰城进军。途至横江，我前头部队与去催粮的县政警队一排兵相遇，敌人发现我部，掉头回县府。四团飞虎连追击前进，占领丘屋岭头和西门口一带高地；一团占领城南南门河两岸高地和一些村庄，堵住敌人向南跑之路；东二支二团副团长郑大东率领200余人，星夜行军赶到塔下，占领东门象岭，形成对新丰城的包围阵势，

待命攻城。

是日下午三时，四团开炮轰击碉堡和县城。在炮火轰鸣声中，廖、侯二人又在县府内再以诚劝告陈中瑞起义或投降，均遭拒绝。邓政委决定强攻，指示四团政委汤山、团长杜国栋，由钢铁连林会柱和飞虎连林时新各组成一个突击组，分别担负主攻北楼背两座碉堡任务。是夜凌晨二时，开始发起总攻。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夺占了敌人的碉堡，整个县城都在我军控制之下，国民党县府危在旦夕。陈中瑞苟延残喘，天将亮时还派一连兵向东门冲杀，企图抢占象岭，掩护其残兵往东逃生。不等敌人来到山腰，就被我东二团打得落花流水，狼狈缩回县府。陈中瑞四面楚歌，感到大势已去，无法顽抗，便在县府门前，竖起白旗表示投降；并派代表罗汉华（营长）和县府秘书×××前来谈降。他们见到支队邓政委和一团长梁泗源便哀求说：“只要保全其全体官兵的生命，就立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邓政委当即答应他们的要求，并令他们撤除县府内外一切警戒，由我方派兵接替，要他们把全部武器放在县府门前左边草坪上，投降人员则徒手站在右边草坪上，等待受降处理。

邓楚白政委代表支队，庄严宣布我军优待俘虏政策：“愿意留下的，我们欢迎；愿意走的，我们欢送。”我们把陈中瑞、陈德馨等送到达田支队司令部，经过何司令员反复讲明他们可以宣布起义，但他们坚决要离开，我们只好发足他们的路费，派部队送出游击区。县府秘书×××愿意留下，我们以礼相待，安排他的工作。其余的官兵，因大多数是本地人，领了路费，都愿回家团聚。

6月13日，新丰县城宣告解放。广大群众欢天喜地，共庆解放。

解放县城的战斗，计缴获重机一挺，轻机五挺，六五兵

枪五百支，短枪二十余支，弹药物资一大批。不幸的是，我四团飞虎连突击队员陈就同志于战斗中英勇牺牲，丘同志受重伤（记不起名字）。

解放前夕的曲江武装斗争

何 远 赤

1949年7月，南下解放大军已到赣南，即将向广东进军。赵学光同志和我先后到达始兴罗坝，向五岭地委副书记袁鉴文同志汇报工作，随即由他召集陈培兴、赵学光和我开会，宣布成立中共曲江县委，书记陈培兴，副书记程奇，组织部长赵学光，宣传部长李凌冰，武装部长何远赤。对曲江的武装斗争和地下党实行统一领导。决定原清曲大队主力上调主力团，曲江马坝、乌石、沙溪、小坑、大塘、河西等几个武工队，以北二支曲江独立大队的番号继续开展活动，大队长由何远赤担任。会后赵学光和我回到曲江马坝，同李凌冰同志一起，代表县委在演山召开了有二十多人参加的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了地委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讨论了曲江的工作任务。主要是进一步壮大武装力量，加强农会、民兵、学生、工人的组织宣传工作，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做好统一战线和瓦解敌军工作，筹措军粮马草，准备配合大军解放曲江。会上宣布成立曲东、曲南、曲西三个区委：曲东区委书记何耀爵，副书记何耀恒，组织委员叶国林，宣传委员何龙；曲南区委书记何英，组织委员陈耀康，宣传委员官怀民；曲西区委书记范家祥，组织委员丘精忠，宣传委员杨宜华。

演山会议以后，李凌冰同志返回韶关继续负责秘密工作，

赵学光和我留在马坝乌石地区，负责指导三个区委和武工队的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各区委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马坝、乌石、沙溪、小坑、大塘等几个武工队都发展到五、六十人，河西武工队发展到近百人；农会会员发展到六千多人，民兵发展到近二千人；筹措军粮，马坝达一千多担，乌石四百百多担；小坑乡民主政权进一步巩固，马坝乡的两面政权也进一步得到加强，由党所掌握的马坝联防大队和各保的常备中队，充实了骨干；同民主人士密切了联系，在马坝乌石地区成立了有民主人士参加的支前小组；乌石武工队加强了对反动的乌石联防大队的瓦解工作，有朱光等两名士兵携枪向我投诚。此外，还对铁路、公路沿线的桥梁、涵洞、碉堡和敌军情况进行了调查，为大军南下作战提供情报。八月间，传来了北二支主力团在解放大军炮兵部队的配合下，解放了南雄县城的消息，对曲江游击队的工作推动很大。

马坝怎样迎接解放？开始曾经考虑，由打入国民党马坝乡公所担任乡长的罗玉麟同志率领联防大队举行起义。经过请示，地委领导同志认为，起义是可行的办法，问题是掌握好时机，考虑到马坝是迂回解放韶关的基地，也是支援大军南下的基地，如果过早举行起义，引起国民党的反扑，对我工作不利，因此，应坚持到能够坚持的最后一分钟。根据地委的指示，赵学光和我曾约罗玉麟一起研究，认为敌人对我党在马坝的秘密活动还不摸底，再坚持下去是可能的，还定了三条措施：一是罗玉麟不住乡公所，一般情况下每天到乡公所应个卯，就找借口下乡去；二是加强对韶关方面情况的了解，发现情况异常就拉出来；三是联防大队加强戒备，同时加强阳岗、龙岗、石堡、濠溪等几个常备中队的工作，配备好一点的武器，作为依靠的力量。罗玉麟胸怀大局，不畏

艰险，为贯彻地委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农历八月初七日，也就是公历九月廿八日，按照原来的决定，准备在欧山甘元同志家里召开支前会议。赵学光、杨维常、何远赤、何英、官怀民、陈乃仁、甘锦轩以及民主人士杨际春、饶克明等都在九点钟前到了会，就只有罗玉麟和在联防大队搞秘密工作的张显儒还没有来。大约到了十点钟左右，只见张显儒急匆匆地跑来报告，罗玉麟夫妇已被反动专员兼曲江县长龚楚逮捕。他说：当天早上罗玉麟夫妇从陈子园老家来到联防大队部时，才知道龚楚带了一个保安连到了马坝河背廖安记铺内，并派人到乡公所和联防大队通知，要见罗玉麟。张显儒曾问罗，去不去见好？罗玉麟临危不惧，回答说：“我是乡长，又是联防大队长，不去见就等于自我暴露。”罗到乡公所后，早已等在那里的保安连人员陪罗一起去廖安记处，当走到桥头时，便把罗的手枪缴去，押进廖安记内，同时逮捕了罗的爱人陈慧贞，张显儒是在得悉罗夫妇被捕后赶来欧山的。接着不久，在联防大队搞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郑来苟也来到欧山，报告联防大队的枪支已被龚楚收缴。大家听到罗玉麟夫妇被捕的消息，都很痛心，对他在危难面前挺身而出的精神，感到敬佩。当时曾考虑组织武装力量，冲进马坝去抢救罗玉麟，但由于对敌情不了解，大家认为还是派人把情况弄清再定。后来，派去打听情况的同志到了马坝街口就跑了回来，说驻在马坝叶屋山的国民党三十九军也已出动，派兵封锁了街口，各类人等只准进不准出。怎么办？我们和民主人士杨际春一起做了情况估计：一种可能是敌人对我党的秘密活动还不摸底，对罗玉麟只是怀疑，如果这样，我们就发动乡绅争取保释；另一种可能，是敌人对我党的秘密活动已经掌握，要对我党和民主人士进行大逮

捕大屠杀。大家认为，要把我们的立足点放在迎接最艰苦的局面上，才能避免受到更大的损失。于是决定，在马坝留下何英、陈耀康，在乌石留下梁镜，各带一部分人员继续坚持，把一些老党员、民主人士、原在联防大队和常备中队做秘密工作的人员，以及农会民兵的部分骨干，立即转移到游击队，并决定当晚在龙头寨召开紧急的组织动员会。到当天下午，我们了解到，罗玉麟夫妇已在当天中午坐火车押去韶关。

当晚参加龙头寨会议的有一百多人。由我作了动员之后，进行编组。由于人员比较多，民主人士年纪又比较大，为便于行动，把转移人员编成两支武装队伍。一支由我和赵学光、官怀民负责，以马坝、乌石武工队各一部为骨干，加上马坝石堡、乌石鹅鼻的部分农会、民兵骨干、常备中队队员，共七八十人，经乌石的鹅鼻、杨梅洞直插沙溪乡的老区凡洞。记得编在这队伍的有陈乃仁、陈爱莲、赖潮、肖戈、罗创、黄河、官金、官政光、叶明、梁伍等。另一支队伍由杨维常、甘锦轩负责，以马坝武工队的一部为骨干，加上阳岗、龙岗、溁溪的定会民兵积极分子、常备中队队员、马坝联防大队秘密工作人员组成，经南华、溁溪到苍村演山一带坚持武装斗争，也有五六十人。记得编在这支队伍的，有罗福添、罗群发、杨际春、饶克明、何远吉、江汉才、张贞瑶、杨咏娴、杨宜珊、杨兆顺、杨宜鸿、杨锐祥、杨容祥、杨祯秋、甘仁、甘明、赖明等。这两支队伍，都在第二天拂晓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这支队伍到达凡洞后，即与沙溪武工队的陈平、卢万等会合。为及时掌握马坝乌石的情况，立即派出侦察员回去与坚持的同志取得联系。其中，派回乌石的罗创、黄河在途经沙溪船肚的时候，遭到反动地主武装的袭击，光荣牺牲。这时候，传来了始兴县饶县长起义，配合北二支主力团一举

解放了始兴县城的消息，对全队同志鼓舞很大，盼望已久的曲江解放的日子不会远了。当时我们一面对部队进行整顿，编成一个主力中队，下辖两个小队，中队指导员官怀民，副官陈乃仁，小队长赖潮、梁伍，配齐了正副班长，同时加强军政训练，提高战斗力；一面帮助沙溪武工队发展农会民兵组织，筹措粮草。根据凡洞早已为我游击队所控制，群众基础好的情况，决定成立凡洞村人民政府，选出民兵排长陈有为村长，老民兵伍胜为副村长，这是继小坑乡人民政府之后，在曲江成立的第二个红色政权。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得悉了小坑武工队遭受袭击，何耀爵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10月1日，交通员送来了曲东区委书记何耀爵、副书记何耀恒先后写的两封信。何耀爵的来信是9月27日写的，主要是向县委汇报小坑枫湾方面的敌情和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情况，这信先送去马坝，然后由马坝送来，因而耽搁了时间；何耀恒同志的信是9月30日写的，主要是向县委汇报何耀爵同志牺牲的情况；9月28日下午，小坑武工队在小坑圩完成税收任务以后，撤到塘背村休息，当时天热，有些同志到河里洗澡，正好发现敌人从枫湾方面向小坑圩、塘背村包围过来，何耀爵同志立即组织抵抗，边打边向河洞方向撤退，他自己撤在最后掩护。当撤到塘背村后山腰时，双腿受了重伤，但仍坚持战斗，最后弹尽牺牲。敌人残酷地把耀爵同志的头颅割下，带去枫湾街搞所谓“示众”，真是惨无人道。何耀恒同志是在大塘武工队听到消息后赶去小坑，把善后工作做好以后给我们写的信。当我们告诉部队何耀爵同志牺牲的消息后，大家都非常痛心，回想起他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同志诚恳热情，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优良品德，许多同志泣不成声，纷纷表示要为烈士报仇。何耀恒

同志还在信中告诉我们，经过教育，小坑武工队情绪稳定，斗志很高，都决心把迎接解放的工作做好。

与此同时，坚持在马坝、乌石的同志针锋相对地向群众揭露敌人垂死挣扎的凶恶本质，宣传我军已解放南雄、始兴，即将进军曲江的大好形势，抓紧健全农会、民兵组织，补齐骨干，进一步筹措军粮马草。经过同乡绅的协商，推举中间人士甘宝山担任马坝乡长。何英同志还派人去韶关向李凌冰同志汇报了罗玉麟同志夫妇被捕的情况，打听有无营救的可能，李凌冰同志通过内线了解到，罗玉麟在狱中虽经严刑酷打，仍坚贞不屈，敌人抓不到一点证据，答复何英可以考虑发动乡绅担保，争取释放。何英约见了甘宝山，准备通过他串连乡绅连名保释。正在酝酿的时候，却传来了罗玉麟同志被害的消息。罗玉麟被捕只有六天，没有任何证据就遭杀害，更充分暴露了敌人的凶残。

当时形势发展很快，按原来进军广东的作战计划，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准备从南雄兵分两路，一路经始兴清化直插曲江的乌石、大坑口，一路经仁化西插乳源，把国民党的39、63两个军歼灭在韶关地区。国民党正规军为逃脱被歼的命运，在10月3日就开始向南溃逃，只留下国民党的保安部队守备韶关。我们在10月4日下午得悉驻马坝的国民党39军正狼狈南逃的情报后，决定除留下沙溪武工队做好接受沙溪乡公所的准备外，把主力中队开回马坝，配合大军解放韶关。为取得地委领导的指示，我们商定赵学光同志立即出发去始兴向地委汇报、请示工作。赵一行走出不远，就在太平途遇上了一支解放大军，这是四兵团十五军侦察科长带了一个侦察排三十多人，由北二支主力团派了一个班配合，从始兴经凡洞，准备到乌石大坑口一带侦察敌情，为大部队直插大坑口做准

备。赵马上把他们带回我们的驻地上寨村。这是曲江游击队同解放大军的第一次会师，全队同志都涌到大门外争着同解放大军握手，不少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对侦察排的同志说：“你们辛苦了，我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侦察排的同志则说：“你们在敌后坚持斗争更辛苦！”附近的群众听说来了解放大军，也争先恐后地跑来以一睹为快，形成了热烈欢迎的场面。我们想尽办法加了菜，招待大军同志一起食了晚饭，大军同志则送了我们许多子弹。由于国民党正规军已闻讯而逃，侦察排的同志也改变任务，向翁源新江方向前进，赵学光则随主力团的一个班去始兴，我们也随即离开凡洞，向马坝苍村进发。

当我们经过沙溪长田洞的时候，群众听说游击队去解放马坝，都提壶挈浆地来到路边慰劳我们。张屋村有一个地主叫张善士，原来对我们怀有戒心，不让游击队到他们村里活动，这时候也来献殷勤，到路旁慰劳我们，还牵了一匹马要送给我们，说是“给大队长代步”，我们向他反复宣传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婉言谢绝，这在当地群众中一直传为佳话。

10月5日我们到达苍村，便同杨维常、甘锦轩带领的队伍会合。何耀恒也从大塘来到苍村，向我们汇报大塘方面的情况。5日下午，地委派人护送来近十名做敌军工作的同志，从始兴日夜兼程到达苍村。他们个个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有的佩戴校官军衔，有的佩戴尉官军衔，要求我们把他们安全护送到英德，力争能赶上溃退的国民党军队。看见他们疲劳的神情，我建议他们休息一天再走，但是他们都不肯逗留，我们只好派人把他们送去乌石，嘱咐乌石武工队梁镜物色熟悉英德的可靠人员，把他们护送去英德。敌军工作人员这种不畏艰险，不怕疲劳的革命精神，使我们游击队受到深刻的教

育。

经过侦察了解，这时韶关还有国民党的保安部队千余人，马坝圩内也还有一个由白土人胡志平任连长的保安连。据此，我们用北二支曲江独立大队的名义给胡志平写了一封信，讲明形势和我党政策，指示他只有向人民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同时准备把部队迁回到白马庙大文山一线，断敌西逃后路，迫敌投降。10月6日拂晓，我们队伍开进到漠溪丘屋村不久，何英同志也从龙岗赶来丘屋，告诉我们敌人已向白土逃窜。我们在丘屋吃过早饭，对部队再次进行了城市政策和纪律教育，便向马坝圩进发。马坝附近的群众听说游击队来了，敲锣打鼓涌向公路两旁，夹道欢迎我们。我们队伍沿着公路一直开进马坝乡公所，甘宝山早在那里等着我们，一一向我们交点了各种档案文件和财物。我们还派人接管了警察所和田赋处，然后派出巡逻小组和工作组，向群众宣传我军政策和纪律，要求各界人等照常营业，并维持好社会治安。当时铁路已经没有火车行驶，但马坝火车站有一辆人工摇动的工程车，当天中午我们就派出官怀民带领一个小组，乘坐工程车前往乌石，会同梁镜等一起接收了乌石乡公所。沙溪武工队陈平、肖戈、卢万等也在10月7日接收了沙溪乡公所。曲南区委所属的三个乡，至此全部解放。

为保证安全，我们把独立大队部驻扎在当铺，部队都驻在当铺内。10月7日凌晨4时左右，在老叶屋方向警戒的哨兵跑回大队部报告，大批解放军正在沿公路南下，大家由此判断，韶关已经解放，都非常高兴。消息一传开，许多群众都涌向公路两旁，对南下大军表示热烈的欢迎。7日早饭后，为同上级取得联系，接受指示，我们派何耀恒同志前往韶关。民主人士杨新解放前在韶关马坝间搞运输，耀恒就是乘坐他

的汽车去韶关的。根据袁鉴文同志的指示，耀恒随即赶去大塘，会同小坑、大塘武工队的叶国林、何龙等，先后接收了大塘、枫湾、火山等乡公所。河西武工队的范家祥、杨宜华等也在这时候接收了白沙、白土、樟市、罗坑、龙归等乡公所。10月8日上午，我们在马坝鸡仔坝广场召开了庆祝解放大会，参加的群众有数千人，广大群众笑逐颜开，敲锣打鼓庆祝自己的解放。

10月9日，中共曲江县委和曲江军管会的领导，派杜国彪、许文明同志到马坝向我们传达，曲江已成立新的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县委书记袁鉴文、副书记黎晓初，县长黄桐华，副县长曾东；全县成立六个区，一区区委书记许文明，区长何远赤，副区长何英；二区区委书记张战，区长范家祥，副区长杨宜华；三区区委书记张永信，区长何国文，副区长叶国林；四区区委书记张普，区长何耀恒，副区长陈耀康；五区区委书记石进明，区长范兰胜；城关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曾东，副书记武杰。当前工作，以支前为中心，同时搞好区乡政权建设。根据县里的指示，我们随即宣布成立了第一区区委和区公所，配齐了工作人员，建立了区中队，队长江汉才，指导员林杰明，并分别成立了马坝、乌石、沙溪乡人民政府。马坝乡乡长陈乃仁，副乡长罗福添；乌石乡乡长官怀民，副乡长梁镜；沙溪乡乡长甘子平，副乡长陈平。在此同时，县委从马坝抽调了杨维常、杨际春、张永芳、饶克明、张漪珊、张贞瑶、杨咏娴、陈爱莲、饶克钜等一大批同志去韶关，另行分配工作。至此，北二支曲江独立大队，也就完成了她的历史任务。

曲江解放前夕的支前准备工作

何 国 文

一、设立韶关市地下交通站，接送进入游击部队的人员转运生活用品和药物。

1948年冬，我接受中共曲江县地党组织的指示，在原曲江县附城镇（现韶关市）建立地下交通站后，便通过、利用住在县城老东门直街某大院内我妻姨的亲戚关系，托请她在该大院内设法代租到一间住房，作为交通站地址之用，并经地党领导李凌冰同志的同意，即于1949年初起，会同由组织上派来的交通员、青年农民党员何远安，一起进行工作。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接送外来人员和本地区的青年学生以及转运生活用品和药物进入游击部队。计从1949年1月至5月的五个月间建站期间，共接送了由省、港、澳、新（新加坡）、马（马来亚）等地前来入游击部队的人员十多批，约五、六十人（其中有从香港来的我五岭支队的副司令员黄业同志及其夫人），和少数由北方来的人员，并分批接送了志愿参队的韶关市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三、四十人（主要是志锐中学的，其次是韶关师范和曲江中学的）；转运了好几箱由学生们捐集而来的运动胶鞋、劳动手套、塑料牙擦和毛巾等的生活用品，以及由杨泰湖同志在其所在的任职部门搞来的注射药针和由罗宽同志在其家里开设的药店搞来的常用

药品。交通站设在大杂院内，的确是一个险地。背后靠近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院里杂居着一些国民党的退役军官（我妻姨的丈夫也是其中之一）。幸喜这些退役的国民党军官，大都是熟识的人，他们又是常常外出去做水面生意（走私），少理别的事情，我们就是巧妙地利用这种复杂环境的有利条件，警惕地、谨慎地、灵活地进行着工作，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和失误，按预定时间完成上面交予的任务。至五月底，交通站交由傅南安、甘秉华等同志接替任务，我和何远安被调往马坝武工队。

二、为做好迎接解放韶关市的各项准备工作，我引荐市郊东厢乡老农会骨干谭维亚给与地党领导李凌冰同志，并帮助策划他出任东厢乡长，便于我党的活动。

谭维亚是韶关市东厢乡教场村人，早在大革命时期，便参加了农会和农军，为东厢乡老农会骨干之一。他在曲江县农运领袖欧日章、梁展如、叶凤章等同志的率领下，曾参加了1927年北伐队伍，继又随梁展如回师转战粤北地区。大革命失败后，居住在家，并与梁展如和西水重阳乡青水塘村的老农会骨干雷国光保持联系，掩蔽活动。迄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军兴，梁展如即于1938年春间来到马坝，进行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并在这时期也恢复了与谭维亚的战斗友谊和来往。在1938年底前，梁展如担任马乌党支部书记期间，主张和支持谭维亚争取当任东厢乡的乡长职务，开展抗救的群众运动。从1939年初起，梁展如被调离马坝后，彼此间便少有来往了。直至1949年春起，全国解放战争急转直下，解放军并挺进江西，很快就进军广东了。因而，我们地党的工作任务，便要转入做好配合解放曲江的准备，重视掌握和扩大武装力量，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桥、护校等斗争。为此

目的，就必须首先打开韶关市附城区的工作局面。四月底至五月初，我与李凌冰同志亲自找到谭维亚，主张他继续出任东厢乡乡长。果如所愿。为加强工作，地党组织又将原在周田中学校教学的潘文华（中共地下党员）调到东厢乡协助谭维亚工作，并要求谭给潘掌握乡自卫队，担任大队长职务，保卫曲江大桥。谭在地党领导同志的配合指挥下，工作做得不错，表现也好，能放手信任潘文华指挥和运用自卫队的工作，使党能完全掌握自卫队四十多人枪的全部武装力量，并在曲江解放前夕的关键时刻及时地武装起义，既保护了敌人原定要炸毁的曲江大桥，又顺利地开展了各项支前的准备工作。

（三）参与统一编队，筹集粮、柴、草和发动民工群众从事磨谷、运草、设茶水站，做好接待过境南下解放大军的支前工作。

1949年农历八月初七日，担任马坝乡长的地下共产党员罗玉麟突遭反动派逮捕后，当天晚上，何远赤同志即在龙头寨村主持召开一次紧急会议，研究有关措施。当时到会的人员很多，会场内外都挤满了人，他号召大家提高警惕，提防反动派临死挣扎，对马坝地区进行大扫荡大屠杀。要准备战斗，迅速撤退转移。当即将所要撤退的人员组成两支队伍：一支由何远赤带领，一支由杨维常、甘锦轩带领。随后，改为按地区编队，即是在小坑、石堡一带的由杨维常带领；在龙岗、阳岗和马坝乡的自卫队部分人员，由甘锦轩带领；在湔溪一带的由丘其忠、何国文带领三支队伍先后撤至苍村大岭背和寨下的大山上汇合，辗转流宿了三天的时间，后决定再往始兴清化方向远撤。远撤前，三支队伍又在苍村水曹坝集中统一编队，并由甘锦轩亲自组编一个由丘卓峰等十人组成行军

联络的尖兵班，专门负责先行开路，了解掌握敌情等任务，以保证队伍行军的安全。队伍在傍晚天黑后开拔，当行至滇山杨屋山边时，党委领导人赵学光以及何耀恒、何远照等同志在等候着我们，通报南下大军即将进入广东的情况，并决定队伍不再远撤，各地人员返回原地，向广大农民群众开展宣传和号召筹集粮食（稻谷）、马草（禾草）、柴火、蔬菜等物资，以及组织临时民工运输队伍负责运输。滇溪的队伍返回原地后，丘世柱、陈志奋、丘卓峰等负责上下丘屋的宣传筹集工作，并将筹集的稻谷集中到设在下丘和石板冲两个村的仓库存放并交由丘卓峰负责管理。农历八月十六日早上，何远赤带领的队伍和两个大军的便衣干部，开到上丘屋陈志奋教书的学校。这两个大军便衣干部，是南下广州，进行策划国民党军起义工作的。他们要会见我马坝地党的何英同志。经何远赤、陈志奋、丘世柱等同志研究决定，派出丘卓峰（地下新青团员）和邓细牛两人护送到石堡小学会见了何英同志。据丘卓峰说，在护送途中休息时，两位大军干部曾将夹在火柴盒里面的证件给他们看过，是第四野战军第四兵团政治部的，一个姓蒙，一个姓吕。后来又听官怀民同志说，一个是师级、一个是团级干部。

在临解放前的几天中，我在滇溪带领上下丘村的民工集中在丘亭家里（交通站所在地），日夜赶着稻谷和运输柴、草，做好一切支前的准备。

在暮谷的一天早晨，南下解放大军的先头部队，突然路经此地，并进住了下丘村的群众房间（卧室）。该村妇女感到不适宜于当地的习惯，便来到暮谷的丘亭家里找我，要我前去解决一下。后经我与大军的带队干部联系交谈和互相了解情况后，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原来，南下大军为了得到行

军中的临时方便休息和安全，在途中便有一时进驻群众房子的习惯，但严格遵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保持民房的整洁，绝不会对群众有所损害。当群众了解实情后，大家也就放心下来了，都表示欢迎大军进驻；又感到日夜盼望的解放的光明时刻已经来临，就更觉得无限慰藉了。

作者注：谭维亚在解放后被分配在曲江县地财股任股长职。1952年土改复查时，被判刑入狱，病死狱中。后来未悉有否复查落实？

迎接韶关解放的回忆片断

莫 德 炜

为迎接韶关解放，中共地下组织于1949年4月28日，在韶关市内仁爱路四十八号（现为和平街五十号）罗宽同志住家二楼，召开过一次会议，进行研究和部署。当时到会的有赵学光（女）、李凌冰、莫德炜、李仲华、邓启明、洗颂柏6位地下党员。在这次会议上，首先，由赵学光同志传达上级关于解放战争形势的分析，讲明为了适应迎接解放韶关的形势需要，决定成立中共韶关地下临时市委，并由她指示作了分工。会上，对迎接韶关市的解放的各项工作进行了部署。按照这次会议的分工，我（当时是志锐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由地下党组织安排，于五月初到陈维廉为院长的曲江卫生院检验室任化验员，以这个公开职业作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现在，趁韶关解放40周年之际，作一些片断回忆。

（一）为了保证人民解放军顺利入城解放韶关市区，必须准确无误地探测清楚包围市区浈武两江河流的深浅和有利于武装泅渡的地点、地形、地貌，并要求测绘好草图。为此，我曾与李凌冰、凌加同志多次以游泳活动的姿态，分地段进行了探测。后由于李凌冰工作繁忙，凌加离开韶关参加游击队，此项工作任务，则由我一个人去完成。

记得当时探测后，草拟的可武装泅渡两江的主要地点有

三个：一是首先占领韩家山制高点和火车站后，可沿赣韶公路进入东河坝东西路口与江对面市内的互励路德教堂（现为市委）为目标地段，是最有利的武装泅渡地点；二是从赣韶公路经腊石坝至东北面的牛头潭地段渡过浈江南下，抢占帽子峰制高点后，可分兵从民生路尾进入市区；并在五里亭以南和帽子峰以北山脚一带，武装泅渡武江到黄田坝南下，以利占领芙蓉山制高点，形成包围韶关市区小岛的包围圈；三是火车站以南二公里处，以河西循道医院为目标地段，可武装泅渡到旧飞机场后进入市区。

在这期间，我还利用一切机会以野外郊游或以寻草药为名，跑遍了韩家山、帽子峰、芙蓉山这三座可以完全控制韶关市区的山峰、山坑、隘口，并对这三座高山的地形、地貌、地物、碉堡、上山道路都进行了实地观察，画了草图上报游击队的“山海关”（司令部代号）作参考。

（二）为了达到策动守卫曲江大铁桥和南门公路大桥的国民党军队，在撤退时不予炸毁的目的，我曾在杨泰湖同志（他有国民党退伍军官身份和服装）的带领下，多次与国民党的退伍军官和驻韶的现役军官同桌“打麻将”，希望从中认识和了解国民党驻市军官和驻韶的一些基本情况，尤其希望能通过他们的关系认识军队中负责守桥的军官。我记得曾两次与曲江大铁桥的守桥军队的一个排长联系上，并且与他作了口头协议——以五两黄金作为不炸毁曲江大铁桥的报酬（当时我们是以韶关市工商界民间人士代表身份与国民党军官进行谈判的）。但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自身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不断调换守桥人员的措施，造成无法达到我们护桥的目的，最终招致曲江大铁桥被炸毁，南门公路大桥被炸坏的损失。

(三) 为了实现上级关于韶关市解放后的社会政治安定，生产迅速恢复，经济生活正常运行，各类学校尽快复课，以及“支前”工作的顺利开展的要求，我们地下党组织所有成员都为此任务而紧张秘密地千方百计地去联络、宣传、动员韶关市内的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广大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鼓励他们认清形势，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保护工厂、保护医院、保护学校，加强联防自卫，筹集大量粮油食品、棉布百货支援解放军，支援解放战争的前线需要。记得当年经我联络接触过的有关人士，他们都很积极，起了良好的作用。如：曲江卫生院陈维廉院长等，志锐中学梁炜勋、黄开光、饶纪寰、黄兴亚、苗漳州等老师，除了积极宣传外并以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护医院的财产，保护学校的设施，没有遭受到破坏或财产（档案）的损失（烧毁）。在工商界人士中，如民生路德记粮行老板梁景德，东河坝民生火柴厂厂长关崇振，民权路成记纸行老板何××（解放后担任了市工商联副主委），民生路墨江会馆的始兴民船公会总干事莫世官等，都曾支持游击队，帮助地下党做交通联络工作，支援前线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因此，解放初的韶关市，出现了人心安定，生产恢复快，学校复课早，经济生活正常的好景象。

(四) 为了宣传人民解放军的《约法三章》，以利消除谣言，减少群众顾虑，安定人心，以及震慑反动势力，按照上级的指示，我在1949年的8、9月间，曾多次在夜间或清晨，利用散步（行街）、跑步、骑自行车等形式到东西河浮桥附近、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中山公园、南门桥、旧飞机场一带将布告（即约法三章）散发或张贴。

1949年10月7日韶关市解放的第一天，市内根本没有发

此令 九四九、七、十九。
 曲江警备司令部
 莫德炜
 曲江警备司令部
 莫德炜
 曲江警备司令部
 莫德炜

△ 图为曲江警备司令部给莫德炜的手令。

生战斗，我们都很从容地上街贴布告。这时街道无行人，商店住户都关门闭户。这原因，主要是地下党组织早已派潘文华同志与曲江县韶关镇和东西厢的自卫大队领导人顾昌煜取得了协议；在国民党军队逃跑与解放军未到的真空期间，由自卫队和民间联防队维持社会治安，所以，在市区解放前夕，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抢劫、烧杀等不幸事件。

(五) 在韶关市解放初期，我先后在军管会、县公安局、曲江警备司令部协助搞接管，收缴民间枪支弹药，维持治安等工作。记得在收缴民间枪支时，民生路德记粮行的梁景德，不仅将他本人私用的自卫美制左轮手枪1支和数十发子弹我(我)转交给公安局处理外，还积极协助我们做了许多工作。

保护曲江大桥的斗争

李 景 昌

韶关是粤北重镇，在军事上处于咽喉地位。韶关城南的曲江大桥长约200余米，水泥钢筋结构，横跨浚江，连接河东和市区。如从东面进攻韶关，曲江大桥是必经的通道。

韶关解放前夕，在我南下大军和北二支队强大军事进攻下，驻守这里的国民党39军、63军一部，狼狈逃窜。为了阻止我军的追歼，他们破坏交通、制造混乱，企图炸毁曲江大桥。针对敌人的阴谋，中共曲江地下党发动群众展开了一场艰苦曲折的护桥斗争。一方面派地下党员打进韶关东厢乡自卫大队，策动这支队伍武装起义和保卫大桥；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做负责炸桥任务的国民党军官的统战工作，劝阻他炸桥。

韶关东厢乡，包括浚江以东的大片地区，北起黄金村，南至白芒坳，东抵府管大塘山脚，辖管9个保。南韶公路和京广铁路的一段，铁桥、曲江大桥东端以及火车站均在这一辖区内，是韶关一方重要战略区域。乡自卫大队有近40人枪，武装比较精良。如果把这支主要负责这个区域的治安和“三征”队伍，能为中共地下党争取过来，确定保卫曲江大桥的重要武装力量。东厢乡乡长叫谭维亚，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北伐，后来一直呆在这里。他为人较开明，在当地有威信，是

可以争取的对象。中共地下曲江工委宣传部长李凌冰同志，曾只身冒着危险上门找他，表明自己的身份，对他讲清形势，晓以大义，指明出路。经过一番工作，谭维亚表示同意接受地下党派代表领导该乡的自卫大队。

1949年5月中旬，原在曲江周田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潘文华来到韶关接受任务。李凌冰郑重对他说：“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大军已渡过长江，挺进江西，很快就要进军广东，全国很快要解放了，我们的任务是配合解放曲江，要掌握和扩大武装，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桥、护校等斗争。这场斗争仍然很艰苦。”接着，向他交代了具体任务：“派您到韶关东厢自卫大队担任大队长，任务是掌握好这支武装队伍，策动起义，保卫曲江大桥。同时，做好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当时，潘文华满怀信心地表示，一定想尽办法完成任务，不负党的重托。

一天晚上，李凌冰带着潘文华来到谭维亚家里，再次向谭指明前途，并说：“他就是派到你们乡协助工作的我党代表潘文华同志，今后有事你要同他商量，自卫大队交他指挥。”谭连连点头。为了安全，便于开展工作，谭维亚与潘文华以表叔侄相称。

在东厢乡自卫队里，潘文华紧张进行了策动起义和护桥工作。他除了去乡里上层人士中周旋，巧妙隐藏身份外，主要精力放在争取和掌握自卫队士兵上。经过细心调查，他弄清自卫队绝大多数队员都是出身贫苦的当地农民，还有几个过去曾被我军俘虏遣散的“猪仔兵”。他们本质是好的。为了增加与队员的接触，多做思想工作，潘文华搬进乡公所同队员生活在一起，从拉家常入手，引出他们的苦楚，进行阶级启发。经常利用晚上聊天，向他们透露国民党节节败退，全

国快解放的消息。外出执行任务时，教育队员不要做坑害乡亲父老的事，同时孤立了个别思想较顽固的分子。经过潘文华的工作，自卫队大多队员觉悟有了提高，对潘很信任，都愿听他指挥。为了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尤其做好自卫队员的思想工作。不久，曲江工委又从北二支的武工队抽调了副排长杨武到自卫队任副班长，协助潘文华掌握这支队伍。

1949年9月11日，叶剑英在江西赣州主持召开中央华南分局和南下野战军领导联席会议以后，部署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北二支政委张华也参加了会议，接受了配合大军作战和支前任务。入粤作战第一步是解放曲江，负责这个战斗任务的二野四兵团三个军分左、中、右翼包围韶关。此时，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北二支曲东武工队在何耀恒的领导下十分活跃，公开在东厢、城东南、府管一带组织农会建立民兵、筹粮支前。何耀恒还定期和潘文华碰头，交流情况，有力配合潘的工作。这时，韶关守敌39军沿粤汉铁路南逃，火车列列都是载满逃去广州的国民党兵，63军则计划向乳源方向西窜。浈江沿岸及火车站一带秩序极其混乱，抢劫事件屡见不鲜，一到夜间即实行戒严，店门紧闭，路无行人。曲江大桥则日夜戒严，白天严格盘查过路人，夜间不准通过，敌人加紧进行破坏大桥的准备工作。

在这关键时刻，曲江工委指示潘文华一定要想尽办法保护大桥。潘文华带领自卫队利用巡逻之便，到曲江大桥侦察敌情。守桥敌军有一个连，桥的两端分别筑有2个碉堡，配备了4挺机枪，形成对桥面的火力交叉网。桥头敌守军的驻房里已存放了一箱箱炸药和十几桶汽油，炸桥已准备就绪。潘文华与杨武经过研究，认为严密监视和控制守桥的敌人迫在眉睫，他们分头活动做自卫队员的思想工作，指明形势前

途。自卫队队员因平时接受了他们许多教育，眼看国民党末日来临，都表示不再给国民党卖命，拒绝执行上峰要他们向乳源逃跑的命令，一切行动听从潘、杨指挥，准备起义。自卫队在潘文华的带领下，日夜在防区巡逻，密切注视守桥敌人的一举一动。当时，浈江沿江停泊了许多杉木排，潘文华有意识主动和货主搞熟，以代保护木排安全为由，将这些木排控制起来。他们作了最坏的考虑：万一桥被敌人炸断，这批木排还可作为架设浮桥应急使用。

10月6日下午5时，由远而近的枪炮声阵阵可闻，二野四兵团15军43师和北二支主力从始兴沿南韶公路直插韶关东河，驻韶敌军南逃西窜，风声鹤唳，守桥的敌军也人心惶惶，早想逃之夭夭。这刻，敌人随时都可能炸桥，情况严重。潘文华当机立断，设法将“炸”桥的任务弄到手，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大桥。

夜幕降临，潘文华带领部份自卫队员进入桥头找到负责守桥的国民党连长，连长说：“我们准备炸桥了，你们为什么不还不执行命令，撤退去乳源？”潘解释道：“我们暂时不能走，我们有看守火车站的任务，如果事先走了，要受军法处置的，若你们炸了桥，到时我们怎么过河？”最后，敌连长答应把炸桥的任务交由潘文华的自卫队执行，并且说出了夜晚过桥使用的三个口令。潘文华恐怕口令有假，八时左右故意通过桥头，口令果然生效。

深夜11点左右，负责监视守桥敌人动向的自卫队员报告守桥敌人明显减少，而且不是原来的人马。潘文华担心情况有变，马上带人到桥头找那个连长，可是，他已撤走了。于是，潘迅速赶到市区桥头，对守桥的几个士兵厉声说：“我是东厢自卫队大队长，我跟你们连长早已说好了，炸桥任务由我

们执行，在我们没有撤过市区以前，你们绝不能炸桥，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这几个士兵听了潘的话被吓得直发愣。

随后，潘文华、杨武带领自卫队同乡长一起到预定地点集中，潘郑重宣布起义，并派人回到曲江大桥桥头，监视市区桥头守敌的动静，采取拖延过桥时间的办法，阻止敌人炸桥。午夜12时左右，解放大军的枪炮声不时从东边传来，市区桥头的守敌见潘文华他们还没过桥，又不敢炸，为了应付交差，慌慌张张在桥面上洒上汽油，点着火便溜之大吉了。解放军15军134团的先头部队远远望到桥头熊熊火光，由二营四连二排长靳可明带领全排战士跑步前进，赶到桥上同地下党派去的市区护桥人员一齐扑灭大火，终于将这座大桥保护下来了。

忆北一支翁东大队活动片断

陈 心 镜

解放前，北一支翁东大队主要活动在翁源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地处敌人心腹地带，特别是翁源县龙仙片武工队活动在国民党县府周围，工作更为艰苦复杂。1947年9月，龙仙镇公所由官平率领全部武装人员起义后，十月龙仙镇中心学校全部老师，蓝李乡中心学校及乡公所武装人员相继进入游击区后，北一支决定组建翁东大队并委派刘初鹏为翁东大队长、黄社祯为大队副，许展棠为政委，1948年7月加派官平为第一政委兼任翁东区长，8月1日北一支队司令部成立后，10月份翁东大队的武装编入北一支一团，由罗志文率领部份武装编入火箭主力部队，解放前夕翁东大队编入三团领导。

翁东大队组建一开始就重视开展武工队活动，并由许展棠率领涂发、谢光、何竹等同志到翁南的昆山、周陂、三华一带活动；刘初鹏和黄社珍率领陈心镜、刘营新、张景彬、高其圣、吴友三、刘文思等负责在龙仙、蓝李、三华一带活动。武工队主要任务是做好宣传发动群众和收借枪弹、扩军、筹粮、收税等工作。由于当时革命形势正当高潮，不到二个月时间翁东大队正式建立起来后，大队部组建的连队已达160多人，加上武工队共200多人，并在蓝李乡李洞山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连队由何镜明负责，下分二个小队由陈冠元、

吴镜先、涂竹、陈锦梅等负责。另在园洞、李洞建立了二个脱产民兵机干排。

翁东大队的迅速壮大惊动了敌人，与此同时北一支队部遭受敌人袭击后转移到李洞，因而我翁东大队根据地更引起敌人注意，并在1948年1月8日晚突然向我发动疯狂的扫荡。此次战役中当时在我部队的杨康华（广州青工委书记）牺牲。由于这次遭突然袭击，损失较大，因此翁源当时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为了军事上的需要，我们的根据地由李洞转移四水山（即细水、园洞、深肚水、大水坑），最后扎根于大水坑河包角。这里都是连绵大山，有天然屏障，形成一条绿色的走廊，在军事上对我们开展游击战术非常有利，进可出击平原，退又利于守，有充分的回旋余地。为了巩固和扩大我部队革命根据地，当时翁东大队决定：

继续开展武工队活动

首先明确武工队的任务：（一）了解敌情；（二）宣传我党我军政策；（三）收缴地主武装；（四）组织农会民兵，发动群众参军和支援部队工作；（五）搞好税收借粮，保证部队供给；（六）做好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七）抓特务打反动；（八）骚扰敌人，袭击反动据点。

深入敌人心脏和平原，积极展开武工队活动。大队领导刘初鹏、许展棠分别带领武工队员深入敌人心腹地帯开展统战工作；黄社珍率领刘文思、李振光、郑德养、李恩华、梁满堂、黄兆源、黄邦、李凯等负责龙仙的良洞、三益乡（即现在的民主、会联、群陂、河口）三华等地的活动并负责冲下至瓦窑头沿河和公路征收车船税；另派陈心镜、刘营新、

张景彬、陈辉、吴友三、谭开同、何炳深等负责蓝李片（即现在的青云、青山、蓝青、石背、李洞）和龙仙片的田心、联群、大塘头、石寨以及民主等村，扩大宣传团结群众的活
动，重点抓好在当时蓝李片的建昌围和蓝青的大部份村庄打
开局面，搞好群众基础。另方面在山门隘设站征收过往牛税、
盐税由鄧可让和何洪勳等负责。连队则由何镜明、罗志文、
陈冠元等负责。

1949年6月由于形势需要，大队部决定李启聪负责蓝李
片武工队活动，陈心镜负责龙仙片武工队活动。

龙仙片武工队经常掩蔽在田心村，与国民党县府所在地
——龙仙镇仅一河之隔，是敌入心脏地带。我们武工队在敌
人的心脏地带活动，工作相当艰苦和惊险的。

深入宣传发动群众

我们武工队能扎根敌占区的心腹地带开展工作，主要是
依靠群众，与群众建立了血肉关系。我们每到一个村庄即重
视做好宣传我党我军的革命政策，使群众充分认识到我党我
军是为穷苦劳动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知道为什么要革国
民党的命，从而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大家团结一致
同心协力，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推翻三座大
山才能翻身，我们伟大祖国才能富强起来。在此基础上在每
个村庄建立了联系户，（可以接收我们的）和堡垒户（可以
经常接收并能积极帮助我们工作，政治信得过的）。我们在
蓝李片建立起3个联系户，24个堡垒户；龙仙片建立56个联系
户，31个堡垒户。同时在蓝李片青山与张邦传、张杰夫、张厚
邦，石背何新让，龙仙片田心村吴友机，民主乡官德银设立了

粮食物资供应点。

组织农民协会和民兵

1949年4至5月间，我们在各村庄成立了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蓝李片成立9个农会，会员有123人，基干民兵95人，普通民兵123人。龙仙片也有9个农会，186个会员，基干民兵186人，普通民兵300人。当时加入农会和民兵组织都是秘密进行，且需举行宣誓仪式参加的。当时我们有了这样可靠的群众基础，物质条件也有了一定的保证，这就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这里活动了二年多，从没有发生过意外事件。特别是龙仙片武工队经常活动在龙仙附近的田心村，并住在该村吴干聪、吴友机、吴镜梯、吴金云和吴友三哥哥的家里，都从未发生过意外事故，原因就在于整个田心村老人小孩都给我们放哨，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我们经常活动在国民党县府城隍脚下也能“安枕无忧。”

在平原地区参加了农会民兵组织的广大农民，都很积极的掩护我们武工队工作，为接待游击队，送情报，发动青年参军，借粮、捐粮、运粮到山区根据地以及购买物资等工作都起到很大作用。

1948年3月间，我们武工队还配合连队到新丰黄砬区的秋洞开展工作。在那里展开宣传，公开组织农会、民兵并发动群众破仓分粮。成立农会那天还破了袁调盛反动财主的粮仓，将100多担谷子分给农会会员和贫苦农民，群众情绪非常高涨。接着到西造组织农会民兵破仓分粮，甚至远途开至连平沙心配合连队打击了反动分子谢镜秋。

积极做好统战工作

统战工作是我们党各个历史时期不可少的一件法宝，特别是在游击战争时期，我们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这一工作更具有重要意义。当时经上级研究确定的统战对象是一些上层社会人士：陈发元、余植三和当时国民党的乡镇长李对阳、张多才、张兰初、陈士衍，甚至驻在龙仙的国民党地方武装部队，我们也通过各种渠道与他们取得联系，加强统战活动，如联防中队长胡鸣、龙仙镇自卫队小队长陈忠等以及保甲长大部分都与我有比较密切联系，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

对一些顽固反动地主和特务分子，经过教育仍坚持其反动立场，积极反对、阻挠我们武工队活动的，则坚决给予打击。1948年秋冬之间正是我军反扫荡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为了给顽固派以有力打击，当时我们决定公开镇压了蓝李乡反动头子李明达。这一行动更大的震惊了敌人，更快更广泛调动了群众支持我游击队的活动。

解放初北江专署所属县分

广东全部大陆解放后（海南部分地区未解放），省府根据具体情况，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全省分为八个专署、一个行政公署（琼崖）、二个直属市（汕头市、湛江市），并规定了各专区所属的县分。

八个专署是：珠江、兴梅、潮汕、东江、西江、南海、中区、北江。

北江专署所属县：曲江、始兴、南雄、仁化、从化、增城、佛冈、翁源、英德、清远、乳源、乐昌、阳山、连县、连南、连山、新丰共17个县。（南）

翁源解放和翁北支前见闻

钟石声

1949年9月上中旬至10月间，南雄、始兴、翁源和整个粤北及广东全境均先后相继解放。至今已相隔40年了，作为当时直接参加解放战争的一员（按：当时我在北江第一支队，以下简称北一支队）。我想将1949年9月前后，我自己参加翁源解放战斗以及组织支援前线的一些见闻，回忆如下：

1949年6至9月初，北一支队即开始着手进行迎接解放军和组织支援前线的准备部署，并积极发展壮大地方武装力量，不断打击和瓦解地方反动势力。

1949年6月，北一支队四团奉命上调粤赣湘边纵队（以下简称边纵），整编为边纵的主力部队，以待南下大军入粤后，配合作战。随后，中共翁江地委决定，从所属各县地方团队抽调部份连队，组成北一支队第五团作为支队的主体，接替原四团的任务。

1949年6月，边纵司令部决定，将活动于清（远）、从（化）、佛（冈）边界的原属东江纵队第三支队（以下简称东三支）领导的黄信明部队划归翁江地委领导，编为北一支第六团。

1949年9月初，为了更好地做好支前工作和解放后的接管工作，经边纵政治部批准，翁江地区各县设立了人民政府，

并委任了各县的县长、副县长。

接着，各县又设立了支前机构“迎军支前动员委员会。”九月下旬末，改为“支前司令部”。

以上部署，为配合大军作战、迎接解放粤北，创造了条件。

1949年7至8月间，北一支队三团一营在营长刘洽源率领下，配合北一支五团，围攻驻守翁源坝仔的县保安营和翁北联防大队。三团一营布置在坝仔外围西面山上围攻。五团团叶竞率五团部份，在坝仔东面山上围攻。五团副团长陈涛、政治处主任黄艺华，各带五团一个连，在坝仔南面约十公里的荒洞岗，隐蔽于公路的东、西两侧伏击，从龙仙开来欲解围坝仔的敌军，入网被歼，共消灭敌军二十余人，缴获步枪近二十余支。

这次围攻坝仔的目的，主要是引出龙仙之敌，准备在半路伏击歼灭。达到目的后，五团向北撤到翁源鲁溪休整总结；三团一营向西转移到铁石径、黄洞、太坪一带活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率领大军到达江西赣州。与此同时，党中央也通知华南分局书记方方，赶赴赣州，同叶老总商议有关解放广东、解放华南等问题。

9月中旬到下旬，在叶剑英同志主持下，召开了新的分局扩大会议（又称赣州会议），制定了进军广东的作战方案，作出了解放整个华南地区的一系列部署。

根据解放后有关资料记载：参加赣州会议人员有：分局第三书记方方、二野四兵团陈赓、郭天明、刘志坚、四野十五兵团邓华、洪学智、赖传珠、肖向荣、两广纵队曾生、雷经天、南方的游击纵队李嘉人、黄松坚等。

在此之前，陈赓兵团、邓华兵团的先头部队，也已经到达赣南地区，分别与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的部队会师。

1949年9月上旬，北一支派在江西全南一带活动的梁增托武工队，与四野四十八军一四三师四二九团，首先取得联系。

随即，北一支队司令员何俊才，率领五团团叶竞及该团部队，到达全南县大吉山，与四二九团会师。根据南下大军意图和要求，地方部队主要做好支前工作和设法堵截敌人南逃。

1949年9月14日（农历闰七月二十二），南下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四二九团，在吴副师长率领下，采取“远道奔袭”的战术，由江西大吉山急行军，当天下午，到达翁源岩庄乡。到后立即把守道路，行人准入不准出，严密封锁消息。

四二九团到达岩庄乡后，当天吃完晚饭，部队便分三路进军：其中二路以“钳形”战术，分道直插龙仙，行动神速，赶程一百多华里，在拂晓前，便将翁源县城龙仙合拢包围；另一路，经翁虔公路，行程二十余公里，当晚就解放了翁北的坝仔。

与此同时，北一支何俊才司令员率领五团，即由翁西回师翁北，配合大军作战。

我北一支三团一营，在此同时接到北一支司令部紧急命令，于四二九团到达岩庄的那天下午，在翁西太坪，提前吃了晚饭，即刻轻装出发，经黄洞、铁石径、鹤子岗、良洞等地，赶程一百多华里，于当晚的二更时刻，队伍就到达翁源展旗乡梅村，并即在梅村附近公路两旁布防就绪，担负坝仔南面的警戒任务，准备堵截从坝仔南逃之敌。

1949年9月15日凌晨，解放翁源坝仔。坝仔是翁源北部重镇，也是翁北反动巢穴，共有反动武装300多人，平时对老百姓如狼似虎，但在我南下大军到达和发动猛烈进攻下，前

后仅一个多小时，反动武装就即缴械投降，坝仔随即宣告解放。

坝仔战斗结束后，在清场时发现：敌县保安二营营长王炳中、翁北联防主任肖大明，逃跑走了，我翁北武工队当即派出武装，进行追捕。（按：肖大明潜逃不久，已被我游击队抓回，后已处决，而王炳中则化装潜逃至广州后再逃往香港。）

驻翁北坝仔的联防大队副肖绍何、中队长马济川、保安二营大部及联防大队和两乡自卫队官兵约共300人，全部缴械被俘。

与此同时，北一支三团第四大队大队长许先觉率部进驻坝仔，进行接管工作。许先觉部的丘寿科、吴首明、刘振汉等被任命为正副乡长接管茶园乡；冯珍业、刘美源被任命为正副乡长接管展旗乡。

1949年9月15日晨，于坝仔解放后，四野四二九团和北一支五团，迅速继续南下参加解放翁源县城龙仙的战斗。

在大军南下的马拉山炮，驶到坝仔附近的岭下公路木桥时，桥身摇摇欲坠，马车无法驶过。于此，我翁北武工队，即刻派员分赴茶园、展旗两乡附近的农村，动员组织了100多名民工，并发动农民支援木料。当即，许多农民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原木、门板、床板都捐献出来。就这样，经过不到半天紧张的抢修，加固了木桥，于当天中午，马拉山炮，即已顺利通过，并即投入解放龙仙的战斗。

龙仙镇，是翁源县城，由国民党少将、粤北剿匪副司令兼翁源县长官家骥亲自督阵固守。官家骥是至死不变的反动分子，他依仗龙仙有保安部队的碉堡及其县府的炮楼，在我大军压境时，亲身指挥督战，仍负隅顽抗，拒不投降。致使龙仙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至9月15日下午，我大军山

炮赶运到龙仙时，用炮炸毁敌人的碉堡、炮楼，官家骥始惊慌失措，匆忙派出代表（龙仙商会会长马云章）与我方谈判，接受无条件投降。

是日（15日）黄昏，结束战斗，官家骥以下，包括敌保安第二营200余人全部缴械投降，翁源县城龙仙宣告解放。

龙仙战斗结束后，北一支五团继续南进，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翁南、翁西、英东、佛冈等地。而北一支队三团一部份连队则进驻龙仙，整编为“翁源县大队”，刘治源同志担任大队长。

1949年10月上旬（具体日期已忘记），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在华南分局负责同志方方陪同下，一行约20人（包括叶剑英、方方等同志身边工作人员、保卫人员和司机等），共乘六至七部小汽车，从赣南至广州途中，路经翁源坝仔时，在坝仔镇逗留一个晚上，住宿在翁北中学校内（即原坝仔社学）。第二天，叶老总一行离坝仔，驱车继续南进，至翁源龙仙南龙站时，约见了当时中共翁源县委书记、县长涂锡朋，随即又驱车向广州进发。

坝仔设有“翁源县翁北区支前指挥部”，由翁源县委委员、翁北区委书记许先觉担任指挥员（九月末县改为支前司令部后，区就不再设支前分会）。

坝仔支前指挥部管辖的范围，有茶园、岩庄、展旗、江尾、仙潭五个乡。沿翁虔公路边的坝仔、鲁溪、江尾三个点分设接待和供应点，指挥部设于坝仔。

在坝仔，据我记忆，供应站设在白马庙内，接待站设在区指挥部所在地黄家祠内。

接待站任务，主要是接待路过坝仔的南下解放军的询问、短途向导和协助解决住宿营地等。

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除领导同志、保卫员和一、二位留守人员外，其余大致分为筹集粮食和修复公路桥梁两部份人员。

另外，由翁北中学和附近乡小学，负责宣传工作。在坝仔墟内外和公路沿途，张贴以“迎军”为中心内容的标语、横额等。间或组织学生到附近驻军营地，以唱歌、跳舞的形式，慰问解放军。

还有，沿翁虔公路路旁，每隔三、四华里设立茶水站。

供应站任务繁重复杂，人员也多。其任务，概括为“收、购、管、发”四个字：

收，是验收各乡、村按所分配的任务，分期交来的大米、马料、木柴、生猪等物品，分类集中，并将交来物品登记在册。如果属于粮食、马料、木柴的，则填发收据。待后换票单，可兑抵公粮。生猪（牛可顶猪任务），则按规定的收购价，照所交数发钱。

购，是把没有分配任务的油盐、青菜、鸡蛋、火柴等，大量采购回来集中，以待统一发售，供应部队所需。

管，是专人保管各类物品，设立进出流水帐，并注意防霉、防盗、防火。尤其是木柴、马料（有禾草、薯苗、大豆、谷糠等），都是堆放在街外的临时草棚内，或马路边，不但有专人保管，还派有民兵日夜看守。

发，是按部队各番号的人数、马数，按规定各类物品的定量发给。大米（当时供应糙米），每人每天发二十六两（旧市两），照供应数收回票单。马料、木柴，则按比例折为粮数，收回票单。

至于猪肉、牛肉、青菜、鸡蛋、油盐等，则摆档公开发

次恢复了对部分留穗困难学生的学田谷补助。尽管杯水车薪，数量不多，但也使全体始兴留穗大中学生深受鼓舞。这是始兴留穗同学会通过斗争所取得的一个小小的胜利。

1948年春，我们始兴留穗大中学生三十多人为了进一步密切联系、增进友谊和欢庆初步取得的胜利，在广州康乐村原私立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校址）内举行联欢会。当时，尚在岭南大学读书的张发奎将军女儿张桂芳小姐，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次联欢活动。

1948年夏，我和陈尚勋因毕业离开广州中山大学，李子德等同学亦因转往游击区离开广州。同学会经过改选后，由林汉周、饶振淮等负责，一直坚持到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胜利完成了同学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韶关市政协副主席、民主促进会韶关市委主委）

坪石小忆

(香港)叶惠恒

青年时代一去不返，脑海浮现的片断，已变得迷蒙。坪石就读时刚是一年级，乏善足陈。

虽年级最低，但老师最好，可谓钢铁阵容。郑天熙博士授动物课，他个子矮胖，面挂笑容，讲授明晰，而每于下课前五分钟的速试，令许多同学手足无措。容启东博士授植物课，他身材高瘦，绅士风度十足，讲解不厌其详，并绘图注释，其黑板上绘图之快而准，无人能及，是经验之成果。孔宪保博士从来空枪上阵，手无教本或笔记，他的化学方程式全部熟记，毫无错漏，是今之电脑。他烟斗不离口，授课时英语中常间以嗒嗒之声，是其特色。其他课目则印象模糊。中文科原无教授，越俎代庖，以院长之中文秘书钟文森先生权充。钟先生乡言未改，不擅辞令，上课者寥寥无几，然钟老批改文卷至为详尽，蝇头小楷，一丝不苟，亦足敬重。

坪石校踞山岗，渡河往水牛湾或步行往坪石墟均感不便，课余生活颇为枯燥，娱乐较缺，同学颇有以音乐自娱者。较为方便是小提琴，亦有吹奏管乐器的。人数虽不多，竟能组成小型乐队，并曾于坪石墟上演。因陋就简，小风琴亦出阵，还有邝耀鼎同学所拉之大提琴，竟是木箱一个，容启东博士精音乐，为当日之指挥，他老人家兴趣盎然，十分卖力，不管演出水准如何，而他已乐在其中。学小提琴只一处，即中大师范学院，离岭南农学院甚远，须步行二小时，

北江军分区十一团三营剿匪实况

李启民 钟 波 梁奕庚

韶关地区所属县在1949年10月基本解放了，但蒋军退出韶关时，却留下部份反动武装退到山区继续坚持反革命活动。在仁、乐、曲交界的山区，有“反共救国军”何康民（解放前夕是湖南汝城县县长）林显（仁化县县长）部；在英德有梁孟熊及卢家豪的股匪；在乐昌、乳源的有黎××股匪；在浈江畔有李志超、饶长梓股匪。他们坚持反革命活动，攻打我基层乡、区政府，杀我基层干部，抢船劫车，扰乱社会治安。1949年12月，趁我部往山区进剿，武装力量较薄弱时，还组织匪徒攻打乐昌城。因而，清剿残匪，保护百姓安宁，使野战部队在前线无后顾之忧，是我们地方部队的重要任务。

古坑的一次重要战斗

十一团三营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二支队新一团。新一团建立在1949年9月23日。这支队伍对粤北的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成立的第二天，便接到北二支司令部的命令，要立即组织力量阻击由南雄、始兴溃退下来的蒋军。于是，团领导研究部署战斗计划，于9月24日，即将部队调到始兴八约黄坑、花山集中，9月25日凌晨，即

将战斗部队布置在始韶公路崖婆石——古坑口。该地有利于我们伏击。公路南侧的山岗，松林茂密；公路北侧是浚江河畔。我们的战斗队伍掩蔽在南面的松树山。不出所料，上午10时左右，敌三辆军车开路，后跟着一个搜索连，沿我防线前面的公路通过。为了歼敌主力，我团指挥员放过了他们，大约10时半左右，敌部队浩浩荡荡，耀武扬威，神气十足地来了。我团营指导员待敌人进入我军火力点时，才下令攻击，重机枪、轻机枪火力一起射向敌人。我们居高临下，公路边是一片稻田，敌无力反击，被我军杀伤很多，后有部份敌人退到河堤边，凭借河堤为掩体，组织冲锋，企图夺我阵地，可是几次冲锋都败下阵去。敌指挥官又组织更大的力量，并高叫“是土共，不用怕，冲啊！”可是，还是被我击溃。我二营长何衍周，很是沉着，为消灭依靠河堤掩护的敌人，命令排长张发通将俘来的敌炮排长曹××带上阵地，架上八二迫击炮，轰击河堤之敌。曹准确地击中目标，敌惊恐万状，摸不清我是游击队还是正规军。何营长迅即组织冲锋，我军战士高喊“缴枪不杀！”冲向敌阵，蒋军乖乖地举手投降。经二个多小时的战斗，共歼敌300余人，缴获步兵炮2门、火箭炮2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步枪200余支。被歼的是蒋军四四零团。古坑歼击的胜利，扫清了南、始的守敌，击破了蒋军的粤北防线，为韶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向五山进剿

为适应形势之需要，广东省于1949年10、11月间成立广东军区，韶关也成立北江军分区，将原解放前的武装队伍北一支、北二支和连江支队整编为第十团、十一团、十二团

(后改为第九团)。

整编后，新一团缩编成十一团的第三营。营长是何衍周，副营长柳景华，教导员李启民。下有三个连一个炮排，指战员共有450余人，武器比较精良。

11月下旬，三营在乐昌进行了政治整训，随即接到任务：进剿盘踞在五山的反共救国军何康民、林显部。时适逢寒流南下，大雪纷飞，北风凛冽。因北江军分区成立不久，后勤工作跟不上，我们的指战员仍未领得冬衣，只得每到一处，便生火取暖，以抵御寒冷。但部队斗志昂扬，上上下下都决心要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

化装寻敌 俘虏“台长”

对待俘虏，我们一向是按照政策处理，放下武器后，即优待他们，除了在生活上的照顾外，对他们不打不骂，耐心给他们讲形势、讲前途，消除其敌对情绪。因而我们从俘虏中了解了许多敌情。我九连副连长陈月，当知道敌人的联络讯号后，即亲自出马，带一名助手，化装为被打散的匪兵，趁黑夜到××村去找国民党保长。保长不在家，由他的妻子出来接待，陈连长问：“何老板(是联络暗号，指伪保长)到哪里去了？”她答“到汝城去了”。又问：“还有什么人在这儿？”答“岭背有6个自卫队员”。陈连长和她说了一会话，即率助手前往岭背。在那里会见了敌匪徒，除自卫队员外，尚有匪电台台长和林显的侄儿。陈连长和他们扯得很投机，敌不怀疑，林显侄说：“你们就好，我们被共军追得很苦。”陈又问电台长：“电台在哪里？”他说“被共军抢走了”。那时天快亮了，我们的主力包围了村庄，被一个送饭的匪兵发现，惊

慌地上山来报告，敌人得悉后拟逃窜，但已来不及了。陈连长两个人即拔枪迫他们投降，他们还摸不着头脑时，便做了陈连长的俘虏。这次共俘敌8名（其中电台台长一名）缴获步枪6支、短枪1支。

张班长只身缴机枪

1950年1月，我军包围了雉鸡山。该地附近所有能住的地方，不管是瑶寨还是纸厂，我们都派人住进去，因此匪徒只能在深山荒野中露宿。那时罕见的寒流南袭，大雪纷飞，水桶粗的松树，被雪压得东歪西倒。这恶劣的天气，虽给我们一个考验，但同样给匪徒们增加了困难。

有一天，营通讯班长张全外出，执行联络任务，在烟竹山的一条窄路上，突然与一名肩负轻机枪的匪徒相遇，张班长连忙端起冲锋枪往旁边一闪，镇定地向匪徒大喝一声：“不许动！”匪惊呆了，即将机枪放下，乖乖地举起双手，连喊“饶命！”张班长情急智生，又下了一道命令：“向后转”、“开步走”。待匪徒走了十多丈远，张才向前将机枪弹夹卸掉，再令匪徒回来将机枪背上往前走。一路上，张班长向匪徒宣传我军对敌的优待政策，解除了他怕的思想，老老实实地背着机枪到了我军驻地。接着，还出现很多生动的事例，这里不作详细的记述。

我营在五山剿匪半个月，共俘敌36人，其中电台长1人，排长1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2支，手枪2支，子弹600余发，电台一部。

在我团与野战军××团的共同进剿下，“反共救国军”何康民、林显部，基本上被歼灭，林显只身逃往香港，何康民

也带残部窜回湖南躲藏。

驻周田追歼残匪

旧历49年12月27日，我们进驻曲江周田。据当地商民反映，周田街渡（船）在离周田七、八里的××被抢劫，全部衣物被抢空。我们即计划搜剿。

抓获匪首钟雄

1950年2月17日即旧历春节年初一，九连长梁奕庚，接到营的命令，要捉拿抢劫街渡的匪首钟雄（原国民党挺进队成员），当晚即组织力量去围捕，结果扑空，只抓到2名可疑分子，经审问才知是跟钟雄的匪徒，经教育，他们提供了钟雄的去向。第二天梁连长率便衣3人直往较坑钟雄的姘妇家，又扑空，只有其姘妇的家婆在家。询问钟的下落，开始老太婆因怕钟凶残不敢洩露，经梁连长说清道理，老太婆才将钟躲藏的地方实告。梁即率三名战士到一个石洞里去搜查，结果又未发现钟，正拟往别处搜索时，发现山顶有一人，估计是钟雄，梁即直呼钟名。钟正在下山途中，几个割茅草的妇人告诉他：“叫你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他们有枪”，钟即往回跑，梁连长即率战士分路包抄。为制止其逃窜，梁连长从战士谭光源手接来冲锋枪往钟方向射击，钟拟往后退，又被我战士陈明拦截折回，拟渡河逃跑，结果被我战士谭光源追上俘擒。

围歼矮寨匪徒

年初三，由八连派出两个排，配合九连围攻犁市矮寨。由九连长梁奕庚统一指挥。当时布置八连由上游渡河，九连由指导员指挥，由下游渡河，九连依时到达，天亮前已围矮寨（八连由上游渡河时，渡船沉没，未能依时到达），搜索村内，未发现敌人，后发现离村不远的山岭有无数火堆，便组织两个组上山袭击，主力在山下伏击。战士张狗仔先摸近，发现有个匪徒在那里巡逻，张即开枪向敌人射击，连射中3个敌人，这时我部机枪也向火堆射击，敌人一面还击一面撤退，由于八连未赶到，后路未截住，结果只歼敌4名，缴手枪3支。

年初四，九连梁连长率4个便衣到长坝将匪徒余向华（解放前的乡长）抓获。

跟踪捕捉四匪

年初八，排长何世标率4人化装土匪去匪家，匪徒不在家，只有其妻子，何对匪妻说：“我们约定他年初二来饮酒的，他没来，不守信用。”何又问“他们（指匪徒）去了哪里？”匪妻以为何等是丈夫的同伙无疑，便如实地告何。原来4个匪徒已去韶关民生路××商店。何即乘车来韶市，到了××店附近，发现有4个人进店，估计系我们捉拿的对象，即布置战士，拔枪将匪徒全俘。

我营掌握劫匪得逞后，分散活动的特点，便命令各连派出精干人员前往追捕，只10天的时间便将以钟雄为首参加抢

劫街渡的匪徒34人全部擒拿，赃物全部收回。

1950年3月1日，在周田墟将为为首的劫匪钟雄、黄垭处决。周田区政府及商民敲锣打鼓送锦旗送猪肉及其他慰问品向我军庆贺。

入虎穴促敌投降

我营驻周田圩，破抢劫街渡案后，周田、新庄水残匪李志超（国民党乡长）、饶长梓（剿共联防大队长）及李志超的副手李侠民很是惊慌。我们为瓦解和敦促匪徒投降，邀请了10多名匪属开会，向他们宣传形势，阐明只要放下武器向人民政府投降，即可得到从宽处理。这批匪属中有一个是（反共救国军副总队长）李侠民的叔父，开完会后营教导员又找他进行教育，他感动得很，答应回去给侠民谈谈。第二天上午，侠民的叔父便跑到周田来找我营李教导员说，他已见到李侠民，将开会情况给他谈了，侠民提出要教导员亲自去会谈。营领导经分析研究后决定，深入虎穴去促敌投诚。第三天，李教导员率一个武装班，由李侠民叔父带路前往匪巢。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离谈判五华里的地方将武装班留下来，李教导员只带文化干事刘丹同志同行。

会谈结果很好，李侠民表示愿意投诚自新，当即缴交了比利时七九步枪一支，三号包鱼驳壳一支，7天后他率一部匪兵到周田区人民政府投诚自新。

李侠民自新后不久，李志超（反共救国军总队长、原周田黄坑乡长）也来信要求我营派人去会谈，我营因有新任务，无法派人去，便由地方政府去处理。据说李要求保留反动武装，政府不答应，便继续顽抗，最后自取灭亡。

英德剿匪情况

1950年3月，我营去英德浣洗。这里匪情很严重，有政治土匪也有惯匪，我们的任务是进剿浣洗三山一带的梁孟熊股匪，他们都是地头蛇，有一定的基础。我们于3月×日晚11时到达浣洗，12时左右匪徒便来摸我们的哨兵，击伤哨兵谭光源（医治无效死亡）。我团一营（刘裕安营）在攻击金竹园时也牺牲了7个同志。该区群众因受匪徒宣传，我们所到之处群众都逃避到山上，不敢与我们接触，因而团的领导特别强调要很好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枪枝弹药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包括鸦片烟（该地区群众以种鸦片为主要收入），我营坚决执行了团的指示。

4月的一天，我营围剿三山（地名）时，俘匪10余名，缴获步枪7支。由于我们的哨兵被匪杀死，全营指战员都很愤恨，要求将匪就地处决，雪恨报仇，团首长知情后，即向战士及干部进行教育，把所俘之敌经教育后即予释放。后来便有少数老人先回来探望，看到家里的东西（特别是鸦片及粮食）分毫未少，渐渐对我军有了了解，敢于接近我们，走避的群众陆续回来，反共宣传不攻自破，梁匪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我军的继续追剿下，终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只身潜逃香港。

解放前夕南岭煤矿的护矿斗争

刘 玉 泉

南岭煤矿位于广东北部、湖南南部的南岭之南，处于广东的乐昌县、乳源县、湖南宜章县的交界处。是江南地区开办较早的煤矿之一，也是广东省唯一的烟煤矿。

1949年上半年，我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地迅速南下，5月下旬，武昌、南昌先后解放，国民党大为震惊，南岭煤矿一片混乱。反动派不甘心南岭煤矿完整地归还人民，企图对煤矿进行大破坏，有的高级职员则准备携带金银贵重物品潜逃，当地土匪也想趁火打劫。情况复杂而又危急，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人民财产，为了解放后的建设顺利进行，提出南岭煤矿一定要保护好，并挽留住在矿的工程技术人员，于是展开了一场护矿的斗争。

当时，发动护矿斗争的有四条线：第一条线是中国劳动协会所属的汽车工会负责人、地下工作者陈清凌，他于1949年6月19日秘密携带解放军的“约法三章”、“第六次劳大决议”、“工商业政策”，及华北、华东城市工人护厂斗争经验等文件，到狗牙洞矿厂找到同乡、劳协会员、矿车队司机周杰，并经周杰介绍认识了思想进步的汽车司机夏仪、机厂工人彭志松等，以工会性质组织起劳工互助会，借以团结、发动工人。由陈清凌、周杰、夏仪共同草拟章程，提出“组

织起来，团结互助，渡过难关”、“保护矿山，保护饭碗”等口号，在车队、机厂和井下的进步工人中广为串联，传阅地下刊物或文件。由于形势的影响及工人因受尽压迫剥削，迫切要求翻身，很快接受了这些进步的宣传，很多人报名参加劳工互助会。半个月后，陈清凌奉命离矿到别处工作，周杰也因家事离去，护矿工作由夏仪、彭志松继承。夏仪按照陈清凌的布置，并与湘南游击队中队长姚吉峰取得联系，积极在矿内半明半暗地发展工人会员。到7月份，大部分工人入了会，后为矿方发现，下令禁止劳工互助会活动。此时的劳工互助会已人多势大，不理矿方那一套。由于时势急剧变化，反动派亦不敢硬来；加之总经理田策卫及一些人也接受了护矿任务，当然不来干涉。劳工互助会的活动不但没禁止，反而顺势公开化了。

8月中，夏仪召开了有70人左右的劳工互助会成立大会。选出夏仪为理事长，彭志松、熊书楷、李紫枕为常务理事，肖亚松、吕贤文、张之凯、潘桂钦、刘枚轩、马文臣、张步文等15人为理事，刘少初、尹爱仁、何泽林、马树城、王学民等5人为监事，李丙坤、陶佑君、王平生、韩友连、陈友彬、张学勇、王同鸣、刘家裕、邱元勋等10人为候补监事。下设总务、会计、文书、交际四个小组。会员发展到800多人，其中工人占80%，职员、把头占20%左右。

劳工互助会为了作好宣传工作，办了两期《劳动月刊》，第一期于10月1日出版，由夏仪设计封面，写了创刊词。封面右角有“劳力劳心，互惠平等，工人工作，助长繁荣”的联语。月刊内容有“论坛”、“为什么要组织劳工互助会”、“闲话”、“暴雨”、“夜半柝声”等。月刊的文章，文意激昂。如：

“动乱的时代，遍地烽火，已经烧到我们的身畔，绝不容再像过去存在着苟安自善的心理，假如是这样，这是自趋灭亡的捷径。”

“我们的工作在南岭煤矿，我们就应为南岭煤矿而努力，才能使自己得到支持，得到保障。”

“日日辛勤，不得一饱，其理何在焉？高楼大厦，未见鹑衣百结之士，其理何在焉？”

“白粉墙上，遍涂污泥，纯洁心灵，遍插金针，世上若此，谁不痛心。”

“怒气若闪电，闪电若长虹，我愿长虹变成长绳，捆尽世上的不平。”

这些宣传鼓动，提高了工人们的觉悟，激发了工人们的斗志。

劳工互助会还配合“工警护矿互助委员议”共同护矿，保证了南岭公司的设备、财产，完整地移交给人民解放军。劳工互助会于1949年12月21日，矿召开的第一次职工代表会宣告结束，后改建为工会。

第二条线是中共地下党工作者潘汉言领导的上海、香港区的情报组织。1948年起，就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内部开展工作，争取了资委会委员长孙越琦等人。1949年2月，孙越琦在南京接见了田策卫，7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中南地区70多个厂矿参加的会议，布置护厂护矿，保护财产，保护挽留工程技术人员工作。

田策卫先在高级职员中秘密筹划，因去广州筹款，便由公司协理兼总工程师谭仁，于8月29日在狗牙洞矿厂招待所召集各室、课负责人和劳工互助会干事等60余人的会议，传达了资委会长沙会议精神，宣传我党政策，提出组织护矿委

员会，与会人员都表示支持拥护。会议决定，成立南岭煤矿公司工警护矿互助委员会。从职员、工人、矿警中选出委员共55人，田策卫为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生产、供应、总务、互助、交际、运输、财务等8个小组。由谭仁、焦纯平等拟订了护矿章程，规定了护矿的任务、纪律、紧张时期的行动、财政收支、员工生活费用暂支办法等。

9月15日，护矿委员会由田策卫和谭仁主持，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与劳工互助会合作，抓紧深入开展护矿工作。对各组也进行了具体分工：财务组除留部分现洋作日常开支外，矿存银元用炸药箱装封，藏入旧木箱仓库；总务组负责安排员工生活，并与互助组将地面重要设备迁至井下隐藏；运输组控制原煤外运，将生产出的煤储存保管好；生产组负责组织生产部门坚守岗位，维护生产设施；警卫组维持治安，站岗巡哨，严防破坏和抢劫；交际组负责与中共游击队及有关方面的联络，及时掌握有关情况。劳工互助会方面主要发动，组织工人共同护矿。谭仁、焦纯平、夏子俊等负责做好工程技术人员安心留矿工作。田策卫全面指挥。

第三条线是湘南粤北地下党组织——五岭地委。1949年夏，五岭地委派湘粤边区工委委员李子明来发动护矿工作，李子明通过同乡业务室主任李赋，和他1948年在八字岭矿厂以监工为掩护时发展的团员李汕林、青年盟员刘增奇，在矿内组织护矿活动。李子明住在乐昌的梅花或湖南的宜章，常到八字岭与李汕林联络并指导开展工作。

第四条线是湘粤边区的地下党组织书记。湘粤桂游击纵队连江支队政委兼司令员周明。1949年夏，周明写信给田策卫，向他宣传我党政策和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动员他申明大义，保护好矿山财产，并要求资助游击队经费与药品。

田策卫接受了要求，进行秘密联系，在矿内拿出一千银元和一批药品，分三次由李汕林转送，并切实去做护矿工作。

（本文作者，现为矿志办副主任）

韶关市区中等学校解放前后概况

饶 纪 寰

韶关市地处粤北山区，解放前，教育事业比较落后。原市区中小学很少。1949年解放前夕，市区中等学校只有6所。其一为广东省立志锐中学（校址在互励路，现薰风路中共市委所在地），当时校长为黄宗潮，有高中、初中各6个班，共12个班，约480多人）。其二为广东省立韶州师范学校（校址在睦相街，现峰前街，当时校长为黄金佑，共约6个班、240多人）。其三为曲江县立第一中学（校址在现火车站安全路附近，旁边有座塔，解放后已倒塌，当时校长为欧美，学生也有高初中6个班约280多人）。其四为私立励群中学（属天主教办的初级中学，校址在孝悌路，现西堤横街市第一中学，当时校长为吴新铨，有初中学生5个班约230人）。其五为私立广育中学（系广属同乡会办的初级中学，校址在广富新街现市第四中学，当时校长为易际良，学生有4个班约190多人）。其六为私立普光中学（属原普光孤儿院附设的初级中学，地址在原东河普光孤儿院内，当时校长为潘允和，学生3个级共80人左右）。

以上6校，在校学生人数约36个班、1470人左右。教职工共约90人。学生来源绝大多数是附近几个县的官僚、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商人的子女，工农的子女是很少的。1949年

10月韶关市解放前夕，各校师生因害怕战乱，多数疏散离韶，少数留校师生则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心帮助下，组织起来保护学校，老弱师生则转移到较安全的地方，以防国民党的劫掠。如志锐中学部分师生，当时就暂住进市中心的广育中学。10月6日深夜，中秋的月亮正圆，随着东河北部一声巨响，国民党残余驻军炸毁铁路大桥惶惶败逃后，解放大军胜利进入市区，有些马不停蹄地南下追歼残敌，有些则暂在当时的中山公园（现市政府及右侧单位、宿舍）或街道骑楼下就地休息，军纪严明。韶关广大市民，在7日晨天刚亮就满怀喜悦开门上街，欢迎人民的子弟兵。商店很快就恢复正常营业，粤北人民武装的指战员亦大量出现在街头。他们虽然衣衫破旧，但却精神饱满地为配合党政部门做好支前工作而奔忙。不几天，疏散离韶的师生陆续回到学校，就在这支前任务十分繁忙的时候，党和人民政府关怀教育事业。10月17日就召开学校复课会议，由当时党和政府负责人黄可夫亲自主持研究复课事宜。我作为志锐中学教师代表，出席了这次10人左右的会议。不久，在北江地委伍晋南书记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对学校复课问题又作了指示，紧接着党委就给志锐、韶师、曲一中3所公立学校派来了军事代表进驻学校，帮助留校进步教师成立校务委员会接管学校（因原来校长都已逃离学校，不再回来），并迅速筹备复课，使学校很快就恢复正常教学工作。在此基础上，还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各种支前工作，包括宣传党的革命知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动员、组织部分师生下乡参加秋粮征收工作，支持南下大军。当时派驻志锐中学的军事代表为李凡，韶师军事代表为卢云鹤（五十年代病逝），曲一中军事代表为陈立中。私立学校则继续由原来校长负责筹备复课，没有派驻军事代表。是

年寒假（1950年元月）北江专员公署文教处举办市区中小学教师寒假研究班，时间20天。针对当时广大教师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等等不很明确和比较普遍地存在中间道路的幻想，重点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等，进行热爱党、热爱革命和热爱人民共和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班，由当时专员公署文教处副处长杨军兼任班主任，市文教科长郑彦文兼任副班主任。经过20天的集中学习，中小学教师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并在此基础上自觉进行了思想总结，有些教师还主动向组织交待了自己的历史问题。研究班也首批在中小学教师中发展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团员，还给全体学员发了结业证书，大家都非常珍爱这一张在新中国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发给的肯定自己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的证书。

教师寒假研究班结束后，考虑到3所公立中等学校因解放后不少学生适应革命需要，纷纷参军或参加各种革命工作，有些还转学外地，在校学生人数大大减少的情况，决定调整合并为北江临时联合中学，由专员何俊才兼任校长，古师勋、廖拔成、黄开光任副校长。除曲一中迁到志锐中学合并为联合中学的中学部上课外，韶州师范则作为联合中学的师范部，由罗林担任师范部主任，仍留在原址上课。原曲一中校址则空出由政府改办北江公学，为专区各县培训了大批县区乡急需的各方面干部。私立励群中学和广育中学，不久也合并为励群广育联合中学。普光中学，则因人少停办，师生并入北江临时联合中学中学部。

1950年秋，北江临时联合中学师范部恢复韶州师范建制，

校长由包华担任，副校长由赖希先担任。中学部则改为广东北江中学，校长由专员李文华兼任，并增派陈奎昌为副校长。是年美帝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师生员工热烈响应党和政府的抗美援朝号召，积极捐款和参军，学校先后欢送几批学生和年青职工投笔从戎，为抗美援朝作出了贡献。

由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教育，重视培养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女，使学校起了质的变化，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女有了入学受教育的机会，学生人数迅速增加。1952年夏，励群广育联合中学又并入北江中学，北中也同时迁至孝悌路原私立励群中学校址上课，原私立广育中学校址，则改作北江中学临时分教处。

1953年春，北江专区为了适应新中国人民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集中全专区中等学校教师在韶关市孝悌路北江中学内进行思想改造学习，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教师队伍奠定基础。当时为了搞好教师思想改造学习，集中食宿，省也及时派了古海生等同志带领一批刚由广州高中毕业生中挑选出来并经过专门培训的政治辅导员前来帮助各学习组工作，使两个多月的思想改造学习胜利完成任务。参加思想改造的全体教职员通过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艾思奇的《社会发展简史》以及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等革命理论和爱国主义的文章，大大地提高了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热爱新社会的思想，并在典型带动，启发自觉的基础上，参加学习的全体教职员，自觉地认真地自我清理了旧思想（包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三大敌人思想），特别是结合抗美援朝，清算了“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为建设新型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队伍创

造了条件。

思想改造学习结束后，北中校长由专署文教处李凌冰处长兼任。后来由刘碧担任，再后则由廖拔成担任。这段时间，党和人民政府为了重点办好北江中学，为粤北山区培养更多各方面合格的建设人才，积极筹建西河黄田坝新校址。1955年8月，新校第一期工程竣工，高中部师生遂迁入新校址，边上课边参加劳动建校，并改名为北江高级中学，校长仍为刘碧，副校长为廖拔成、古师勋，后来又增加包华。初中部则留在孝悌路原址，同时改名为韶关初级中学，校长为张雪馨（1957年夏调广州）副校长为邓若驰，不久又增加饶纪寰。原广富新街分教处地址，则改归韶关市第八小学使用。1958年潘平担任韶关初级中学校长，饶纪寰仍任副校长，1961年又增调成崇正任副校长。这段时间，韶中学生人数又上升到1200多人，在校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满足适龄青少年入学的要求，市工商联会开办了滨江初级中学，校长由当时市工商联主任委员、韶关市副市长关崇振兼任，副校长由杨启明担任。不久，上级还派了部队转业干部刘廷选担任该校党支部书记。街道也办起了和平初级中学、西河初级中学（后并入和平中学）和太平初级中学、南门初级中学。1963年夏省教育厅批准韶关初级中学招收高中2个班并改名韶关中学。不久，因所有民办初级中学均由市接管改为公办中学，原滨江中学改为韶关市第二中学，校址仍在东河滨江南路，原北江农业技术学校改办的武江中学改为韶关市第三中学，校址在十里亭，原太平中学改为韶关市第四中学，校址在现峰前街，原和平中学改为韶关市第五中学，校址在现西河群康路，原南门中学改为韶关市第六中学，校址在现西河白芒路，韶关中学也同时改为韶关市第一中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仅韶关市第一中学在校学生人数就已超过解放前夕市区几所中学学生的总和，“文革”后发展更快，市直属普通中学已增至12所（不包括原属地区的北江中学、韶州师范、卫校、农中、职中等中等专业学校以及一大批厂办中学），师生人数也比解放前夕翻了十多番了。

1989 . 6 . 17

（作者是韶关市政协副主席、韶关市民进主委）

叶剑英同志到梅坑

龙 景 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约十多人于1949年10月11日晨进入新丰县境，下午5时吃过晚饭后，由新丰民兵作向导，陆续离开新丰向龙门、增城、广州进军。至10月13日下夜3时许，大军胜利进入广州解放路，14日宣告广州解放。

10月17日，天气格外晴朗。正忙于继续迎送南下大军的我们新丰军民，人人喜气洋洋，个个心花怒放。上午10时，北边公路上突然飞快地驶来7辆崭新的小车。大家不约而同地注目猜测，一定是我们的党政军领导同志！10时30分即有华南分局一位姓陈的科长匆匆跑来“梅苑”找到我说：“龙洸（即我在东江抗日纵队用的名字）同志，你好！方方同志找你。”并随即拿一张纸条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正是方方同志手笔：“龙洸同志，请你即来我这里座谈。方方十月十七日。”久闻方方同志大名，却从未见过一面，今天首长亲临梅坑，我总算有机会向他当面聆教了，多么荣幸！多么令人激动！我即随陈科长前行。

方方同志住在梅坑老街一间旧店的二楼，摆布简朴而整洁。我一进门，方同志就热情地过来跟我握手。他说：“老龙，告诉你个好消息，叶总（即叶剑英总参谋长）来广东领导我们工作。就是要他老人家来领导我们，建设好我们的新

广东！走吧，我们一起去见叶总谈谈！”啊！叶总也来了，这真是我们新丰人民的荣幸啊！

叶总住在和方方同志隔两间店的二楼里。附近，是“梅坑支前供应站”，通宵为大军供应一切食品、马草，有武装民兵轮班放哨，保卫首长的安全。当我跟着方方同志进来向叶总拜候问安的时候，他立即站起来和我握手。这当儿有如一股暖流迅速流遍我的全身，我感动得心也快跳出来了。我记得叶总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广九路火车通吗？”我回答说，昨天从广州回来的客商说广九火车照常通车。叶总乐观地露出了笑容。接着，他就向我问起新丰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情况，问新丰有多少人口，问新丰山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怎么样，还说新丰山多林密，是个游击战的好地方，有时方方同志也插话。我向叶总汇报新丰抗日游击战及反蒋斗争所取得的成绩，特别提到新丰人民武装队伍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群众大力的支持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及新丰部队单独地和与友军配合下活捉过五个国民党县长，连续解放两个县城等战绩，受到叶总高度赞扬。对新丰动员全体人民群众连续十三个昼夜出色地接送南下大军的工作，叶总也表示十分满意。

当天下午5时，我和郑大东同志代表中共新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梅坑“梅苑”设家乡菜（白切鸡、酿豆腐、鲜鱼等）便餐招待风尘仆仆、劳苦功高的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同志及其夫人，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方方同志，分局秘书长李嘉人同志以及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同志等。在席间欢谈中，使我得益很大。叶总还叮嘱我们，今天虽然打倒了蒋介石，但还要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镇压国民党

反动头子，要从战争环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今后要领导与组织广大农民群众搞好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特别要注意，我们胜利了，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千万不要忘记脱离人民群众，要保持战争年代那样的热情和干劲，同农民群众一起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叶总说的，我们永久不忘。方方同志还和郑大东同志谈了调他去广州工作的事并亲笔写了介绍字条。

次日早晨，朱光同志邀我乘车同去察看石门水大桥修复工程，这桥是国民党军为阻止日寇入侵，早已炸掉的。该桥离梅坑八公里，河底至桥面有十米高，河宽约有二十八米。解放广州之前，新丰县人民政府曾发动民工数百人抢修梅坑至华眉塘路段的公路桥梁。由于石门水桥工程大，当时又缺乏工具和技术，因河底多大石头木桩打不入，未能及时抢修好。当时总小车要急往广州指挥接收等事宜，任务很紧。梅坑一些民工就提议：把桥头两岸土方再铲低，河底垫上大树。把小车能拆卸的零件都拆下来，组织人力把小车半扛半推抬过去。这办法决定后，部分民工就用大绳索缚住车身，用长木棒做挑担，半推半托地扛过去第一辆小车。跟着，群情激昂，争先恐后，民工队长把民工二、三十人分为一组，每组负责抬一辆。这样，经过三个多小时，二百多民工终于把七辆小车扛过对岸。临别时，叶总和民工队长一一握手，并向全体民工挥手致意。

叶总等在梅坑共住一天半两夜才离开。至今，我们记忆犹新，想起他对我们的鼓励。

（作者在解放初是新丰县县长。现已离休）

回忆黄松坚同志

邓楚白 王炎光 谢永宽
何俊才 李福海 朱小仲

黄松坚同志离开我们快二年了。40多年前，我们曾与黄老在粤北共事多年。回忆起当年艰难的战斗经历，使我们倍加怀念既是长辈、领导者又是亲挚战友的“家长”。

黄老1902年诞生于广西凤山县一个壮族的贫苦农民家庭。家人屡遭不幸。1928年黄父因参加农民运动，为国民党逮捕于狱中逝世，黄母及姐妹三人又由于国民党“围剿”困死在山上，全家只剩他孑然一人。

1924年黄老在韦拔群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曾任县农运特派员，领导盘阳武装起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在凤山、百色两县边境建立农军总队，任总队长。经过严酷斗争考验，1928年8月由韦拔群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凤山县委书记、红七军二十一师副师长、滇黔桂边区委员会书记等职。1938年来广东，先后任省委组织部秘书长、北江特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粤赣湘边区委员会副书记、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副司令员。解放后，任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广西民政厅厅长、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区政协副主席。

黄老在广东战斗了10多年，大多是在粤北，同那里的人

民建立了鱼水情。正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在那难忘的艰苦奋斗岁月里，我与富有革命传统的北江人民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

1938年广东沦陷后，国民党的党政军首脑撤到粤北的韶关。日寇正对粤北虎视眈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逆流也于1939年秋波及粤北。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黄松坚同志于1939年秋在韶关任恢复中的中共北江特委书记。他临危受命，正确分析形势，确定首先抓党的建设，重点在农村和学校。

黄老到北江特委前，在省委组织部任秘书长时，曾深入粤北农村革命老区，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工作。特委依靠这些党组织，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并通过他们团结群众。在以后开展建党工作和武装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黄老很重视占领学校阵地，派了不少党员到中小学去。如翁源县一中、二中，省立连州中学，始兴县风度中学，省立韶州师范以及后来的英德县临时中学、简易师范和英东中学等，都有较强的党的力量。黄老指出，我们不仅要利用学校掩护党的活动，而且要通过这一阵地，建立与当地群众的联系，开辟城乡工作，做到“落地生根”。实践证明，粤北不少干部都是来自学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游击部队的指战员，很多就是学校的师生，如英东中学大部分师生就参加了游击队。

黄老很注意在群众斗争中发展党的力量，重视党的建设。在政治环境险恶时，他极其有效地保存党的力量，采用隐蔽的、合法的斗争方式，掌握“白皮红心”的武装队伍和政权，

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政治环境较好时，发动群众，讲究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在斗争中发展党员。北江特委恢复时，只有200多名党员，到1945年日寇投降时，已发展到1500多名党员。

黄老不仅重视发展党员，还重视对党员的教育。除进行经常性的教育外，黄老还亲自领导特委举办训练班，特委的几位领导人亲自上课。黄老还利用课余讲述他在监狱中的斗争故事，进行革命坚定性和气节的教育。他的讲话深刻生动，虽事隔40年，我们这些深受过他教育的同志仍然记忆犹新，能重述这些故事。

1942年5月，发生了粤北省委被国民党破坏事件，顽固派妄想一网打尽广东的共产党人。地处粤北的北江党组织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黄老对这一突然的重大政治事件，表现出老革命家的坚定性，凭着他的高度警惕性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暂时停止组织活动和党员实行“三勤”（勤学习、勤工作、勤交友）的指示。特委负责人分头到各地传达布置，作有秩序的撤退，进行掩蔽。黄老为了党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一直留在粤北继续坚持战斗。他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二纵队（简称“挺二”）地下党员的关系和国民党的内部矛盾，进行掩蔽斗争。他一方面继续和各县负责人保持联系，一方面就地具体领导“挺二”地下党的工作。由于特委在党的建设中，注意组织的纯洁性和党员的素质，从而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党员都能忠于党，遵守纪律，没有发生任何投敌叛变、自首变节的事件。同时，由于广大党员忠实执行“三勤”方针，只是停止发展党员，并没有停止革命工作，从而使1944年全面恢复组织的工作，得以迅速而又顺利进行，并为武装斗争作了准备。

1944年冬，日寇再次进犯粤北，并侵占了韶关。国民党反动派望风溃逃，粤北大部分地区陷于敌手。黄老面对这一新形势，即派人向省委汇报北江党的情况并提出开展武装斗争的建议。这一建议符合1944年夏省临委会议精神，因此很快得到省临委的同意，并下达了全面恢复党组织活动的指示。黄老满怀喜悦，及时向各地传达部署，并进行如下工作：调配干部，建立各级领导机构；对党员在停止活动期间的政治表现进行审查；恢复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经过恢复组织活动，各地党组织不但没有缩小，还开辟了不少新阵地。扩大了群众基础，培养了一批建党对象。

1939年以来，特委已着手进行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派党员到国民党的杂牌部队，组织和掌握抗日自卫队；派党员到粤北前线和半沦陷区发展党组织，并组建了一支游击队；派党员到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学习。因此，当1944年冬日寇进犯粤北后，武装斗争的局面很快蓬勃发展起来。由我党掌握和直接领导的“挺二”第四大队，第五、第九中队和特务第二中队，便先后建立了起来。由于这些队伍坚持抗日，坚持进步，因此，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挑衅。黄老当机立断，决定把第四大队、第五、第九中队，与北上的东江纵队的队伍合编。此外，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清远县组成了潯江人民抗日义勇队；始兴县组成了风度大队；曲江县组成了人民游击队；上述这些队伍，在北江各地发动群众，打击日寇、汉奸，赢得了群众的支持。解放战争时期，这些队伍发展成为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保护群众利益的坚强的人民武装。

黄老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挺二”之司令莫雄是国民党内政治思想较进步的老军人。黄老先后派

了不少党员到他的部队担任军政职务，并要求他们诚心帮助莫雄改造、提高、发展这支地方杂牌部队，使之成为抗日武装。黄老嘱咐“挺二”地下党组织，要充分肯定莫雄在政治上能与我党长期合作共事这一大节，重在团结教育；对他的某些动摇性，也要向他指明方向，帮助他克服。由于掌握了这一原则，我党对莫雄的统战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莫雄基本上能倾听我们的意见，支持我党的工作，并起到了掩护我地下党的作用。我党在莫雄部队中也起了推动抗日的作

1944年秋，当日寇准备向粤北进犯时，黄老即布置在“挺二”任副司令的地下党员黄桐华向莫雄讲清形势，指出“挺二”必须趁此时机扩充部队，准备事变的到来。当时，莫雄正苦于实力不足，便很高兴地接纳了这一建议，从而使用“挺二”的番号，由我党完全掌握的第四大队和第五、第九中队以及特务二中队得以先后建立起来。

1945年6月，莫雄接到了扫荡东江纵队西北支队的命令，他对此感到左右为难。黄老接到这一消息后，即要黄桐华起草一个既能保护我西北支队，又不使莫雄损失力量，还能使他应付上级的计划。计划得到莫雄的赞同后，黄老即派人赶去西北支队通报情况。到时，黄桐华率领的部队虚张声势地伪装“进剿”，而西北支队亦假装“反击”一下后，便按计划转移。事后，莫雄还受到上级“剿匪”有功的表扬，莫雄很是高兴。

解放后，担任了省参事室副主任的莫雄在一次谈话中，对黄老作了这样的描述：“黄松坚真本事，他长期住在我公馆附近，但我不认识他。我在幕前指挥‘挺二’，他完全清楚；他在幕后指挥‘挺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这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黄老善于做统战工作的才华。

解放后，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民主人士陈汝棠，抗战期间，在韶关任省救济总队长，党派了一批党员到他那里工作，关系很好，黄老和他也有来往。1941年底，特委得到国民党认为陈是“亲共分子”要加以逮捕的情报后，黄老马上派一位在国民党当战车连长的地下党员，用车把陈汝棠转移到五华保护起来。陈很感动，到处宣传我党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

二

黄松坚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身上体现了许多党的优良传统。他把一生交给党安排，不图名利。他坚持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论是在地下党或是在部队，他经常深入基层，作面对面的指导，提出的工作意见具体实在，不作一般的指示。甚至有一位同志曾向黄老提到缺乏印刷报纸的油墨这一具体困难时，他即土法制出两瓶油墨并把制作方法介绍给有关人员，他能倾听下边同志的意见，善于总结来自实际的经验。

黄老有高度的事业心，任劳任怨，不怕艰险。1945年三四月间，省临委负责人梁广同志在西北支队召开会议，黄老适值患病，行动不便，但他长途跋涉，机智地通过国民党军队的防线，出席了会议。1948年初，国民党大举扫荡粤北各游击队根据地。在这艰险困难之际，黄老来到了北江第一支队，一起共同战斗。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在翁江地委会议上，黄老根据香港分局的指示精神，结合当时军情斗争的实际，提出了集中主力打击敌人的决策，从而扭转了翁江地区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抗战期间，特委的经费很困难，黄老派干部在韶关取得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支持，办起“工业合作社”。以后，

又通过莫雄的关系举办了贸易公司。这些公司赚到不少的钱，都用于党的事业。而黄老和其它特委负责人却自奉俭朴，过着极其艰苦的地下党生活。

黄老认真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大公无私，搞“五湖四海”，对干部关怀体贴。有一些同志被国民党逮捕，他多方设法营救。这些同志出狱后，经过深入审查清楚，他又同样地给予信任。有的同志暴露了，他即迅速调离，妥善安置。对党员的生活、疾病、婚姻等个人问题，黄老也常常过问，并给予帮助。但在政治上则从严要求，对同志的错误，谆谆教育批评，不抱偏见。1944年冬，日寇即将进犯清远时，黄老决定驻清远的“挺二”第五中队，在清远沦陷后，应设法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拉到清远文洞山区，会合第九中队一起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但该中队没有认真执行这一指示，把队伍拉到国民党后方的英德东乡。黄老知道后，即写信严肃批评了他们。当他们接受了批评，并把队伍拉到清远敌后时，他又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进行鼓励。黄老对青年干部能充分信任，大胆使用。北江各县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在他的关怀教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

黄老为人厚道，富有人情味，通情达理，诚恳待人。凡接触过他的同志都深切地感到他的这些可贵品质。他虽然是30年代初便任红七军副师长的老党员，但从摆老资格的“架子”。他能敞开心扉跟下级促膝谈心，使同志们感到组织上的温暖和关怀。他对自己的毛病敢于作自我批评。黄老和下级的关系的确是亲密无间的。他备受同志们的爱戴。因此，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家长”。

黄松坚同志与世长辞（1987年11月）转眼就二年了。他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转164页）

民主革命“三大法宝”的模范执行者

——回忆黄桐华同志

梅 日 新

黄桐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深刻的印在我的脑海里，他光辉的战斗事迹时常象电影般一幕幕地呈现在我的眼帘，令我永远不能忘怀。

桐华同志出生于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青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大搏斗的历史时期。他抱着一颗炽热的救国救民之心参加革命。

1932年他由李伯球同志介绍参加了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在我们解放前参加农工党的同志中，他是较早参加民主革命中的一个。几十年来，他始终坚定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个民主革命三大法宝，为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现根据我个人所知道的忆述如下：

1932年，桐华同志受伯球同志的鼓励和帮助，考入广东政治训练班（燕塘军校），以专门学习政治和军事，练好本领，为以后进行武装斗争作好准备。桐华同志在军校或在国民党部队期间，为革命工作广交朋友，联系了一批进步青年政工人员，参加第三党组织的矛盾图书社，经常进行时事学

习讨论会。研究新事物，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从抗日救亡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他们想方设法找寻共产党的关系，于1937年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员杨康华、孙大光、何思贤、卓炯以及李伯球同志等在广州共同发起组织的“广东青年革命同志会”。该会宗旨是响应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的号召，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的活动时间虽然只有半年多，但意义很大，谱写了共产党与第三党团结战斗、风雨同舟的篇章。

在桐华同志联系的一批同志中，成为第三党的骨干，并先后参加共产党的有曾伟、陈伯麟、梁劲夫（马特）、钟国辉、陈展麟等同志。他们当中还有一些同志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如李义容同志参加东江纵队，在一次战役中光荣牺牲；曾伟同志在上海解放前夕牺牲；钟国辉同志于1947年台湾“二·二八”战役中牺牲。都是值得我们深切怀念和学习的。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李伯球、黄桐华等同志率领的广州抗日青年团一百多人到广州东北郊马市岭与农民游击队汇合，组成“别动总队”奔赴粤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

这个队伍的成员，其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学生，三分之一是农民，也有些是工人。他们怀着满腔热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而走在一块，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战斗，过着新型的集体生活。但由于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生活习惯不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彼此缺乏了解，因此一度出现情绪不够稳定，生活比较自由散漫。当时农工党的领导根据这些情况，决定举办学习训练班，班主任由桐华同志担任，他对学员严格要求，亲自制定训练计划。硬性规定每天早上实行军事训

练一至二小时，每周四节政治课和小组讨论。讲授内容有抗战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略战术等。讲师除了由李伯球、钟岱、黄桐华同志担任外，还特约了在附近驻地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又是第三党领导成员的郭翹然、吴今等同志来担任。同时，每周举行生活会一次，谈心、谈感想、谈体会，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一些突出的不良倾向。通过这些活动，提高了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加强了团结，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桐华同志工作艰苦深入，处处以身作则，关心和帮助同志，深得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在办学习班的基础上，挑选了一批素质比较好、有培养前途的学员，参加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干部。后来，根据工作的需要，农工党派出两个政治工作队分别到国民党部队一八六师和一五八师工作。武装中队的农民同志由司徒卫中同志率领到从化、增城、佛冈担任通讯联络工作，这支队伍后来发展成番（禺）、增（城）、龙（门）、从（化）民众抗日游击队，在敌后活动，给敌、伪军和地方的顽固势力以重创（详情见《广东文史资料》第五十辑《战斗八年》一文）。

这支队伍的成立和发展，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与桐华同志的教育、训练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1940年初，莫雄先生领导的北江挺进第二纵队成立。我们知道莫雄先生是爱国将领，一向尊重共产党，并从各方面支持党的工作，但他的队伍，有一些是“大天二”，可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中共地下党为了掌握这支武装队伍，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武装力量，派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进步识知分子到里面工作。桐华同志初时任“挺二”政训室副主任，后升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对改造这支队伍做了大量工作。他模范地、成功地贯彻执行

党的统战政策，在团结抗日的大前提下，坚定不移地贯彻“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他既坚持原则，又善于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自己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群众。因此，得到党内外同志和群众的普遍赞扬，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正如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同志所说的：“黄当时是政训室中校副主任，是第三党的上层人士，思想进步，作风朴实，过去受过我党同志的影响。在‘挺二’工作期间，又积极靠拢党的组织，并坚决与政治上反动的政训室主任作斗争，特委通过一年多对他的考察，根据黄的政治表现和入党要求，经请示省委批准，便吸收了他入党。黄入党后，在北江特委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他的上层地位，对莫雄做了很多工作，得到莫雄的信任，由政训室副主任提为正主任，不久又提升为副司令。我党通过里面的党组织的活动和黄桐华同志在上层起的作用，这支国民党的杂牌队伍，基本上给我们掌握了。通过它掩护了我党的活动，通过它培养了一批武装骨干，通过它掩护和便利了英德、清远等县委组织抗日武装斗争。通过它向党提供了大量敌人内部情报”。这是对黄桐华同志的功绩的正确评价。

抗日战争胜利后，桐华同志除了担任共产党内的工作之外，对民主党派工作亦非常关心，把做好统战工作作为自己的本份。1946年至1947年，他担任民盟南方执行局秘书，民盟广东省委委员，和农工党中央候补委员。这期间他还办了几件好事：

1946年初，农工党筹办人民报，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说服一些亲友捐助一笔款给该报，作出了贡献。

他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为筹集革命经费，在广州靖

海路开办“志通商行”，这是以莫雄的别名“志昂”为标志，使之在粤北通行无阻之意，它既做生意又是党的秘密联络点。桐华同志推荐陈伊林同志担任该店经理。这是共产党与第三党在经济方面合作的又一范例。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全国形势进入解放战争的新阶段。中共华南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动员分散于广东各地的战士复员。以“北江挺二”为基础，成立粤赣先遣支队（后改为北江第一支队），恢复武装斗争。桐华同志先后在该支队任指战员。“这支队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队伍达到六千多人，历经大小战斗三百余次，缴获敌人轻重机枪六十多挺，炮七门，各种武器三千余件，死、伤、俘敌人三千余人，为配合大军南下、解放粤北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引自《北江一支队战史》）。桐华同志为解放斗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桐华同志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艰苦奋斗五十多年。他勤奋学习，不断向上，追求进步，坚持真理。他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对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生活艰苦朴实的崇高品德，永留人间。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走过一段曲折而又光辉的战斗历程：从一个国民党少尉科员转变为人民解放军支队指战员；由一个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他是民主党派成员正确贯彻执行“三大法宝”的杰出代表，也是我们民主党派成员、知识分子学习的一个光辉榜样。

1989 . 3 . 31日于北京

（作者是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广州市委主委）

忆我们在连阳进行的统战活动

麦永坚 黄振口述 江军整理

1948年，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淮海战役已全面展开，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正面临土崩瓦解。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开展蒋管区游击战争和中共香港分局关于《粉碎蒋宋进攻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等有关的指示精神，粤桂湘边纵队主力飞雷队于同年四月从广宁取道清远，经英德的黎洞、九龙、大湾，直上连阳等县开辟新区。在这次北上西挺行动中，飞雷队在阳山留下我们一个排，命名为猛虎队，麦永坚任队长，黄振任指导员，在连阳一带开展活动。

由于新开辟的山区土匪多，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较薄弱，加上很多又是少数民族地区，这就给武装斗争的开展带来很大困难。为了迅速打开局面，根据上级指示，结合当地实际，猛虎队做了大量团结、争取当地各种势力的统一战线工作，为连阳游击新区的顺利扩大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争取黎埠乡长黄公汉

飞雷队进驻连阳山后（后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大发展，1949年×月成立），队部设在阳山的界滩，为扩大活动范围，上级向我们猛虎队下达向西发展的命令。

部队要向西挺进，黎埠是必经之路。当时住阳山黎埠乡乡长的是黄公汉。此人曾与青年党的李甲兰一起参加竞选国民党的国大代表，他在黎埠一带算是一股较大的势力，且与当地土匪也有一些联系，但此人还有一定的正义感。根据我们对黄公汉进行调查和侦察所掌握的情况，最初我们曾设想用武力解决，先吃掉黎埠，后攻打寨岗，一来可以拔掉前进路上的钉子，二来可搞到一批武器装备（包括一挺机枪），以充实自己。

我们将情况向连江支队领导汇报后，上级指示我们要尽量做好争取团结工作。结果我们通过派人与黄公汉联系，向他说清利害，很快使黄公汉有了改变，他在当时国内形势面前，不得不权衡利弊得失，认识到不能与共产党为敌，要为自己准备一条后路。于是，他通过一名叫张玉的与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要我起义，目前仍有一定困难，但保证不打你们，你们过往黎埠地区也不予干扰。”这一情况，我们及时向连江支队负责人周明反映。周明认为，黄公汉有如此表现，应尽量做好争取他的工作。事实也是这样，当时我们虽然有一个六七十人的队伍，但却只有十几条枪，争取黄靠拢我们，对部队活动和发展是有利的。这样，我们与黄公汉建立了秘密的联系。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部队进出黎埠，攻打寨岗，黄公汉的确保持中立，没有给我们制造麻烦。

我们与黄秘密联系以及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终于被李甲兰发现，他向阳山县府密报并催促阳山县长李锦标先下手为强。李锦标遂借巡视为名，很快就把黄公汉抓了起来。然后，以黄勾结共军麦永坚的罪名，将其就地枪杀了。解放后，麦永坚将黄公汉的儿子黄家绕保护起来，后安排在粮所工作。

改造张、陈的土匪队伍

正当我们在阳山一带游击区不断扩大发展时，有一股经济土匪窜入我们活动的附近地区。这股土匪，以张玉、陈志松为首，少则六七十人，多则二三百人。他们以连县的大小龙山为据点，时分时合，出没无常，到处打家劫舍，危害乡里。连英阳一带，本来就匪祸利害，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张、陈在这一带，国民党曾招安下山为兵，几上几落，兵匪不分。我们初来乍到，群众还不理解。这股土匪到来，更对我们的工作开展增加了困难。

后我们对这股土匪作了调查分析，了解到除少数兵痞流氓外，有相当部分是因欠租欠债，“逼上梁山”的。是股经济性质的土匪。经过研究，我们就把他们与反动的政治土匪分开来，决定采用争取和教育改造的方法来处理张、陈这股土匪问题，决不能把他们推之门外，让他们投向敌人一边。

基于这种分析，我们决定立即派人与张、陈取得联系，宣传我们的政策，后经与他们反复商讨，他们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如下三条原则：（1），不在我们部队活动的地区任意抢劫，奸淫妇女；（2），不与反动势力、地主豪绅勾结，不出卖我们部队的情况；（3），不得挂我们部队番号招摇撞骗，为非作歹。以上三条，我们严正声明：遵守即可，否则，必以武力惩罚。但在执行上述原则时，如经济上或其他方面有困难时，在许可的情况下，我们可考虑适当帮助解决。经过商量，张、陈两人一则认为我们所提合情合理，二则也慑于我们部队的威力（其实当时我部队力量仍很薄弱，主要是我

们虚张声势，加上曾狠狠地打过一二次胜仗），表示愿意接受，按上述三原则去做。

我们将情况请示连江支队领导，得到领导的同意，并指示我们集中一定精力，做好这股土匪的工作。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和他们的精神状态，使他们放心，不生异志，我们遵循当时习俗，同意他们结拜兄弟的提议，并按年龄的大小排辈，张玉为老大，陈志松为老二，麦永坚为老三，黄振为老四。当时四人结拜为兄弟时，还举行砍鸡头、饮血酒的仪式。

结拜之后，张、陈邀我俩一起回到他们的营寨，集合他们的队伍，开了一个会。会上，黄振发表了讲话，大致内容是宣传我们的方针政策，指出他们做了一些对不起人民大众的事，但这不是他们本性决定的，而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逼出来的，希望大家改邪归正，回到正道上来。并反复宣传我们大家都是受三座大山压迫的穷苦人，不要再干那些贫苦人害穷苦人的事了。黄振讲话使他们很激奋。会议之后，杀了两口大肥猪，全体人员一起聚餐和全体举手发誓，决心不再做有害穷人的事了。

自此以后，张玉、陈志松不断与我们联系（我部由黄振负责），提供敌人情报，使我部更好掌握连阳一带的敌情，有利我们的活动也促进了部队的发展。我们第二次攻打寨岗时，陈志松带领他的队伍约五六十人随队前往。在这次战斗中，陈志松还负了伤。根据约法三章的规定，张、陈队伍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曾不断在经济和物资上对他们给予支持，使他们越来越相信我们，靠拢我们。

我们和张、陈约法三章的三项原则，曾在连阳一带广为宣传，对连阳其他股匪不遵守约法三章的，我们就坚决打击。

当时有一股以苏昌芬为首的土匪，挂着我们部队的番号到处抢劫，我们发出警告后，仍不收敛，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有一次我们在阳山（今属连县）西江，我们假借理由邀约苏昌芬到我们驻地谈话，他如约于傍晚带着一个副手和两个警卫到了我们营地。当时部队营地只有我俩和另外三个战士。苏一到达，我们的战士即劝助其警卫于门外，只放苏和其副手进屋。当麦永坚邀苏到院子里谈话时（麦有警卫员相随），麦借抽烟摸火柴往腰部摸枪，苏很警惕，忙说自己有火柴，亦往腰间摸。但说时迟，那时快，麦一掌将他推倒，和警卫员一起将苏抓住。与此同时，黄振也缴了其副手的枪。苏在门外两个警卫听到院内嘈杂声，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也被我两名战士俘虏了。因苏昌芬无恶不作，我们把他抓到后，部队即在西江开了个群众大会，将苏镇压了。这一来，其余各股土匪收敛多了。

解放后，张玉、陈志松的队伍经过教育改造，有的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有的回家务农，但也还有极少数逃往广西一带继续为匪进行活动。张、陈两人在解放后，主动放下武器，改邪归正，跟随部队一起，参加连英阳一带的剿匪，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团结瑶王房尔云森

1948年春节前，连支司令部从战略上考虑，认为部队要扩大发展就不能困死在阳山西部，而必须从西部打出去。当时的形势很险峻，白色恐怖严重，有些连阳一带的中共地下党员发生动摇，如某校校长杨××，我们去找他，他说别再找了，再找就不见我们了；寨岗的谢××（中共地下党员）

也不敢来与我们联系，使部队拟打寨岗的行动碰到很多困难。在此情况下，司令员对形势作了估计：要么我们打下寨岗，站稳脚跟，坚持下去，继续发展；要么困死阳山西部；要么重新撤回广宁。

根据当时的形势，要从阳山西部打出去，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做好瑶民的工作，一则可以扩大活动范围，二则可以打开进出瑶区，通往西部的通道。当时中心岗瑶民居住区有一个特点，其山脚下有许多从事蒸酒、磨豆腐、打铁器、卖小百货等职业的汉人居住。这些人也都与瑶民有较密切的联系和来往。我们遵照司令部的指示，到达中心岗一个蒸酒的寮棚住下，态度诚恳地请教酒老板如何进入瑶区。经酒老板介绍，我们掌握了许多瑶族的风俗习惯、行规礼义。酒老板还告诉我们，房尔云森是这里的瑶王，做好他的工作，一切都好办。我们请酒老板前往瑶区，试探房尔云森的态度，结果，瑶王同意接见我们。

约定与瑶王相见的日期之后，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充分准备。由麦永坚带着妻子朱咏仪（部队卫生员，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和两个警卫员，挑着买米的火柴、花布等日用品，还拉上一条牛，作为礼物，前往瑶区，拜候瑶王。房尔云森远远看见我们只来了四个人，且还带着妇女，挑了那么些礼物前来，认为我们是诚心诚意，没有恶意的，并对我们如此尊重瑶民的风俗习惯，相当高兴。当即邀来众多的瑶胞头人，聚在一起喝酒畅谈，一直到天亮。席间，瑶王还把全家大小叫出来与我们见面。趁此机会，麦永坚反复向瑶胞宣传我们的方针政策、部队宗旨，以及对瑶族人民的态度。由于国民党军队每每进入瑶区，烧杀抢掠，胡作非为，瑶民对当兵的恨之入骨。经过我们的这一宣传，知道我们的部队

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的部队，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这就为我们以后在瑶区的活动打下了基础。

有一次，我们的部队被国民党“清剿”军包围于寨岗，经过激烈战斗，向瑶区方向突围，一边打一边撤。当我们进入房尔云森地盘时，瑶胞便放我们的部队过去，但又怕日后国民党反动派找他们的麻烦，便假装端起鸟枪朝天放了几枪，以避敌人耳目。我们撤退时，有个约40岁左右的皮货商（我们估计是国民党的特务）尾随我们。他到达瑶寨之后，挑拨瑶民与我们为敌，要瑶民打我们，但因我们与瑶民已建立了感情，有了良好的关系，瑶民根本不听那一套。

又有一次，我们战斗受挫，不得不撤入瑶区。这时已经深夜，又冷又饿又累，我们带着队伍，敲开瑶胞的大门，他们一见是我们，就立即热情请我们入屋烤火，还马上为我们煮饭。我们吃的这顿饭，因瑶胞拿出收藏的牛油放进饭里，味道很难闻（瑶胞可能认为好吃），加上战斗受挫心情不好，我俩看着战士们吃，自己则一口也咽不下。吃完饭后，已是深夜，瑶胞执意要为我们带路，外面寒气逼人，瑶胞衣服单薄，黄振把自己的棉衣脱下，给带路的瑶胞穿上。这位瑶胞一直将我们送到界滩附近。这时，已是凌晨三点，瑶胞才返回。

还有一次，我俩奉命前往广宁，道路被敌人封锁，只得绕道经过瑶山。这次，瑶胞生活虽然已十分困难，但还是煮了一锅小手指粗的番薯给我们充饥。为了躲避敌人耳目，白天不能走，我们七八名战士就挤在一个山崖底下。这时，崖上面有瑶民砍柴，明知我们就藏在他们脚下，也不声张，安全地把我们保护了起来。

真诚合作 风雨同舟

陈培兴 周健夫 李子德 张 艺

(一)

同始兴县城仅一水之隔的刘镇营，1936年，德国教会办了一所教堂，名叫“福音堂”。教堂附设了一所“德华小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中断给教堂和学校经济上的支持，改校名为“信义小学”。

教堂牧师凌德渊，始兴狮石下村人，早年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1940年，他兼任校董事长，中共广东省委政治交通员郭招贤任校长。

凌牧师先后在中共地党陈培兴、邓文礼、邓文畴、吴新民、梁炎木、郭招贤、祝克勤、李启民、莫世延、凌信乐（凌牧师的儿子）等开导下，思想进步，是宗教界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同共产党真诚合作，肝胆相照。

抗日战争期间，凌牧师看到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祖国大片河山被丢失，深感忧虑。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抗日刚胜利后的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全面内战，使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活生生的事实启发和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他积极为人民解放事业做了不少的工作。

1940年，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后，省

收容量为一千人、此纯为辅助军事临时医疗机构。

1940年间，各地相应地加快和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南雄、始兴、乐昌、英德、清远、连平、河源、龙川、花县等县，都成立了县卫生院。到1941年时，仁化、乳源、阳山等县的卫生院也先后成立。

1944年5月，温俊略医师（西医），在韶关市风度北路127号，创办一所“博爱医院”。内有医师二名、护士一名。药剂生一名。有普通诊疗器械设备，共设病床四张，业务范围以内儿科为主。同年9月，曲江县健婴留产所正式成立，所址设在韶关市风度北路中华街，负责人是李群英、麦爱群。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45年1月曲江县领有私人开业执照证的，有西医师14人、牙医7人、中医48人、助产士6人。这些持有行医执照的医生，绝大部分都集中于城市，尤以市区为主。这些个体开业医师中，当时比较知名的有中医李仁溥（擅长内科、妇科、小儿科。还兼任熟药业公会理事长、商会会长，曲江县国医馆馆长之职）。还有杨庆麟、侯亦华、黄崇邦都擅长内科。谈伟雄擅长骨科。李抱真擅长针灸、杂症（是本市第一位针灸中医师）。西医中有苏日新、潘允和、袁涤山等人。

1945年1月22日，曲江告急，日本侵略军在1月27日攻占韶州城。当时本市所有医院的医务人员已撤离，曲江循道医院被日军改作日本陆军医院之用。

1945年8月28日，日本宣布投降，日军撤出循道医院。朱志刚、张新培等正式接管该院。并于9月1日恢复医院正常工作。9月30日，美国基督教也在连县双喜山重建惠爱、博爱两间医院，并开办民生、光惠两间护校。11月，曲江循

道医院为了方便民众就医，在市区东风中路115号，循道会礼拜堂前座屋中开设市区门诊。抗战胜利后，原来疏散了的医护人员都回城开业了，原来随省府来韶关的医务人员大都在1945年11月前撤走，返回广州。

抗战胜利后，粤北地区原驻防抗日后方医院及公立医院，都在1946年前全部撤离，这时，在韶关附近公立医院少了，私人个体开业逐渐回升。从抗战后的1941年至1949年算起，共增加私人开业诊所25间，而且每间诊所至少有一名医师，其中有6间诊所兼有护士，8间诊所还有助产士配备。

1949年1月，仅曲江县国药业，商业同业公会登记，就已发展为有甲级行堂8间、乙级行堂12间、丙级行堂15间、丁级行堂19间，共54间。韶关市内有中医诊所51间，其中中医内科医师有34人、骨伤科医师9人、草医杂症、针灸及游医8人。这些医师及其诊所，都集中在市区内，东西两河甚少。

是年在韶关的公立医院，除曲江县卫生院、曲江循道医院外，尚有从南京搬来的中央医院、后勤部71后方医院、94军后方医院，以及71后方医院院长私办的韶关医院。

区，张鉴唐向导着澄江游击大队政委邓文畴和陈仑先等同志，到龙源坝会晤陈水源。陈水源当即表示，只要张鉴唐、邓文畴写来条子，要枪有枪，要粮有粮。游击队挺进龙源坝后，陈水源的自卫队改编为民兵常备队，接受游击队领导，积极支持游击队开展工作。

通过张鉴唐的关系，争取团结了陈水源等地方开明人士，开辟了龙源坝新游击区，进一步开展了“三南”地区工作，为南下的人民解放军进军广东开辟了一条通道。

1947年冬，张鉴唐毅然参加了游击队。翌年春，国民党反动派说他“为匪”、“通匪”、“济匪”、“窝匪”，抄了他的家，烧了他家的房屋。

张鉴唐尽管身处极端危难的境地，但始终坚持同共产党合作，积极支持游击队。他的为人，对革命的贡献，深为始兴人民敬仰。

解放后，张鉴唐任始兴县人民政府建设科副科长。

(三)

新村开明绅士何庆功，中山大学农科毕业，曾任始兴中学校长多年，任过县参议长，是始兴教育界有影响的人士。当时，他看到日寇横行，国民党政府腐败，人民遭殃，深感不安。

何庆功长期在中共始兴地党李子德、李启民、莫世延、何衍英（庆功之子）等同志的开导和影响下，同共产党真诚合作，积极支持游击队。

1945年秋，中共地下党员钟履全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地党通过何庆功出面营救。他冒着风险自找国民党驻军师长温淑海交涉，面对温说：“钟履全是我的学生，绝对不是共党分子”。后经何庆功出面具保，钟履全被释放出狱。

一次，坚持地下工作的何世兰同志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何庆功得悉情况后，便对何世兰说：“国民党要抓你，这里很危险，你要快离开。”由于何庆功的“通水”，使何世兰免遭于难。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始兴游击队，在圩镇和大村庄建立反动自卫队。新村是离县城仅六、七华里的大村庄，在国民党政府的勒令下，以公堂钱购买枪弹，组织了一支30多人枪的自卫队。何庆功遵照中共地党意见，将自卫队枪支收集封存，光挂着自卫队的空“牌子”，既应付过了国民党，又不影响游击队的来往活动。

何庆功曾在离其家乡不远的靠山边的地方办了个小农场，地下党通过其儿子何衍英（共产党员）在该场建立了交通站，经常给部队输送情报和军用物资等。解放前夕，该村自卫队大部分枪支子弹都秘密地运进了部队。

（四）

始兴县参议会参议长饶振澜，是始兴城郊高营村人。曾任始兴中学校长、县教育局长、乡村师范校长、教育会长等职。是始兴教育界的长辈。早年受过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思想开明，倾向进步。北伐时期，他积极协助政府支持北伐军路过始兴。抗战时期，饶振澜出于保国保家乡，动员两个儿子从军，参加抗战。日本投降后，解放战争期间，他不愿儿子参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工作，命儿子回乡执教。

1947年春，始兴医师陈大勋，因儿子是游击队负责人，自己也积极支持游击队。国民党反动派要抓他，使他长期避乡间，不敢在县城开业行医。饶振澜从人民利益考虑，亲

自为陈医师具保，使他复出县城开业，方便了群众就医。

1948年，饶振澜还冒着风险营救过遭国民党拘押的几个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及一些群众。

1949年春夏间，中共五岭地委委派五支队长邓文礼与始兴县长商谈有关饶纪绵率部起义之事，饶振澜受邓文礼委托，亲自给饶纪绵转送信件，帮做开导工作。9月，饶振澜参加了以饶纪绵为首的起义行列，迎接解放。

1950年，始兴召开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时，邀请了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而受到人民尊敬的饶振澜先生参加了大会。

(五)

沈所石下村明达小学校长李子衡，是始兴教育界的知名进步人士，长期在其弟共产党员李子德和其他许多地党同志开导和影响下，同地党同志真诚合作，风雨同舟，深受同志们的尊敬。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始兴地党先后派莫世延、谭金伦、莫巩、李士权、李群、李启民、李士文、何世兰等许多同志到明达小学任教。1946年6月，王华同志到始兴任中共特派员，安排在明达小学任教。李子衡以校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和沈所乡乡民代表大会主席的公开身份掩护在校的同志。他还给王华同志弄到“身份证”，方便王华同志来往各地开展工作。

明达小学是中共地党的重要据点，李子衡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常为地党和游击队传递信件情报，散发传单。他还积极动员学生参加游击队。

1949年春，八约地区工委和游击队领导人张艺、陈退赞、李子德同志通过李子衡校长从中去做工作，促使石下村首席保长、自卫队长李大然携械起义，投奔游击队。李子衡校长也同时参加了游击武装斗争。

(六)

在始兴广阔的深山密林里，散居着六百多历代受尽反动派压迫和剥削，熬受着非人生活的瑶族同胞。

瑶胞看到共产党和游击队来到瑶山上，心里喜悦，感到苦日子有了尽头，翻身有了希望。在游击队的宣传发动下，瑶族中有许多有影响的人士，如李子窝的邵书保，桐木坑的邵丁盛，右拔水的赵关秀，罗坝的赵福生、杨保、莫发新，龙口堂的邓石堂，金竹峯的邓斗富，雷瑶的邓石英和张荣古，左拔水的邓澄保和赵丁盛，中拔水的赵丁贵，汤湖峯的邓秋明、邓礼常、李赵英（保长）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同广大贫苦瑶胞一起，不怕遭杀头灭族，积极支持游击队，瑶、汉兄弟并肩战斗。

游击队在瑶山上建立了几个交通站，在汤湖^峯建立了中心站，瑶胞邓福全担任交通员，工作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东纵、珠纵等北上，五岭部队路过瑶区时，先后留下过100多个伤病员，交由瑶胞掩蔽治疗，他们都尽力完成任务。许多伤病员全愈后又返回部队。中共始兴县委书记、风度抗日游击大队政委周健夫生病不能跟随部队，五支队政委黄通（黄友崖）和澄江大队政委邓文畴因指挥战斗受伤，曾先后在瑶区掩蔽治疗。

瑶区是游击队的重要通道，来往同志络绎不绝。如东纵、

珠纵和中共五岭地委和游击队的主要领导林鏘云、王作尧、杨康华、李东明、黄业、刘培、张华、袁鉴文、唐麟、刘亚球、陈中夫、金阳、邓楚白等许多同志，曾一次或多次路过瑶区通道，夜宿瑶家，都受到他们的欢迎。

国民党军队接连不断地扫荡瑶区，又烧又抢，奸淫瑶妹，更激怒了广大瑶胞，使他们倍增跟着共产党革命的决心。瑶胞的革命光辉事迹，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张艺执笔）

（上接144页）

人去精神在，黄松坚精神永存。

（原载《广东党史资料第十三辑》题目为《留在粤北的足迹》，转载时作了改动，特此声明。）

三长中学 一样胸怀

——我在连县三任中学校长回忆片断

肖 怀 德

1930年，我在广雅书院高中读师范科，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教育学系。我是决心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大学毕业后，在连县三次任中学校长，经历过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总的目标只有一个：培育好下一代。今天追忆四、五十年前的往事，既有欢乐甜美的回忆，也有艰苦辛酸的伤痕。

1942年4月，我在韶关接到肖怀义（当时中共地下党连县东陂区委书记）从家乡来信，说是我们家乡要开办西溪中学，暗示在他们的同志中暂时没有大学毕业生，担心校长一职落在地方顽固势力手上，邀我回去创办西溪中学。这间新办中学，是在原有九乡联立的高等小学基础上创办起来的。当时称为戴帽子中学。中学开办后，原有高小六个班，统归中学管理。以后中学逐年扩班，高小逐年缩减。高小教师，大半是思想进步的青年，而校长又是倾向中共的，这样，中共组织可在这间高小，作为地下活动的基地，所以要我回去担任西溪中学校长职务。当时，我从多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家乡情况，我是一清二楚的。国民党统治势力居主要地位，封建势力仍然强大。我是决心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况且

自己又是农工民主党党员，教育下一代和变革社会，是我的历史任务，我感到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我征求我妻子及亲友的意见，他们都很支持。最后我请示农工民主党省委意见，他们要求我个人先表态，才提意见。于是，我率直地说：“我是决心献身教育事业的。按目前情况说，千事万事，不如帮助中共做一件小事。今天可以说是鱼与熊掌两者兼得，时机一失，以后恐怕要后悔的。”省委见我如此坚决，便赞同我回连县去担任西溪中学校长。省委杨逸棠还说得十分恳切，他说：“你思想和行动都紧密靠拢中共，正是我们农工民主党求之不得的。今你作出表率，我一定在组织内介绍表扬。”我听了，虽感到杨所说的未免过誉，其实，我们农工党接受中共领导进行工作的，何止我一个人。不过他的话，对我是一种鼓励，应该感谢。

1942年8月中旬，我回去连县接事，中学和高小的人事，我都同意中共组织的提名，其中教导主任未聘定，因开学在即，我临时用了吴宝轩担任此职。此人对教育工作有一定能力，可以胜任。但他一有空便去茶楼饮茶，与外界接触较多，我担心学校内部的事泄露于外，第二学期便辞退了他。

如何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内办好一间学校，培育好下一代，又能帮助中共地下党从事革命活动，传播真理种子？我认为最可靠的办法，莫如把学校办得完善，办出成绩。因此，我处处以身作则，带动教师认真教学，启发、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是非，坚持真理。注意增加教学设备，设立图书馆，方便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以满足学生求知需要（图书管理员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钟达明）。那时，我校理化实验室，可以说是县内戴帽子中学之冠。有一次，县长李仲仁带同区长和县督学等人到校视察，看到学校环境整齐清洁，学生好学，

又有礼貌，他们都交口称赞。

以后，又聘请没有回原校上课留在东陂的中大教授郑师许、文理学院教授何绍甲担任历史课和教导主任，聘请越秀中学的陈庆云、张经道兼任我校语文和英语课，请来何绍甲夫人上美术课，又通过一些关系，请越秀中学高中学生张韶、唐乔到校教音乐，使校园响遍抗战歌声。所有这些教师的教学，都大受学生欢迎，社会人士都赞扬西溪中学人才济济，连远在湖南兰山县的个别学生也到我校请求转学。因此，我在社会上的发言权也增强了。

但是，预料不到的就是肖怀义（当时他是西溪中学体育教师）的政治面目有所暴露，反动派早已暗中监视。我同意他离开学校，回去湖江头村躲避较为安全，可他回去不久在家里开会时，遭到国民党军警七、八十人的围捕，庆幸肖怀义突围上山去了，而反动军警却把我大哥和我一起拘捕下狱。消息传出，社会各界震动。几天后，省方面连续有人来电到县指责，县长和驻军副司令，都感到众怒难犯，不久，便把我俩释放出狱。我为了坚持正义事业，没有离开连县，仍回学校继续工作。

约一个月后，日寇进犯韶关，北面日军分遣队从兰山南下进迫连县，国民党政府已准备疏散下乡，我们在校的同志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变措施。对我个人问题，大家认为日军一来，社会必然混乱，反动派会趁机加害于我，主张尽快离开连县，于是，我便转移去韶关了。

1945年8月底，日本投降了。我前往广州见李章达，他主张我回粤北工作。他说：按形势发展，中国内战不可避免，粤北各县必将开辟为游击区，他希望我回连县与当地中共组织联系，做好准备工作。他问我能否找到公开职业作掩护。

恰在这时，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提出“粤北人办粤北事”，主张粤北人才都应回去为桑梓服务。我县何春帆县长问我回去当连中校长可否？我便一口答应了。不久便由教育厅长提交省府会议通过，公开发表我任连县中学校长。李章达问我：“你有办法与当地中共组织联系上吗？”我说：“可以，不必费你出力。”1946年2月，我回连县，接任连县中学校长工作。

接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访中共有关人士，得到中共组织指令，由邓炎汉与我联系。我们商量好学校的人事安排，其中最棘手的事情就是熊××的问题。他是连中三青团的负责人，体育专科毕业，思想非常顽固，若不安排他兼任体育主任，势必产生龃龉矛盾。权衡轻重，决定暂时用他当主任。另有部份旧任教职员工，都暂时留用，其余缺额，以后逐步选聘。在教师队伍中，有何之光、容文序、黄宜诚、李绍圣、吴立善、潘贤修等，均为中共地下党员。

约半年后的一天，熊××来见我说：“学生办的墙报，言论乖谬，明显为中共宣传张目，非查禁不可。”为此，我曾与他展开了一场有理、有节，针锋相对的辩论，结果，熊××感到我的态度坚决而强硬，只好有礼貌地告辞。自然，熊对我的话是听不入耳的（此人是个特务分子，解放后上山与人民政府对抗，被我军击毙了）。

经过这场论战，使我进一步了解他的为人，也使他知道我决不是软弱可欺的。但是，他还是在外面不断传播学生墙报言论乖谬，甚至很神气地说要向教育厅告我的状。我便与邓炎汉商量如何对付他。最后决定先撤掉他的体育主任这个职位，并由邓到县三青团制造舆论，说明我们的苦衷。一周后，我即把这件事公开宣布，打乱他的威风。有人说：他一定会告你的状了。我说：不怕的，唯有撤了他的职，才使他

的告状先输一着。

我最大的任务，要把学校办好，取得当地广大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唯有这一条，在地方上可以站得稳。我估计，教育厅方面，如无重大问题发生，可以取得其信任的。

怎样才能把连县中学办好呢？我必须善于团结教师，动员教师认真教学，校长也担任功课，以身作则，推动教学改进。对有成绩的教师，多表扬奖励，对教学有困难的教师，多作具体帮助。要使学生通过种种课外学习活动和文体活动，认识社会真理，活跃思想，积极向上，既勤奋学习，又有纪律。为了加强行政领导核心作用，我一再请求邓炎汉兼任总务主任（他原任邻校燕喜中学教导主任），他同意了，我的心也更踏实了。邓在中山大学先我二年毕业，长期在连县从事教育工作，论学历、论经验和团结教师方面，他比我强得多。他在学校有个职位，对学校领导工作自然起的作用更大，每次我公差外出，都由他代理校长职务。

对学生的体育活动，我是一贯重视的。我公开宣布：学生不得迟起床，不得迟到操场，宣布之后，由各班班主任严格执行。一可增强学生体质，二则有利培养学生纪律习惯。

学校师生，大半在学校住宿，我当然以校为家，除星期日外，我没有一天不与师生在一起，大事小事，几乎没有拖到第二天才处理的。

中共组织在学校的工作，主要指导学生政治活动和在师生中发展组织。比较重大的问题由邓与我商量，平日则由一位中共女学生李佩霜向我汇报学生思想情况，无疑这是学校中共组织尊重校长职权的标志，是协助我办好教学工作的有力保证。

1948年1月18日，连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

武装起义，我参加了这次起义，因我的社会关系面广，被推为丰阳方面起义部队的大队长。反动政府惊慌了，在县内大小村镇广贴布告，对我重金悬红通缉。为此，中共地下党给了我极为亲切的关注、帮助、保护，使得我能安然渡过这艰苦、危难的岁月。

1951年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委任我任省立连州中学校长。

当时上级的要求是要把学校迅速推上正轨，其次是认真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在韶关开会时，中共韶关地委宣传部长李凌冰特别指示：如果学校受到干扰，要我们当校长的坚决顶住，他承担一切责任。因为解放初期，一切行政工作百废待举，忙与乱是比较突出的。

有一次，县里召开干部会议，人数在千人以上，一定要借用学校礼堂开会。不管我说得舌干唇焦，来和我接头的干部仍然不理解我的用意，反而认为我不要党委的领导。我亲自找到县委书记，陈述理由，请县委考虑我的意见，给学校以大力支持。县委经过考虑，认为情况属实，便同意我的请求。但经办人仍有烦言，对我不满。不过我已遵命顶住外边对学校的干扰，对于办好学校，使学生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起到一定的作用。

1958年1月反右斗争，我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我调离了自己为之付出半生精力的教坛，结束了我辛勤耕作的教育园地。以后，我被平反，荣幸地得到连县人民的信赖和委托，走上了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坛。

共产党人忠诚的朋友陈发元

陈心镜 黄壮楨 陈志超 何 刚 吴友三

陈发元是翁源龙仙江下村人。在政治组织上，他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在他生前的几十年间，却长期不渝地与中共翁东（按指翁源龙仙、蓝李、南浦一带，下同）地下组织进行密切无间的合作，成了共产党人忠诚的战友，在长期共同战斗中，与中共地党一起，为翁东人民抗日和翁东人民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迹。

现凭记忆和调查了解，对有关陈发元的史料，仅作一些简要、片断的记述，以供有关地方史研究参考。

加入抗日行列

陈发元一向勤奋好学，年轻时即潜心研究中医，又爱好书画和古体诗词。他为人正直，有正义感。因此，在三十年代初期翁东一带的知识界中，就颇具声望。抗日战争开始，他正是三十出头不多的热血青年，亲自耳闻目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吞祖国的大好河山，任意残酷杀害我中华儿女，激愤之情，常常流露于言行之中。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国民党广东省府北迁韶关，大批国民党部队也先后撤至粤北。这时，一支由中共地党组织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下简称抗

先队），随之亦由广州陆续来到连县、英德、翁源……，粤北山区抗日热潮，顿时沸腾起来。来到翁源龙仙的抗先队伍，也同样立即深入城镇、农村群众之中，广泛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城乡散发传单，粉刷标语，在龙仙街头搭台公演抗日话剧，在农村乡镇兴办夜校，教群众识字、学文化，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日军暴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一时间，龙仙这个山沟小镇，立即掀起如火如荼的抗日热潮。在此期间，陈发元身处其中，亲闻亲见，对抗先队敬佩之余，亦更加激发起自己满腔的救国热情。因而他主动上门与抗先队员频繁接触，请教抗日救亡道理。在反复往返之中，抗先队对陈发元的一片爱国热情，感到十分欣赏。经过必要了解，抗先队中当时的中共地下领导同志如于光远（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温京（即陈华，原广东省科协副主席）、邓楚白（原海军政治部主任）、陈中夫等，立即动员陈发元参加抗日宣传，并推荐他为龙仙抗先分队队长。陈发元十分高兴，并毫不犹豫地应允。随即，他就积极投入抗日行列之中，热情主动腾出自己在龙仙街开设的中药店铺“五德堂”，交由抗先队作为队部的办公地址，并亲自带头参加抗日宣传，带头参加和发动组织青年参加军事训练，学习军事知识，学习游击战术和宣传抗日民族爱国统一战线政策等一连串的活动。

陈发元坚持抗日救亡，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精神，即使在国民党反共反人民气焰十分嚣张、革命暂时转入低潮的严峻时刻，他也始终站在共产党人一边，表现一贯，从不动摇，从不畏惧。四十年代初，抗先队撤消，转为担任龙仙镇中心小学校长期间，他还是一如既往接受中共地下组织意见，在学校中，继续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宣传革命进步思想，在学

生中组织歌咏队、话剧组、书法组、美术组、球队和出版各种墙报，把学校办得异常生动活泼又朝气蓬勃，培养了大批的进步的青少年一代。1942年夏，龙仙镇小学举行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他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学生要继续追求进步，并即席赋诗数首赠别毕业学生，诗中曾有：“清晨迷雾竞无边，荆棘长途路万千；拔剑共挥光闪处，拨开阴霾见青天。”等许多激昂慷慨的诗句，由此也可见陈发元忧国忧民，始终坚持热爱国家民族的一身正气。

中共翁源县委领导人，有鉴于陈发元这一热爱真理，追求进步的可贵品德，因而，此后一段漫长时期，都始终如一地视他为党的忠诚的朋友，并委派中共地下翁东区委负责人先后有官平、刘克洪、黎士权、刘初鹏等长期与陈发元直接保持紧密的联系。四十多年之后，于八十年代初期，共产党早期在翁源曾与陈发元共事过的许多领导人如于光远、温京、邓楚白等，先后回翁源探望老区群众及被邀参加翁源党史座谈时，均十分关心地一一详询了陈发元解放前后的状况，由此可见共产党人从未忘怀曾与自己并肩战斗的忠诚战友的一片怀念之情。

支持中共翁东地下党的活动

从抗日战争初期到解放战争胜利，陈发元先生和中共翁东区地下党组织，从未间断地进行长期无私的合作，他为掩护翁东地党的活动和帮助、支持地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方便和条件。应该说，陈发元为翁东人民革命事业，立下不少的功绩。

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大约是至1944年夏以前，陈

发元担任龙仙镇中心小学校的校长。在这期间，他完全信赖中共翁东地下组织，学校教师员工几乎全部都委托地党安排，使这间仅有10多名教师的学校，先后被安排进入这间小学工作的中共党员就有李柏松（李群）、刘克洪、刘初鹏、刘克颖（刘平）、陈冠元、吴镜明、庄静、何兆让、张作寰，进步青年陈心镜、吴镜先、刘朋雄等，使这间小学长期间成为翁东地党活动的重要据点。尽管陈发元对翁东地党的许多活动，他是知道或已有所觉察，但他从不干预、过问，反而暗中给予可能的掩护支持，甚至利用他在当地的声望和合法身份（按：陈发元由1943年下半年起以龙仙镇镇长兼任龙仙镇中心小学校长），公开以合法斗争形式掩保地下党的活动。1944年龙仙镇小学暑假期间，当时中共翁东区负责人刘克洪，在这间小学以补习文化为名，办了一个发展“抗日青年同盟”的培训班（执笔者按：凭记忆名称应叫作是“抗日少年同盟”，简称为“抗盟”，属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进行抗日宣传和革命理论的教育。恰好这个时候，国民党军某部调防路过龙仙，这个部队的一个团部强行要进驻龙仙小学。“抗盟”培训班负责人刘克洪，为保证当时地党任务的按期完成，立即据理拒绝国民党军进驻学校，为此，竟遭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围攻恐吓。此时，陈发元闻讯，就以镇长身份立即率领龙仙镇自卫中队，也全副武装荷枪实弹赶到龙仙镇小学，以示与国民党军相抗衡，并义正词严谴责他们不能蛮横无理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慑于这一威力，国民党部队最后不得不撤出学校，从而保证了翁东地党这一活动的顺利进行。

陈发元先生利用他自己在当地的声望，为掩护翁东地党活动和支持地党的发展，是多方面，也是竭尽全力的。抗日胜利前后，在他任龙仙镇镇长期间，尽自己可能，把共产党

员安插在龙仙镇公所的各个要害部位，如中共党员黎士权（黎明起），经他推荐安排作自己的副手，担任龙仙镇副镇长，其他如龙仙镇成立抗日自卫中队，他亲自担任中队长，副中队长安排中共党员陈冠元担任，中队指导员安排中共党员刘克洪担任，户籍干事也安排中共党员阮新俊担任。抗日胜利后，他辞去龙仙镇长职务，担任南浦中学校长。在他辞去龙仙镇长之前，竭力进行活动和推荐中共党员官世爵（官平）为镇长，黎士权继续为副镇长，陈冠元和进步青年黄社祯分别为镇队副，掌握镇公所的全部武装（按：这个镇自卫中队的全部武装，1947年下半年，以起义为名，已由官平、陈冠元、黄社祯等率领全部进入游击区，参加了北江第一支队）。

抗日期间，陈发元先生主持公正，不畏强权，还有一事值得一提的是：约是1944年三四月间，有一次，国民党部的工兵团调防路经龙仙，突然向龙仙镇公所提出强派增加一批军粮要求，陈发元了解，这是公开明要的一笔额外勒索，因此他坚决抵制，并严词加以驳斥。这一来，国民党部队恼羞成怒，立即派出武装把龙仙镇公所紧紧包围起来，企图恐吓镇公所屈从。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为了不致吃亏，陈发元巧妙地一面让副镇长黎士权与工兵团周旋，一面则亲自率陈冠元、阮新俊等从镇公所后门潜出，在龙仙大街上鸣锣敲鼓，发动赴街群众，共同抵制国民党军的无理要求。街上群众明白缘由之后，愤怒填胸，立即汇集起成千之众，手持木棍、大刀、土枪、扁担，反把国民党军派来的武装团团包围起来。国民党工兵团见势头不对，才被迫不得不狼狈撤走。

1947年春开始，陈发元转入南浦中学担任校长，在此期间，正处由国民党单方撕毁协定，国共两党破裂，全面内战转入高潮的严峻时刻，陈发元先生仍毫无畏惧地一如既往信

赖中共翁东地下组织——通过当时翁东地党关系（按：可能是通过刘初鹏、刘克洪或黎士权等人的关系）介绍认识中共党员廖拔成（按：廖系由邬强部北江人民抗日支队转入地方的中共党员，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在南浦中学任教），由陈委托廖推荐聘用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唐若愚（唐庚）、邬彼得、马义杰（马旅）、陈持平、李雪松等为教师。陈发元以这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为骨干，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南浦中学这段期间还是办得很有朝气，并且培育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其中不少一部份青年学生，于1947年下半年后，还先后陆续进入游击区，直接参加了革命武装斗争，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由于长期坚持进步，坚持与共产党人合作，陈发元先生的行动，已被国民党政府逐步觉察，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翁源县长官家骥曾先后数次派武装包围他的住宅，企图将他逮捕和杀害。在他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由当时北江第一支队派出武装营救接应，陈发元先生才免于难。并于1949年8月，携儿女（陈丽园、陈志超）一起安全撤入游击区，直接和共产党人参加了解放战争。

解放以后，陈发元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后还担任翁源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不幸的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于1952年5月，土地改革期间，以“莫须有”罪名将他处决。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加上过去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曾在翁源工作过的中共地下组织许多老前辈的反复过问，陈发元先生蒙受三十多年的冤案，终于1982年初宣告平反昭雪，恢复他的名誉。四十年代曾长期与陈发元先生合作共事的原中共翁东区委负责人、现在外地工作的刘克洪喜闻先生平反，欣喜之余，感慨万千，作《鹧鸪

天》词一首寄回翁源。词中“山巍巍，地茫茫，凡间六月长飞霜、人间毕竟有马列，寒流驱散来晚香”等句，深切抒发了翁源老一代共产党员悲喜交集的情怀，也寄托了他们对自己诤友无限的悼念和哀思。

整理者按：这篇有关陈发元生平的材料，是根据翁源陈心镜、黄社祯、陈志超等作者的来稿，结合我本人当年在翁源地党一起参加活动所知的一些情况，加以综合整理的。但因年限相隔久远，加以我本人所知局限很大，这一材料，还很不全面，不少地方也很可能有错误。为保留历史的真实，还请了解情况的前辈及其他同志补正。另文内括号均系我加上的。

刘 平 整理

新旧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并于10月10日签署了“双十协定”。根据这一协定，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包括国共两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等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和平建国等问题，制定了有利和平民主的五项协议。这次会议达成的协议很快被蒋介石撕毁了。这次协商会议，人们称它为旧政协。

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有662名委员的代表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解放军、各界人士等45个单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人民政协组织法等。人们把这次协商会议以后的政协会议，称之为新政协。（文蔚）

包三易先生生平简介

何 刚

包三易先生又名权鉴，1907年出生于翁源县坝仔镇镇背包屋一个书香之家，从幼年时代就勤奋好学。在翁源县中学求学时，由于品学兼优在学生中颇具威望。是县学联骨干之一，曾在翁源县学联出版的刊物《不倒翁》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和诗歌，随后他考入国立中山大学就读，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三易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颇为爱好，对英语也很有研究，曾翻译有《欧美十人集》等一些译作。包三易先生早期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转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为革命和策动始兴县国民党县长饶纪绵起义作出过贡献。

一、热心办学，精心育人

三易先生在广东中山大学毕业后，曾在广州市培正中学任教。抗日战争期间曾到四川成都市工作。战后，从成都返回广东。1946年8月至1947年7月在家乡翁源任翁北中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翁源县立二中（现尚同中学）校长。1950年7月调粤北专署任秘书处秘书，土改期间参加佛冈县土地改革。土改结束，1952年起先后在韶关师范、始兴中学、和

北江中学等校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0年病卒于韶关。

三易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中，值得一提的是，抗战后，他回家乡任翁源翁北中学校长时，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做了一定的工作。

三易先生任职翁北中学时，曾决心改革图新的尝试。除聘请许多进步教师来学校任教外，还提出课堂与课外结合的方针，除课堂内进行教育，还重视学生课外的学习，如课外组织各种读书小组、美术小组、书法小组、科技活动小组，把学校办得很有生气。为了创造学校的优美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他提出劳动建校开河引水，把从学校对面流过的河水，引到流经学校门前。他亲自带领全校师生按班级顺序各班每周劳动一个下午，开凿新河道。半年后清澈的河水从学校门前吱吱流过，河道两边两旁柳树成行，河流深潭处建了一个天然游泳池，供师生游泳、洗澡，他亦常常去游泳健身。既方便了师生生活用水，又使学校山环水绕，环境美化。

二、以笔代枪抨击旧社会

三易先生爱好诗歌和文艺创作，常用诗歌抨击旧世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腐败。他一生写了许多诗歌和文章，也翻译过一些外国著作。可惜大都失存，仅在广州中山图书馆珍藏一本1949年出版的《翁声复刊》中发表了他的部份诗作。他的长篇诗作《春》，在他任翁北中学校长时曾出版单行本，全校师生人手一册。开头几句是“春！可爱的春，你是人类的救主，你是万物之神。人类为你欢呼，歌唱……”作者把

解放前旧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民不聊生，饥寒交迫，喻之为政治上的寒冬腊月。把人民盼望解放新中国的到来喻为政治上的春天，象万物期望着春天到来一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三易先生从四川成都返南京回广东途中，经过许多乡村、城市，看到祖国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蹂躏，到处呈现凄凉荒芜惨境，许多同胞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昔日繁华之地都已成为废圩。在南归途中，百感交集，并赋诗数首。诗中曾吟有：“国事螭蟾悲战火，疮痕满目吊灾民，富贵锦衣非吾愿，清风两袖伴归人。”以及“百世深仇今日报，万民欢舞凯门开”等句，由此可见三易先生爱国爱民的无限激情。

三、为民主求解放参加革命

三易先生为人正直清廉，道德高尚，追求民主，热爱祖国，目睹旧社会的黑暗腐败，贪官污吏，敲诈勒索，鱼肉乡民，深恶痛绝。他任翁北中学校长期期间，既重视智育抓好教学工作，又重视品德教育，培养一代新人。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师生们痛恨旧社会为民主求解放的认识不断提高。1947年6月间，翁北中学第三届毕业班举行毕业典礼，晚上开文娱晚会，由学生会组织演出话剧《满城风雨》。该剧内容是揭发国民党政府和联防大队官员的贪污腐败，敲诈勒索罪行。这一来，就大大激怒了当时参加毕业典礼的翁北联防大队长吴越南，他当场拔枪威胁，并命几十名联防大队队员荷枪实弹把学校包围起来，捉拿导演骆伯超老师。事后还强令学校从松塘搬到坝仔镇（联防队驻地），把学校置于联防

大队监视之下。三易先生对此表示极大愤怒，毅然辞去了校长职务，并即离家乡到广州、香港等地。在这期间他参加了进步组织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4月间接受广东省民盟组织的委托回到翁源，策动茶园乡乡长包绍曦携械起义，他也与刘文州等人一起参加了游击队。随后，又继续策动国民党始兴县县长饶纪绵率部起义，三易先生与饶纪绵是中山大学的同窗好友，有深厚的同学感情。经三易先生动员劝说，饶很快就同意弃暗投明，并即率部全部起义。在组织起义过程中，饶部原有个姓叶的连长，极力反对，并拔枪威胁，幸被饶的警卫及时警觉，当即缴了叶的手枪，致使始兴县得到和平解放，未遭任何损失。

人民政协会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图案是1949年7月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制定通过的。

会徽顶上的红星表示无产阶级领导；会徽环绕的齿轮、嘉禾表示工农联盟为基础；四面红旗表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大联合；地图表示新中国，背景光芒四射，表示祖国的欣欣向荣。以上是原设计者设计时体现出筹备会制订会徽的指导思想。该图案是张仃、周令钊设计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资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但会徽仍体现出更广泛的大团结的精神。（江军）

连县起义前夕

黄 振

1947年10月，连江支队司令部组织了两批干部学习班，主要学习党中央有关发展大好形势，使武装起义到处冒烟，各地党组织扩大武装力量，打击敌人等指示精神，那时我在广宁县大朗参加第一批学习还未结束，支队长冯石生和蔡雄等领导就向我交代任务说：“组织决定派你到连县协助那里的地下党，在武装起义队伍作参谋工作，并着重给我说：任务很艰巨，无论在语言、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等方面，都是你开展工作的首要困难。你要谦虚谨慎，服从领导，专心学习，注意团结，当好参谋”。并给我讲述了连县的军事战略地位，地理条件，连县人民的革命光荣传统等一些情况。

连县地处广东、湖南、广西三省的交界，地势险要，可控制通往桂东、湘南要道，历来是军事战略要地。从军事观点来说，连县当时是敌人统治较为薄弱的地区。它有连绵不断的山脉，真是山连山，山上有山，有黄洞山、天光山、西山等山脉和湘南各县连接，地势非常险要。但这些边界区敌人无法顾及，形成三不管的地带。队伍可进可退，有广阔的回旋地区，极其有利将连阳四属连成一片；同时，这些地区的人民，对国民党的“三征”政策，深恶痛绝，因此以连县为中心，对开展武装斗争，发展武装力量，建立游击根据地，

打击敌人，迎接粤、湘、桂解放，均具有很有利的条件。

连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30年代初红军进入连县时，连县人民就拥护红军，并积极参加支前工作，有的还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连县人民在中共党的领导下，采取各种形式，积极组织，宣传抗日，如组织救亡剧社、抗日青年同盟、少年抗日工作队等。以后，中大、文理学院附中、广州女师等学校迁往连县。广州沦陷，我们地下党组织又占领这些学校，以此作抗日宣传阵地，对反对倒退，发展进步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二天，我跟着连县地党派来的何文巨同志一齐上路。我们化装成商人，从广宁赤坑出发，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到达清远银盏坳再坐火车到坪石，后乘汽车到星子圩黄孟沾同志家。黄非常热情地对我说：为了适应此地情况，便于行动，要我换换装，并已为我准备好了全套学生装，将我打扮得象是一个连中的学生。我吃住均在黄的家里，为了不随便露面，我在黄家的一间小阁楼里生活，每餐由黄的佣人（实际是交通员）梁丁光同志给我送茶送饭。黄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在家里常常向朋友和亲戚同学说自己回乡是准备结婚和做些生意。这时间，他很忙，白天应付来访的各界人事，了解他们对时局的态度；夜间和党内同志研究和筹备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此外，他还要做大量的学运工作，因为他曾在广州负责从事几所私立学校的学运和学生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曾将一些学生的来信给我看，有的信中说：“你是我的启蒙导师，你的言行，我要很好地学习！”有的表示“要和狂风搏斗”，“不在黑暗中徘徊，要冲出去！”有的说：“我要奋斗，我要自由！”都表露出他们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满，要爱国，要光明。

黄孟沾于1938年就参加了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抗日少年工作队，下乡宣传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参加了共产党，迎着艰险的工作环境积极开展活动。他不计较个人的安危，遵守党的纪律。那时，党的活动费用，均来源于党员的支助，而黄早在学生时代，便以各种借口每月向家里要几担谷交给党组织作活动费用。他愉快地接受党的指示，回连县搞武装起义，发展武装力量，扩大粤湘桂游击区，以配合大军南下解放广东。黄在1947年8月间回到连县星子墟家里，为了顺利地展开起义前的各项工作，他以种种办法，说服父母，卖了四十多亩地和一间铺，作为购买枪枝弹药等军用物资。他这种为革命倾家荡产全心全意地投身革命的精神，使一些有经济来源的党员和进步青年，也为之感动，纷纷以各种名义卖田、卖耕牛、卖屋等，共筹建近两千余担稻谷，购买武器、弹药。

东陂区的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起义前和星子同志一样，拿出一些财物，支持武装起义。如朱合乡的小学教师等节衣缩食，每月的工资中除留下伙食费外，全部交给组织，作为起义的费用。他们这种为革命事业，不顾家人的反对，不畏惧，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随时都有被抓、被杀可能的危险，不怕家人受株连的崇高品德……何等使人钦敬！

黄孟沾同志为了使我进一步了解和熟识一些情况，后来还指派张乡文同志给我安排到附近山庄活动，并介绍从星子到东陂沿途村庄情况，使我进一步了解到一些农民常年累月，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生活，非常渴望共产党解放军能早日解放自己的家乡。

据黄孟沾同志的介绍：连县的武装起义前，县委为了便

于统一指挥和及时处理各种情况，先成立了全县的武装起义委员会（简称武委会），由张彬、黄孟沾、肖少麟组成，张彬为书记。分东陂、星子两个区先筹备起义工作。星子武委会由黄孟沾、张乡文、成遂满、成来凤四人组成，黄孟沾为书记；东陂区武委会由肖少麟、吴立贵、吴循儒三人组成，肖少麟为书记。

我被派去东陂，协助肖少麟作些参谋工作。肖详细介绍东陂的敌我友及地理条件后，带我到邱士惠的学校和大风洞冬防队等实地了解情况。这时，东陂也和星子一样，对武装起义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群众情绪高涨，人员和武器来源方面与星子有所不同的是，计划起义的点有四个乡，其中支部书记黎秀宝系朱合乡的乡长，吴体志（地下党员）是建新乡乡长。夏湟、建新、朱合各乡的自卫队及公尝的武器，均由我地党掌握。吴文华、黄标、吴年、黄辉、邱士惠及大风洞的叶积存等同志，均直接或间接掌握这些武装。只要一声令下，即能迅速集中。而星子的武器来源，主要靠购买、靠向各自有枪的家人要、靠向公尝或敌人夺取。星子起义后，计划用武装夺取潭源、田家铺上、东十等四个乡的自卫队武器。东陂还筹款做了三百件棉衣，秘密地放在大富头村，作为起义队的寒衣。

我到一个小庄的小学找到邱士惠同志。他是以教师职业来掩护自己的身份。那时，他正在埋头绘制东陂各村落要点的通道、地形的地图，趁这机会，又给我介绍东陂各地发展青年民主同盟组织以及参加在武装起义前，他们宣传，抵制国民党的三征政策的情况。（星子区同样是这样做的）

为实地了解东陂的地形和敌人的情况，邱士惠在一个早上还带我到东陂茶楼饮早茶，叫我亲眼看看关以忠（东陂反

动头子)的真面目。果然，我们刚坐下不久，他带着四、五名打手一同进来，坐在我们旁边的茶桌上，一直不停地指手划脚地对着他的打手说教。我当时不懂他的土话，问邱，才知他满嘴说的是反共救国，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言论。

由叶积存带我到夏湟、清水、石马等地，那里的同志和基本群众，对我们非常热情，对起义的信心很足。在大风洞和冬防队驻地，他们拿出枪枝弹药和新买回来的冲锋枪给我看，计划配备300—400支枪。准备工作，做得很有条理。我看到他们那样的有信心，对共产党是那样的信赖，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自我牺牲的精神，此情此景，永远使我不能忘怀！

我参加丰阳武装起义的回忆

吴 辉

丰阳地区，即解放前的东陂上三乡（建新，朱合，夏滢）。我因家贫穷，1947年还未满十四岁，在丰阳十三兄弟处（俗称十三友）做工。所谓十三友即十三人结拜为兄弟。其中有几个人确是为地主所利用，他们掌握了地主武装；但其中也有几个是中共地下党员。如吴体志、吴道荐，并分别担任国民党建新乡长、保长职务。为了有利掌握武装力量，中共地下党有目的地让一些党员与国民党乡、保长，饮血酒结拜兄弟，合共十三人，俗称十三友。

1947年旧历十二月初五夜，十三兄弟中有人叫我跟着他们走！我徒手在黑夜里跟着，他们每人都拿着枪，背上行李，打着电筒。后有人拿来传单、标语，叫我去张贴。此时，他们告诉我这是起义。说实话，我当时对起义的实质是没有认识的，总以为它就是“劫富救贫”。因我是贫苦之人，我就乐意积极去完成这一任务。在黑夜里看不清传单和标语写的什么（加上我不大识字），只有快手快脚在村里主要巷道张贴。贴完后，我很快跟上了十三兄弟们，向建新乡公所集队。黑夜中和乡公所的起义人员一起经沙铺，到达现三水乡的云雾洞，去“劫富救贫”了。

经过沙铺村时，由我们起义部队宣布处决了一个人，我

市中医秘方验方集锦三辑》、《韶关市中医院经验交流集》，可见一斑。自1935年起，他即被选为历届韶关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解放后，于1950年被选为曲江县医联会副主任。1952年起担任历届韶关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并被选为省卫协委员。

李先生不但医术精湛，还具有高尚的医德。抗日战争期间的1939年六、七月间，韶关市区霍乱流行。省政府虽强迫施行预防注射疫苗一万多人，但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在这传染病流行之际，李先生不顾一切，夜以继日地投入治疗霍乱。他运用古方治疗霍乱病时，分为二大类型：即热霍、寒霍。热霍用蚕矢汤、连朴饮、寒霍用五苓散、理中汤，疗效卓著，求医者益众。对那些确实贫困群众，他不但免费诊病，而且还经常为病人赠钱购药治病，恤民救灾。他常对其学生弟子说：“做医生如果没有仁爱为怀，济世救人的品德，是不能从医的，即是从医也是无学、无术、无德，唯利是图，草菅人命，根本不可能有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解放前，韶关由于卫生环境差，疟疾流行。他针对这种情况，苦心研究，首创自制治疗疟疾的蜀漆常山苗研末为丸内服，疗效颇佳。他治疗哮喘病，善于用小青龙汤加减以定喘，并创制砒麻丸及鱼蚕粉以截哮喘，以紫河固本治疗。并尝以桂枝人参汤加减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动过缓等症，都有一番独到之处。他不但善于应用方药，尤着重辨证，对其门生常说：“识药不识证，十医九不应；识证不识药，十医九不着”。

李仁溥先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勇于进取和接受党组织对他的考验，早在1954年和1959年先后两次

积极参加党的知识学习班，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1959年就决心加入共产党，为革命事业贡献一生力量并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后来还多次申请，并经常向组织汇报思想情况，并反复表示批准与否仍努力工作，从不气馁。他说：“我只向往一个党（中国共产党），如够条件就加入共产党，不够条件就做民主人士。”他处处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光明磊落，廉洁奉公。

带头组织联诊所

1953年，李任韶关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期间，出席广东省卫生工作会议，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有所提高，明确了方向。会后，他放弃个人利益，于1953年4月，带头在韶关市组织起健群联合诊所，并任所长。健群联合诊所的建立，是当时粤北地区最早的联合诊所，它不但带动了整个粤北，还被推广到广州市。1958年，他又放弃个人优厚的经济收入，在韶关市带头组织起大联合诊所，任所主任。在所内首次采取了固定工资。1959年，李老为培养中医人材建设育才基地，在不花国家一分钱的前提下，依靠集体力量、自筹资金、因陋就简，克服各种重重困难，办起了韶关市中医学校，他兼任校长，自编教材，亲自授课。该校先后举办了中医针灸班、中医正骨班、西医学习中医班、中医培训班，共培养出了二百多名中医人材，直至1967年撤销为止。

1962年，国民经济还处于困难时期，李老带领广大医务人员，顶住社会上各种歪风，向贪污、盗窃、搞地下诊所牟取暴利、走江湖行医欺骗群众、非法打胎医疗道德败坏等违法乱纪的错误思想行为作斗争，爱护集体利益。为发展韶关

箩挑桶，上楼取谷装油。大队长肖怀德亲自入屋指挥，由吴运汉等过秤登记收款。恰好没收完毕，夏湟方面反动军队又攻来，起义部队随即撤离。

在攻打上卢寺粮仓时，躲在夏湟村内的敌便衣警探队长胡斌，爬墙而出向国民党县府汇报，被我夏湟区拦截处决。我们没收地主吴金养财物时，有吴年、吴天月来报告说，军统特务的哥哥吴先汉（绰号泼冷水）在屋顶晒楼监视我军行动。当即，肖少麟同志下令将其逮捕，随军押去里茶山，经审讯、证实其罪确凿后，以大队长肖怀德名义，张贴布告，列其罪行，当即处决。后来大队部，建新，朱合两个区队返回云雾洞一带活动，夏湟区队到黄洞山活动。

我们起义，不但震动了连县，也使省里瞩目。反动政府对我们又恨又惊。他们一边加紧“进剿”，一边进行诱降和胁迫战士家属入山瓦解军心。他们主要向云雾洞方面进剿，并悬红生擒肖怀德者赏谷一百担，黄标，吴年，吴体志，叶积存等各五十担；对黄洞山方面，由敌之中队长黄传令亲带几个地方人士劝降。这样，黄钦怡区队长经不起敌人的花言油舌，拉队回乡自首了。这大大扰乱了军心，加上农历年关在即，不少战士思家。在这情况下，经领导研究决定，除主要干部撤离连县外，其它同志回家潜伏，分散掩蔽，保持力量，以待时机。我因家贫、无牵无挂，年纪又小，反动派不注意，决不向其自首，紧跟共产党，在家筹措了款，跑去广州找到中共地党联络员吴道其同志，经介绍又参加到苏陶领导的部队任手枪班战士、班长。1948年6月间挺进连县时，调肖怀义部队当其警卫员。在两次战斗中，我光荣带红受伤，评为二等残废军人，后转地方工作，现已办了离休。

战斗在粤赣湘边的卫生人员

麦 雅 贞

1945年8月中旬，我随东江纵队司令部卫生处从博罗经龙门北上。当时由东纵副司令员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珠纵司令员林锵云组成指挥部，率领第五支队武装和部分司政机关干部及干校学员共一千二百多人，挺进粤北，准备与延安南下的“两王”部队（王震、王首道的简称）会师，在粤、赣、湘三省边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后因情况变化，日本投降，“两王”部队到达南雄百顺后，又奉命北返，会师未成，东纵就地留在粤北开展武装斗争。那时卫生处长兼医生是江枫，指导员是陈曙光，另有曾炎、麦雅贞、叶娟等医生和卫生人员。第五支队有卫生队长叶雁如、医生吴影子、金帆，各连队设有卫生员。北上时，正是盛夏天气，晴雨无常。由于一温一湿，许多同志发冷发热，烂脚的不少。当部队到达始兴下北山宝丰村休息时，又有一批同志不能随部队行动了，因部队仍要继续向南雄帽子峰方向前进，不得不留下三十多名伤病员在宝丰隐蔽治疗，决定由曾炎医生和我负责。

我们把留下的病员，迅速转移到离村五、六里路的大山坑里。那里有一间破纸厂，是一个很久没有人住的地方。这个破纸厂是泥砖砌的，墙已半塌，墙根下死水一潭，还有些死人枯骨，散发出一股奇臭的气味。靠东墙边有一条小水坑，

长着青苔和杂草，厂房内中间有一条十米多长烘纸的泥灶，整个纸厂约有三十多平方。我们把纸厂打扫干净，铺上杂草，作为病员的床铺。为了防止敌人搜山，决定每天天亮前离开纸厂到较远的山坑里隐蔽。那时没有手表，不知时间，只望天光星来分析时刻。在天亮前煮好粥，让病员吃了才去掩蔽。那时的病员常常发高烧，药物又非常缺乏，粮食得不到供给，还要应付国民党军队的搜山追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面前，对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怎么办？没有药，我们就发动大家在荒山野岭采集中草药，用草药给伤员们治病，如清热退火解毒，用淡竹叶、金银花、岗梅根、三亚苦、鱼腥草、金钱草、野菊花；活血止血用血见愁、仙鹤草、元宝草；止内外伤痛用鹅掌藤、两面针、九里香；除湿利尿、腹痛泻痢用车前草、凤尾草、地胆头、马齿苋等等。这些草药在临床应用中虽比不上西药打针见效快，但在当时的环境，是医治我们革命战士的重要药物。没有粮食，就组织轻病员晚上秘密地到村里去向群众采购。到大村怕暴露，小村粮食又不多，只能买少量的红薯、四季豆和大米。买回来后把大米红薯一起煮粥，让伤病员吃饭，剩下的医务人员才吃。伤病员知道后很受感动，以后吃粥时，一定要与医务人员一起吃，否则他们也不吃了。

在宝丰掩蔽大约有五、六天。跟着，留在风度大队工作的叶镜大队长和短枪队员罗志文找到了我们，告诉部队北上时，离这里三十里路的奇心洞，尚留下一批不能走的病员，后被国民党军队发现，遭到杀害，牺牲二、三十人。

斗争的残酷，对每个人都是一个考验，奇心洞事件把一个医生吓坏了，没几天，他带着钱和一些贵重药品人参，说是去联系部队，而实际是逃跑了。我见他没有回来，怕给敌

人发现，不敢在纸厂停留，不管白天黑夜，都在山上掩蔽。那时没有钱，粮食更加困难，就在山上挖野菜掺到米汤里当饭吃，因盐少，不敢多放，野菜粥又苦又涩，可是为了填饱肚子，只能这样。我们一共三十多个伤病员，除有几名重病的牺牲外，都安全度过难关。后司令部派邱特前来联系，才汇合了。不久，我又被调到第五支队任卫生队长兼医生。

1945年12月间，支队政委黄业派我到临时设在南雄大流坑的医务所。那里有二十多个伤病员，医生有吴影子。一次，敌人进山搜索，因事前我们已知道消息，便组织伤病员转到安全的树林中掩蔽。敌人搜索的当天，吴影子与一名女卫生员外出了解情况，却被敌人包围杀害了。受到这一损失后，医务所也立即转到江西省大余县河洞乡黄寮村，在后山盖起竹棚为临时医院。那里群众基础比较好，是过去陈毅、项英曾活动过的地方。

1946年1月间的一天，支队部通知说：江西国民党保安团要向这里搜山，要我们立即转移到广东的白云区方向，找个安全地方隐蔽。后来，医院转到支队部附近的小岭背村。

1946年6月，东纵在粤北的武装，奉令北撤山东烟台。留下二百多人，由黄业率领分散掩蔽在始兴、南雄、仁化等边界山区，坚持武装斗争。我被留下在领导机关负责卫生工作，同时留下的卫生人员有：曾松（男）、叶仕云、缪峰、黄月英、陈金英、李春（男，后改任副指导员），后又增加一些卫生人员，如李桂英、杨瑞英、李维清、柯彩凤等，她们都安排在分散掩蔽的医疗站。

1947年，我们留下在粤北的武装，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成立了粤、赣、湘边人民解放总队，下属四个支队。我们改编为北江第二支队。那时，南雄、始兴、仁化、曲江等地的

大批农村青年，踊跃参加了革命武装队伍。我们前后挑选了一部分女同志，经过短期培训或跟班学习后，分配到连队当卫生员。当时上级还派了朱依群医生和何平同志来加强部队的卫生工作。

随着队伍的发展，卫生队伍也壮大了。由原来的11人，发展到70多人。这些新参加人员，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有些还是童养媳或婢女。在革命队伍中，她们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在艰苦的环境下，能毫不动摇地战胜困难。如卫生员何平在连队一次夜行军中与敌人遭遇，因失去了联络，走了七天七夜找不到人村，就靠摘野果来维持生命。最后两天，因没有力气站不起来，就在地上爬行，双肘膝盖都磨损，多次昏厥。最后第七天，才给部队发现，把她及时救活。还有卫生员李维清，她只有十四岁，在一次战斗中给敌人抓去，敌营长看她年纪小，就给其老婆做勤务员。她看到了时机，利用敌人在江西大余的驻队（大余城外有我们武工队活动），乘机跑了出来。不久，碰上我们手枪队员，才把她带回部队。卫生员梁芬在一次夜间战斗中被一敌兵抓住外衣，她与敌人挣扎，机智地甩掉外衣，逃回部队。

我们医护人员，当时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一切为了伤病员。黑夜行军，主动替伤病员扛枪、背包袱、牵扶伤病员翻山头、涉溪水、过木桥。1948年下半年敌人进攻时，救护队长叶仕云带着一位女卫生员负责一批伤病员有廿多人，掩蔽在南雄油山地区的山上。那时敌人进行了严密封锁，一时搞不到粮食，他们就发动轻伤病员在山上摘野果、采野菜、挖竹笋、摸坑螺来充饥。夜晚天寒地冻，她们就把自己的毡子、被单盖在伤病员身上，而自己两人共盖一张被。1948年冬，朱依群医生和女卫生员张秀坤，在始兴的一次战斗中，见

刘绍民、林燕辉两同志受伤，他们没有担架，就用被单捆上两条竹杆做担架，把他们抢救回来。卫生员李祥香在南雄南亩战斗中，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人的枪弹在火线上几次把四位伤员抢救回来，把牺牲了的同志也背了回来。卫生员潘梅金在始兴的一次战斗中，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一位排长。他腹部受伤，肠子露出。潘梅金用碟子盖住伤员伤口，缠上绷带，背着他下火线。卫生员杨坚在医疗站护理伤员，发现敌情立即转移，她背着一位腿受伤不能走动的伤员，一口气走了十多华里才到达安全地方。

坚持粤、赣、湘边武装斗争的卫生人员，还有许多为革命不惜奉献个人一切和英勇牺牲的事例。如十八岁的共产党员柯彩凤。1948年夏季部队向江西崇义县挺进，她和另一位女卫生员带着三位伤员在义安乡的大山中掩蔽治疗，但被一叛徒带着保安队包围了，刚好这时部队派了温霖等两位武装人员送油粮来，便立即掩护伤员撤退。她在撤退时忘了拿挂在竹棚里的药袋，这就象战士丢了枪一样，她不顾安危，立即跑回去想拿回药袋，不幸给敌人发现了，与敌人搏斗，最后死在敌人刺刀下，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女卫生员张长莲，是南雄县人，她父亲是我们部队的副官，她参队才一年，因跟随部队在南雄横江坑上的龙凤庵宿营，被国民党部队包围，在战斗中被俘，敌人对她残酷的拷打和诱骗，她宁死不屈，最后给敌人杀害了。临死前，她给父亲张功尚写了一封遗书，交给同牢的人，信中写道：“我被反动派捉到坐牢房，你不要难过，请吃好茶饭，保重身体，做好工作，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把蒋介石和一切反动派打倒了，我死也甘心，你的爱女长莲。”她牺牲时年仅17岁。1948年夏天，敌人正在对我们游击区疯狂搜剿，在南雄帽子峰“张家口”的医务所，

有一位女同志正生下一对双胞胎，碰上敌人正在医务所附近搜山，她怕小孩哭声给敌人听到而影响其他伤病员的安全，捂住婴儿的口鼻，使孩子停止了呼吸……。1947年11月，我生了一女孩叶小雅，由于要跟随部队行动，不方便携带小孩，也忍痛把小孩送给老百姓抚养，当时送给老百姓抚养孩子的，还有缪峰、骆玉英、陈英等。我的小孩是送给仁化长江镇凌溪高坪村（原属南雄白云区）群众杨道德。1948年8、9月间，南雄国民党参议员兼百顺区长邬锡金率一个营和地方自卫武装对凌溪进行了洗劫，烧了数十间房子，抢了许多东西，威迫群众交出叶昌（我的爱人）的小孩，群众宁死不说。后给国民党保长周才富告密，邬锡金立即派人把杨道德夫妇抓来，要他带着锄头挖坑活埋小孩，向群众发出嚎叫：“我邬锡金要为钟怀德报仇，今天抓不到刘冠英（叶昌化名），将他小孩来代替，这是铲草除根。”（钟怀德是邬锡金的得力助手，为叶昌部队所消灭）杨道德夫妇宁死不干，最后叫他的走狗把小孩活埋了。解放后，凌溪的群众为了不忘过去革命斗争的残酷，为叶小雅立了一个小墓碑，作为教育儿童和青少年的教材。

我坚持战斗在粤北及湘、赣边，自1945年8月到1949年9月，经历了整整四年时间，斗争是残酷、严峻的，胜利来之不易，永远难以忘怀。

我在珠玑乡卫生所工作前后

朱 依 群

1945年8月12日（日本投降前天），我们在博罗县罗浮山下×村出发，10月初才到五岭帽子峰，住在一个叫石榴坑的地方。这里有座破烂茅棚，大树上刻有模糊而光辉夺目的字迹：“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据首长们说：这是红军时代，朱德总司令和陈毅同志在这里打游击时而搭下的茅棚，这是老红军亲手刻下的口号。

不久，我们和地下党联系上了，得知王震部队已回去东北接受日军投降。原追击王震部队的蒋军隆昌部队调转来追击我们了。当时敌情极为严重，而我们武装人员少，非武装人员太多，打起仗来尾巴长，食饭也有问题。当时部队党委通过决议，要求缩编部队，保存主力，暂时隐蔽休整。另一方面，把非武装人员能工作的，分到蒋管区搞地下工作，其他则疏散回农村生产。当时我被列为地下工作人员之一。

林鹗教育长对我说：你的情况最适合搞地下工作，组织决定派你去南雄。他又向我交代任务：一、以医生为名，团结群众，进一步帮助地下党去组织群众；二、利用上层团结下层，使贫下中农团结在我们周围，做到能把我们伤病员隐蔽在贫下中农家里治疗；三、如果安排在乡公所，就要帮助乡公所树立威信。我坚决地接受了任务。

一次，敌人来了。指战员马上集合抢登山头迎战。领导指示我带领伤病员向北方向走，其中有我的儿子民仔。赖卫生员跟着队伍战斗。前线打起来了。那时我们的目的不是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找寻王震部队而边打边撤的。但情况很急，病人走不动，我把他们的包袱都拿到自己身上，好让他们快走。民仔也走不动，我抢他的包袱，他不给，反而要抢我身上的包袱。他说：“妈，你身上太重了，给些我，好让你带同志们快走，我不要紧，万一敌人来了，我就躲在森林里，以后我会找部队。”当时情况紧急，只鼓励孩子赶上来。大家到了其深洞，孩子晕了过去。在紧急的情况下，领导决定把走不动的伤病员隐蔽在洞内，经检查后，大约有五、六十人要留下来，其中有我的孩子民仔。

1945年10月9日，不幸消息传来。隐蔽在深洞的几十名手无寸铁的伤病员，被反动派包围，全部牺牲了，其中也有自己的民仔，我听了，真是悲痛欲绝。

早些时，我军在始兴某地检查病号，已发现有五、六名病号都是患疟疾的，我的儿子民仔也在内。当时只有三支见连针，我叫赖卫生员给陈生等病号注射。赖说民仔的病重，体温40度多，给他一支。我说他是我的儿子，是个小孩，其他同志是党员干部。论病情给他一支是对的。再想一想，我是共产党员，又是一个负责人呀！如果放弃别的伤员治疗而给自己的儿子，未免太自私……后来，民仔就给见连片服食便了。没有料到，他带着重病也遭到敌人的杀害！作为医生母亲，我多么痛恨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我内心是很难过的。但到敌人统治区去工作的人，只有抹干眼泪，挺起胸膛，跟着地下党其他同志们握手而别。同行的还有何平（是王作尧的小姨），走了一整夜才离开原始森林到了山口，这时天已亮

了。我们到了平原，远远传来炮竹声，原来今天是国民党庆祝“双十节”。当我们到了南雄××村，天色已黑。陈仲夫同志在一个碉堡旁屋子前推门，有一个年约三十的青年出来开门，这位青年亲切地同我握手说：“老宗，你好，好久不见了。”我也装得很熟识地说：“老同学，我来打扰你了。”他领我们进屋向其他人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同学。她是从香港逃难到‘三南’前几天听到同学讲起，因此写信叫她来。朱同学是个医生，在中大时，她读医科，我读文科。请她来，将在我珠玑乡行医呀！老宗！你要为我们闭塞的乡民出点气力呀。”我点头算作答复。

这个青年叫朱德美，是个大学生，担任珠玑乡副乡长，思想进步，是共产党培养对象。他家有父母兄弟妻子，安排我们住在碉堡三楼，他和妻子住楼下。

徐道昌是珠玑乡乡长，是中共南雄县委派去的。徐和我们三人一直上三楼住处商量工作。徐说：准备安排我去南雄医院当医生。当时我提出了不能去，因恶霸地主参议员郭百全住在城里，游击队打过他家，把他的家属捉上山，我又曾给他们治过病，他们会认得我。最后决定留在珠玑乡搞个医务所。

有一个晚上，陈仲夫带来个喜讯，他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条，里面说：“朱医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民儿从敌人刺刀下脱险回来，该孩子真勇敢，详情由仲夫同志面说，民儿留在我身边，你放心，以后有机会让孩子和你见面。王作尧”

几天后，徐道昌又来了，他说我的工作已和地下党商量决定，在珠玑乡公所成立医务所。徐道昌乡长和朱德美副乡长在乡公所向大众介绍说：我是他们在中山大学的同学，是个大名鼎鼎的医生，又是富家出身的香港大小姐，香港沦陷

后，逃难到此，就这样大家叫我大小姐。我假说我家在香港，父亲系香港富商，汇丰、渣打两银行的董事。电车、汽车、大酒店都有股份。有两个母亲。大妈生我和三个哥哥。二妈生四个弟弟和近身的妹妹（指何平）。大哥，二哥留在美、英。我改名朱惠英，何平改名惠平。从此大小姐、二小姐的名在珠玑乡传开了。

乡公所搞户口的及珠玑中学有几位老师都是部队安排进去的，后来我又兼任珠玑中学校医。其他乡公所的人员都是本地人，由徐道昌挑选过来的。只有一位姓程的，是县政府派来的地地道道的国民党特务情报员。

珠玑乡的农民封建迷信很严重，有病不信医生，只信菩萨鬼神，有的找了庸医，治个病要几担谷，认为医得好是“天命”，医不好人财两空，对医生开药，不大信任。为了打开工作局面，我首先打响第一炮，就是医治好了一位患了十多年下肢溃烂的梅毒症。我同她注射一支914后，马上见效，浓水有所收敛；注射第二支，不但干浓而溃疡面缩小了，加上天天换药，后再买几支注射，不到一个月，新皮微长了，只留下五六寸长的疤痕。这一炮，震动了全南雄。说我是香港来的一位神医，为珠玑乡造福不少等等。这位病者的丈夫是个乡绅，参议员。她激动地说：“朱医生，你救了我，烂脚十多年，钱花很多治不好，人家讲我麻风婆，不敢接近我，你的恩情不知如何报答，如你不嫌弃，做我的干女吧。当时我婉言谢之。但她常叫我做妹子，把女儿叫我做姐姐。有了这棵“大树”，我的工作好做了，局面开始打开了。

接着又打响第二炮。邓××的妻子生孩子，几天生不下来，找了我，经检查是横产，马上给她施手术，接下一个小胖子，母子平安，邓×的祖母把我当神捧。从此，我成为她

的保健医生，尽管大病小病，一看食药就好。

接着，我的名声传遍全南雄。脚跟扎得牢牢的。这位徐乡长召开保长会也多了，捐献也多了，医务所经费不成问题了，农民纷纷前来求医。当时徐乡长意见，群众看病基本不收药费，有钱的献捐，贫穷的免收。所以农民说乡公所是为穷人的，不是压迫穷人的。事实也是这样，外表是国民党政权，实际是共产党政权。

乡公所的威信树立起来后，我和何平也成了个大忙人了。上至乌石下至承福远至县城都有人来求医，那些客栈，也日渐兴旺起来了。

组织给我的任务，没想到进展得那么快。贫下中农都团结在我们周围，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常常把我们的伤病员藏在他们家里由我去治疗。有一次，一个农民来找我去看病，并偷偷地塞一纸条（地党写的）给我，我跟他去到一个小山丘一间草屋里，里面钻出一个伤员，我一直给他治疗到归队。从此，我的工作上午在卫生所，下午去农村为农民治病，也是为我们同志治病，趁机又去承福乡和地党领导人会面。地下党负责人是李金，常和我联系的是李金和刘大姐。

有一天，刘大姐来卫生所交张纸条给我，叫我去承福乡看病。当我看到纸条的字迹是林鹞教育长（东江纵队军官学校）写的，我猜疑他去香港路过南雄。我满怀高兴跟刘大姐去，到了承福乡，一见果然是他。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陈同志，她的头面肿得可怕。原来他夫妇从部队出来，一是去香港，二是叫我治病。她的病，一个星期治疗痊愈了。林教育长对我的评价和表扬，给我无限鼓舞。他说：党给你的任务基本完成，还必须完成得更好。但你要警惕，因为你做得很出色，而且太红了，敌人决不会放过你，他们已开始钉住你了，你千万不要麻痹，要加强警惕性。

1946年春，珠矶乡天花流行，乡民十分惊慌，又说：

“这是孩子的生死关，能度过这个关头才成人。”可是这关不容易过，死亡率很高，乡人花十担八担谷子请庸医、神婆也无法制止天花传播，甚至日甚一日。

当时我和徐乡长商量，马上进行宣传种牛痘可免出天花，同时实行普及种牛痘，减少孩子的死亡。徐道昌亲自到县城里买痘苗，领我和何平下乡下村去种。当地乡人不信种牛痘，不敢抱孩子去种，后来，我们选择一个发病情况严重的村子，并拿自己作示范，还动员在村中稍有知识的李树华全家种。果然，他家平安无事。没种的已死掉两个人。群众相信了，于是全村接种免疫。由于现实的教育，附近乡村拖男带女摆起长龙来乡公所种痘。经过这场苦战，天花流行逐渐缩小到被扑灭，大家都安心了。

但在我们身边的程××却显出一副异常的面孔。当我们初到乡公所时，他对我们的来历就半信半疑，开始以同事关系接触，常到我们房间闲扯，偷偷地却开抽屉、翻办公箱、书本，甚至处方都抄。每晚都来，把我和何平都气坏了。但一直没发现我们有什么政治嫌疑的地方，以后又怀疑我们是不三不四的人。有一天，程对我说：“朱小姐，你技术能力那么强，为什么在乡公所屈居三四年，何不找间屋开业，以你的技术和威信，肯定是好生意。”我说哪里有钱？他马上拍拍胸口说：“钱，我程××有，只要朱小姐开口说要多少，有多少，屋也看准了，我领你去看看是否合适。”我笑笑说：“程先生真够慷慨，你每月有多少钱薪水呀？不是我看程先生，老实说，你的薪水不够我在香港时买化妆品。钱嘛，我家大把，光是我父亲的遗产我就花不完。我父亲在世前很乐于献捐慈善事业，每年捐出去的钱搞不清，我最重要是继承老人家慈善的心。我虽然每月赚三四斗米，但我为老百姓做了些好事，救了一些病人，我父亲在天之灵将会感到我是

他的好女儿。谢谢程先生的好意。”但他还不死心。有一天，何平不在，程蹑手蹑脚走进我房里，还动起手来。我火了，把他推开并掌他一耳光，叫他快滚。房里的吵闹声，外面人也听到了，徐道昌来了，把他推进办公室训了一顿。警告他以后不准到我房里。这一巴掌打中他的反动头脑，明白他面对的是什么人？后来他对蒋××同志说：大朱不是平凡的女人，是带着政治任务来的，我走江湖几十年，未见过这样的女人。

我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了，当出外看病就有人钉梢，影响去给伤病同志看病。本来我想去看伤病员的，发现了钉梢，不得不跑到别村熟识的农民家。据县城情报说，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想抓我和徐道昌。但县政府反对，认为没有证据不能抓人，她家在香港有钱有势，另方面她有群众基础，群众会反对的，因此他们就拚命来找证据。

有一天，敌人兵临城下，乡公所门外摆开三挺轻机，国民党营长带一个排冲入乡公所，到处搜查，特别是我和徐道昌乡长的房间，地下松砖墙壁破洞都查遍。幸好蒋××文书早报讯，徐即把地党送来的文件从后楼下挖出来交蒋从后门带走。敌人虽也挖到那里，但一无所获。他们狗急跳墙把徐带去问话，大约个把钟头，徐才回来乡公所。

六月间，地党送来王作尧司令的指示，肯定我的任务干得很出色，但据目前情况，认为我处境越来越危险，而部队快要离开此地，要我即去香港……与此同时，又收到从香港寄来一封奇怪的信，以我母亲的名字写来的。内容是：“亲爱的女儿，自你姐姐离港，家人无时不挂念你们。现在香港光复了。据查访你的同学、同行朋友说你们留在南雄珠玑乡，见字即复信，我就马上寄路费你们回港。母李氏字。”此信，可

能驻香港区党委写的。

收到信后,何平拿着在乡公所大厅蹦蹦跳跳大声地叫喊：“我妈妈来信了,我们快回香港了。”引起全所人员围着她看信。那位特务程××也看到了。消息马上传遍珠矶乡,引起全乡人都对我姐妹二人的关心。有不少农民商人,都来乡公所挽留并请吃饭。当时地党研究如我这时候走,会引起敌人趁机下毒手。趁老百姓挽留的盛情下暂时留下,先让何平回港,我在以后找机会大摇大摆地回去。大约八月间左右敌军调防,我就趁这机会回香港了。

我去香港后很快接上组织关系,并凭毕业证书由香港政府安排在长洲医院油麻地医局工作。

1947年×月×日,北二支政委张华、副司令员刘建华出现在我面前,我激动极了。说他们已向区党委提出把我调回北二支,将我的儿子安排在新华分社半工读。我听后高兴地说:我日以继夜的盼望,终于盼到了。孩子的安排我也放心,表示感谢组织的关怀,并要求把何平带回去,因她的亲姐姐没跟她丈夫(王作尧)去烟台,我这个假姐姐要照顾吧。首长点头同意。就这样,姐妹俩经过许多艰险才回到帽子峰。

当时司令部驻在长平乡。我到驻地时,正在召开干部会议,全场突然沸腾起来,政委张华、司令员黄业、副司令员刘建华和参加会议的同志,都从室内跑出来欢迎呼叫:“朱医生回来了!”有的开玩笑说香港大小姐、二小姐又回来了。

按当时战备工作所需要,上级指示要办一个短期卫生训练班,学员来自各队和新参军的男女同志及原隐蔽在山上的卫生员。这个班有30人左右。长平乡为培训班址,由我负责班务工作和司令部的卫生工作。

参加训练的卫生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选择教材极成

问题。既无参考书本，又无示范教具。我先从武装学员政治思想开始，然后进行卫生工作课程，包括内外科和药物。主要教会学员战场上救伤和在后方简单手术护理等。学员们边读边到部队现场实习。训练班结束后，学员回原单位配合战斗，分配各连队。在这艰苦的战争中，我们一直坚持到解放，而卫生员队伍，没有一个逃兵或叛变。

我国民主党派状况

我国有民主党派八个，到1988年底止，共有成员29.1万多人。其中民革3.8万多人，民盟8.1万多人，民建4万多人，民进4万人，农工3.5万人，致公党0.8万人，九三3.7万人，台盟1.2万人。

这些成员，半数近五年以来发展的。民主党派成员中，中、高级知识分子占75%以上；相当数量的人担任各级人大、政协、政府等部门的领导工作；有30%以上获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等各种荣誉表彰。

目前，除致公党和台盟分别在14和11个省、市、自治区有组织及其活动外，其余六个民主党派均在全国各地建有组织、进行各种活动。

（文蔚）

曲江卫生院医护人员迎解放

谢 恩 华

1949年，我市称为曲江县韶州镇。当时在东堤有一所曲江县卫生院（即今市一人民医院地址）。院里有两层楼房及平房各三座，留医病房称为“和霭楼”、“克威楼”，另有手术室、隔离病房、门诊及妇产科等。设备虽简陋，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们并没想到，这绿树婆娑、竹翠果香、只有40张病床、30多名职工的小小卫生院，却是革命的据点，是我市解放第一天就积极为解放军救死扶伤的地方，是解放后卫生工作的主要力量，也是我市最早命名为“人民医院”的单位。

1949年9月，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军不断向南推进。当时国民党谣言很吓人，群众对共产党不了解，不免人心惶惶，许多商人富户都设法外迁。卫生院职工工资微薄，大都穷得可怜，虽然不怕“共产”，但护士、助产士多是年纪轻轻的未婚姑娘，谁能不怕“共妻”？到10月初，职工已几乎走了一半。院长陈维廉针对我们几名骨干的特点，曾几次悄悄地对我说：“共产党一定会解放全中国的，你走也是白走，走到那里也是解放区！你聪明能干，如果留下为群众服务，前途大有可为！”他对陈佩文说：“我待你如女儿一样，我都留下来，你怕什么？”对钟雪英说：“你放心留下来工作

吧，有我吃的你就有！”当时院长在我们心中有崇高威望，我们几个人一商量，院长有技术、有眼光，还有许多儿女，他都不怕，我们怕什么？既然前途、工作、生活都解决，还愁什么？何况青年人都憧憬着新生活哩！我们串联了一些同事，决心留下来了。

中秋节快到了，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当时我负责妇产科工作，和我一起的张媛爱已离开。陈院长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把药物器械保管收藏好，并要准备消毒好一大批竹枝、棉球棉垫纱块等敷料。我那时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是听从院长吩咐，真正把药品敷料准备充足并保管收藏好。陈院长又有计划地把留下的人都作安排：除一些人分散在家待命外，我和陈佩文、钟雪英、李萍珍、谭林、杨仕桢等在风度路礼拜堂（即今群众艺术馆地址）楼上或吴超良医生家里；陈院长的夫人张丽芬已身怀六甲，即将分娩，就和曾瑛一起去河西循道医院住下，陈院长去北门雷仲平医生家；张宗如留在院里守门听电话；而陈志华、徐志鸿等人则带着些旧废药械伪装随国民党军政败退。

10月6日是农历中秋节，整个韶关却冷落得出奇，行人稀少，店铺关门。下午卫生院病房已全空，门诊也无人看病，职工各已离去。我与陈佩文还依依不舍地留恋在院宿舍里。傍晚，我们除下了平日穿的花旗袍，换上了特制的黑色“妹仔装”，准备离院。看见庭院里我心爱的花卉和甜橙、黄皮、沙田柚等果树，我们想到小说里描绘的乱兵烧杀、玉石俱焚的惨况，也会降临到韶关吗？明天，这里会变成怎样？我爬上树摘下两只甜柚，心想明天这些果子将荡然无存了，这时，陈院长惯例巡一次全院后出来见到我们，立即叮嘱我们快离院去指定地点暂避，不可乱跑，一定要听从命令。工友阿珍

姐拎着一锅鸡汤和一盒月饼，说是院长夫人特地为我们准备的，于是我们一起走出东堤。行不数十步，就听得南门轰然一声巨响，有人大叫是炸桥了，街上行人飞奔，我们也胆战心惊地跑到礼拜堂，打下地铺在前楼坐下，几个人紧张而又兴奋地议论着度过了这难忘的中秋之夜。

上夜一直是沉寂的，下半夜后听得些疏疏落落的枪声，街上只有些少人往来巡查，我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天未亮就偷偷到临街的窗子往下望，哎呀，街上已有那么多军人在行进，可是他们与我想象中大不相同。并不是整齐威武令人生畏的队伍，也不是盛气凌人大呼小叫的踢门掠物的霸王。这些军人风尘仆仆，军衫汗污，悄悄地行进着，却没对居民有任何打扰！这时街上并没有行人，但我相信家家小楼的窗户里、门缝中，都有千百双眼睛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些举世无双的英雄们。解放军就是以自己秋毫无犯的实际行动，一下子征服了老百姓的心。

我伏在窗户上看了很久。忽然，有人来通知，说院长命令我们立即回院去上班。天呀，我不禁一阵热血上涌，天还没大亮哩，我们几个柔弱的女孩敢闯到满街军人中去？好大胆！但讲过一定要服从命令，只好鼓起勇气立即出门。路上，解放军没给我们一点麻烦，倒是自己兴奋加害怕出了一身大汗。跑回院里时，陈院长已在那儿工作了，二十多名伤员在等着我们，于是我们立即穿上白大衣工作起来。

从早上到中午，一直不停地为伤员包扎伤口，换药等。在正忙累时，检验生年轻的学徒莫德炜过来庄严地向我们说：“你们辛苦了，共产党感谢你们！”当时我真莫名奇妙，凭什么要他来感谢呢？但他立即表明身份，原来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与陈维廉这位爱国人士都是五岭地委领导下的北二支

队成员，卫生院本是地下党组织曲江县工委的革命据点，早就掩护过一批批共产党员，现在担负着救死扶伤的重要任务。接着，这个平时讲句话也脸红的年青人，竟对我们滔滔不绝地宣传起党爱人民的政策。当我知道自己现在上班为伤员裹伤换药已是“革命工作”时，不禁激动得泪珠滚滚，什么疲劳都完全忘记了。

这一天真是忙啊！在陈院长的指挥下，在韶关的医务人员都来这里工作着。昨日寂静的病房，已住满伤病员，来门诊治疗看病的也很多，偏偏产妇也象凑热闹似的，接二连三的新生儿也争着来迎解放，有一个还是难产哩，真把我们个个都忙得团团转！好在事先准备了大量药物敷料，不然更会难以对付了。

在紧张的两个星期中，我们吃饭睡觉都很不正常，不久，才逐步编班转入正轨。解放军对我们既尊重又亲热，人人都会宣传，而且讲得又坦率又实在，令人感动。那什么“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等谣言，不攻自破，使我们由衷地信任和热爱了共产党。不久，上级宣布把曲江县卫生院改名为“北江人民医院”，这就是我市的第一所人民医院了。当时粤北地区称为北江区，委任陈维廉为粤北行署卫生科副科长兼任医院院长，并派来一位女共产党员刘玉文为副院长。她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很受我们欢迎，可惜不久调离，改派了黄洪勋、刘顽涛等同志来任军代表及指导员。

在解放后这两个多月中，卫生人员很缺，而且经费不足，卫生院不发工资，只包伙食，而伙食费又不多，经常只吃最便宜的煮萝卜加咸菜，吃的是大锅饭，但大家心情很舒畅，有用不完的干劲，从不计较休息与报酬，认为能在唯一的“人民医院”参加革命工作无比光荣，对未来充满信心。

果然，在上级的关怀下，北江人民医院在各方面都逐渐充实扩大起来了，医务人员的工作，工资也逐步得到合理解决。这粤北的革命据点，虽三改其名，（现在是市第一人民医院）但在各项业务工作和政治运动中如办好卫生学校，培养人才、抗美援朝等等，都献出了巨大的力量。

（作者当时是曲江县卫生院助产士。解放后一直在本市卫生单位工作，今年退休前是市卫生防疫站宣教科副主任、健康教育主管医师。现为北江区政协委员，民革成员）。

迎军三件事

当浩浩荡荡的南下解放大军进入广东的第一个县境——翁源以后，受到那里人民热烈欢迎，到处都扎有“欢迎大军南下”的彩棚。这里的迎军支前工作做得很好，沿途设有供应站、茶水棚与问事处。其中最动人的有三件事：

（一）怕大军入广东以后，语言不通，不便行动，北江第一支队就部署先从东江公学要来300多名会讲普通话的学生，分配到各部队作翻译。

（二）解放大军从粤赣路进入始兴一个缺粮地区宿营时，他们就发动坝子、江尾与松塘等地3000余人，组织一个大运输队，一夜送粮12万斤。

（三）解放军先头部队，由于千里追击敌人，全军的鞋子都已破烂。北一支队司令员何俊才，首先将自己的鞋子脱下作榜样，号召大家开展一个“捐鞋运动”，立刻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仅半天时间，就捐献鞋子280多双，虽经大军拒绝，但这热情却更鼓舞了他们，很多战士都这样表示：有没有鞋子没有关系，我们坚决打到广州去！（常）

我怎样走向革命征途

刘 白 亮

我是韶关市人，家住上后街。现居北京，在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离休多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也是韶关解放40周年。回首前尘，恍如隔世。我在故乡怎样走向革命途程？这和姑表兄弟的引导很有关系。

1934年我到广州市立一中升读高中，因为课外酷爱阅读巴金的小说，我舅家表兄林擎坤（又名林君柱），是1924年曲江民选县长林熙畴的独子，（广州世界语学会负责人），他和巴金是多年的好友，因此我也受到一定影响，很快就成了无政府主义的信徒。

叶帆（原名黄克东），和我是双重姑表兄弟，即我的母亲是他的姑母；他母亲是我姑母。

叶帆天资聪敏，勤奋好学，1936年考入广东省立一中（广雅中学）高中。周末回市里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很爱叶帆，自然要用无政府主义去影响他。起初，我们好象志趣相投，但广雅中学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在青年学生中的一个重要堡垒，叶帆认识了不少进步同学，大量阅读了社会科学书刊，就反过来帮助我，抛弃和批评无政府主义，改为信奉马列主义了。

当时，日寇步步进逼，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胜利会师陕北、东渡黄河。接着，西安事变，时局动荡，我们也无法安

心读书了。叶帆和几个广雅同学，要去香港组织学联，我和黄立文（原名黄克西，黄克东胞兄，也在广州读高中）也一同去，以补习英语为掩护。

三人在香港住了一些时候，搞不出什么名堂，又返回广州。不久，叶帆说：找到女作家草明、诗人蒲风，还有何家槐，愿介绍到上海去找剧作家陈白尘，可以找线索去延安。这时正是抗大（即延安抗日大学）二期招生。

我和叶帆弟兄偷了我姑母许多金首饰，由我执笔写一封告别信。说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近，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们奔赴民族解放前线，奉献微薄生命，万望不要挂念。

大清早，我们三人由韶关乘火车去广州，再乘船到香港。预备换轮北上申沪，取道津浦、陇海去西安，进延安。

我姑母起床，发现我们的信，一下丢失三个爱子（她将我同样当为儿子），大吃一惊，赶快兵分两路，派人北上追去长沙、武汉寻找。我姑父黄逸园自赶去广州，追到香港。

我年幼单纯，认为青年都是热血爱国的，把地址和北上计划，告诉了我一个最小的舅父。小舅父向我姑父告密，一下就找到了我们三个人。我姑父先说软的，我们不听，他说要到港局告密，我们无奈，只好跟他回韶关。

随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南也是重要战场，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我们也就决定留在家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起初，我们利用自家在当地经营的商务印书馆，销售进步书刊。因为地处风度中路，在市中心，吸引不少青年来翻阅左翼图书，交谈国事。

我们进一步组织读书会，开展过对托陈取消派罪恶和谬论的批判，控诉安那琪主义对西班牙内战的破坏。秘密传阅象《西安事变真相》、《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传）、

《解放》周刊……等禁书。教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抗大校歌》……歌曲。象滚雪球似的，由少数人串联越来越多的人。渐渐，商务印书馆就成为进步青年聚首、活动的中心。

我们还利用自家经营的宝元印务局，印刷、散发半公开的进步书刊。起初是取名《星火》，文艺周刊，每期有一篇延安通讯。找巴金先生领去请郭沫若题写刊头。但没有多久被停刊，又改出后来四开版的《活干》报，反映工农劳苦大众的艰辛生活，但也寿命不长，给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了。

有了半年多思想启发、小组活动的准备基础，1938年2月，在曲江县立中学礼堂，正式成立“曲江青年战时服务团”，由丘学炎和我出任正、副团长。我开始用名刘伯亮，就是因我父亲叫刘仲鲁。伯仲叔季，是兄弟昆仲的排列，避免人家猜疑到我。丘学炎现名丘林（在合肥市，为民盟安徽省副主委），我当时不是中共地党的成员，叶帆（1963年病逝）、黄立文（上海《文汇报》研究员，已离休），两兄弟都是实际工作者，由他们掌握，我和丘是表面的负责人。

“曲江青年战时服务团”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公开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平型关大捷，上演救亡戏剧。国民党地方党部，赠给我们一米多高的大镜框。文曰：“唇枪舌剑，扫荡倭气。”服务团发展到170余人，并准备下乡开展工作。“曲江青年战时服务团”的成立宣言和章程，当时刊登在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上。

可惜好景不长，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过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叫它做临“泉”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要加紧控制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我们说它要“包办”抗战，却又包而不办。

当时日寇飞机疯狂轰炸广州，国民党广东省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迁来韶关。先有省党部要员找我去训话，指责“曲江青年战时服务团”成立宣言的两个口号有政治背景，一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一是“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要无条件地拥护领袖，不能加上“抗战到底”这个条件，难道还怀疑蒋委员长会中途妥协、投降吗？说根本就不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应该“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要“曲江青年战时服务团”集体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我们不答应，就限令解散。

我们不愿当“三青团”的建团元老，就在街上张贴宣言，申明我们是抗日救亡青年团体，做了哪些有益的工作，但不见容于国民党当局，只好奉令宣告解散。揭露国民党限制、扼杀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

我们提高警惕，多转入秘密工作。但还是收到匿名的恐吓信。有个什么“铁血锄奸团”的，还寄来一颗手枪子弹。

7月，我另一表弟黄沙在国民党燕塘军校毕业（十三期），在湖南进行炮科实习，坐火车回韶关。

我去接车，黄沙到了。我出站在一家货栈借用电话告慰家里。跟来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进来两个彪形大汉，问我为什么打电话？说日本飞机轰炸，是我打信号。不容分说，押我进了小汽车。黄沙赶来，见我被小汽车架走了。

汽车在市郊兜了一圈，最后把我押进帽子峰一个地下室。后来才知道，是国民党广州行营的谍报队。

我被关在一间土牢，先已绑挂着一个人。我躺在地面上。行营有个什么课，叫我出去审讯。我侃侃而谈，从我的家庭和史，根本不可能去当汉奸。审讯人胡说什么帝国主义有白色的和赤色的，我不会当日本的汉奸，却要当苏俄的

汉奸。责问我：今天有共产党的中央委员，由武汉坐火车到广州，我去车上谈了些什么？我矢口否认。审讯没有多久，把我押了回去。

我姑父黄逸园，是韶关工商界巨子，当时是市商会会长，在地方上有威望。傍晚，由我姑父来领我出去。保释的条件是离开广东。说共产党有自己的地盘，在西北划定廿三个县为陕甘宁特区。我不能在其他地区活动。

当时，新任国民党县党部特派员邓炎声，是我读初中的校长，我曾在中学生国文比赛夺取冠军，奖给银杯和《饮冰室文集》，为学校争得荣誉。邓炎声跑来表示关心，说用汉奸嫌疑来抓我，其实是一种警告，如果不赶快离开广东，即连生命也不安全。

这时，刚好韶关城内西门刘如心考取庚款留英攻读硕士学位，同时为《新华日报》驻欧特派记者、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国际宣传委员。

刘如心从延安归来，由武汉回粤，准备经香港去伦敦。他父亲刘西垣，原是中山大学校医（刘如心在附中），在广州几年，和我们很熟。当和刘如心谈到我的情况，他十分同情，即写信介绍我去武汉找《新华日报》的负责人吴克坚，介绍我在韶关的情况。我在武汉找到吴克坚，吴领我去见当时的中宣部长凯丰同志，补助我一点路费，安排我去抗大参军。从此，我踏上了革命的征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尽了一点力。

家乡养育了我，共产党引导培育了我，现逢建国40周年大庆，对我走向革命征途的起点——韶关，也愈加怀念，祝她建设得更美，发展得更加繁荣昌盛。

韶关市政协早期组织及其进行的主要活动

(1950年1月——1961年11月)

刘 平

韶关市于1949年10月解放，同年11月建立了县级体制市人民政府。随后，根据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精神，韶关市于1950年1月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同时产生、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简称为协商会，即市政协的前身）。1954年实行普选，产生并召开了我市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市协商会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简称为市政协），并于1956年3月产生、召开了我市第一届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现仅将我市政协（包括协商会议时期）早期的组织及其进行的主要工作活动情况分别简述如下：

早期市协商委员会

(1950年——1951年)

根据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则》的精神，我市早在1950年1月，就召开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同时制订了本市人

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会议规则（草案），产生并召开了我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会议（简称市协商会）。

一、早期协商会的组织状况及其性质

从1950年1月至1952年8月先后召开了韶关市（镇）协商委员会会议共五届六次全体委员会（按：从1950年5月至1951年5月，约一年时间，韶关曾改属于曲江县领导的镇级建制）。委员名额不多，大多是不足20人，如第一届委员为17人，第五届为16人（按：根据韶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会议规则草案第二条的规定，本委员会应由主席1人，副主席2人，委员22人组成，但查阅现存资料，历界协商委员均未足规定的人数），但大多是本市有一定名望，并且注意各界人士都有一定比例的人员参加，如第一届主席为曾东（市长）、副主席关崇振（工商界）、陈湘（市总工会）。委员中也注意有各界人士比例，如钟侠（代表郊区农民）、何志永（工商联主委）、陈维廉（医药界）、曾东、熊明星（中共）、蔡彬（青年团）、李世亮（新闻界）、薛冰（妇女）、张若子（青年）、谢爱芬、刘明曦（教育界）等等。

协商委员会组建开始，不仅注意体现为是一种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在实行普选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协商会这一组织还具有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部份权力的性质。协商会规则草案第七条规定：各委员应经常与各该界（人民）代表取得密切联系，在会议时反映（各界）群众的意见，在会议后将重要决议，向各界（人民）代表传达（贯彻）。第九条规定，政府各部门，必要时得列席会议参加讨论或汇报工作。此外，根据现存一部份资料表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还须经政府与协商委员会讨论、通过

如1952年8月25日市第五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是根据《韶关市人民政府、韶关市协商委员会（关于）召开第五届第二次人代会的决定》的通知召开的。这份决定，规定了各界人民代表的名额，代表产生的办法，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的中心议题等等。

二、早期协商委员会的主要活动

从解放初开始于1950年1月成立的韶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早在1951年6月起就设置了专门办公机构，地址在原市人民政府（现风采路曲江县人民政府招待所址）对面（原市政府商业科（后改为局）二楼，即现风采路市邮电局风采支局内，配备有专职干部2人，设置有办公室、会议室和二间干部住房。

这段期间（1950—1952年）历届市（镇）协商委员会，为贯彻市（镇）人民代表会议决议、上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协助市（镇）党政领导部门在本市发动和开展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其他各项政治运动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1950年至1951年，为保卫世界和平，协助发动全市人民开展拥护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全市拥护和平签名人数共达27000余人（按：当时全市人口约为6万人左右）。

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会同本市抗美援朝分会组织全市人民控诉美（国）、蒋（介石）、日（本）暴行，举行各种类型大小控诉会共约220多次，参加控诉人数共约18000多人；投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共有25300多人；全市募捐抗美援朝飞机大炮捐款共26亿4千7百多元（按：这是按当

时旧人民币的计算。按当时新旧人民币折算，旧人民币1万元折合为新人民币1元）；此外，还协助发动和组织本市医务人员作为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共26人直接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冬至1951年春，还协助政府大力宣传、发动各阶层群众，积极支援市郊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最后摧毁了以地主为首的市郊农村封建势力，当时在市郊6个乡合共没收了封建土地16200多亩，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市郊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1950年至1951年间，还协助政府在本市进行镇压反革命和在本市厂矿码头开展民主改革运动，有力地打击了美蒋匪特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在本市的破坏活动，基本上铲除本市各种反动残余势力，有利于安定了社会治安和进一步巩固了本市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此外，解放初年，市（镇）协商委员会，还协助宣传、贯彻土改法、工会法、婚姻法以及工商、税收等方针政策，协助推动本市各项经济计划任务的完成。

市第一届政治协商委员会

（1956年3月—1961年10月）

根据全国统一的部署，韶关市于1954年2月至4月，进行了普选，并于同年7月召开了本市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嗣后由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内部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以及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三大高潮的到来，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延搁至1956年初才正式组建成立，并于同

年3月召开第一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一、首届市政协组织状况

韶关市第一届政治协商委员会议，于1956年3月正式成立并即召开第一次会议，此后于1957年6月召开第二次会议，1957年9月召开第三次会议，至1961年11月转届（市第二届政治协商委员会）止，市首届政协历时长达5年零8个月。

市首届政协自建立之日起，就不再具有原来市协商委员会履行部分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的性质，但从政协主要领导（包括政协常委）和委员组成人员的结构情况看，它却形成了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第一届市政协正副主席6人，主席郑长勤（中共韶关市委书记）、副主席何英（中共、副市长）、沈秉强（民革、北江专区副专员）、陈维廉（医务、专区人民医院院长）、彭子美（民建、市工商联主委、商业局副局长）、黎劲（民盟、市教育局副局长，1957年6月第二次全委会增选）。此外，还有市政协常务委员18人，分别由中共、各民主党派，共青团、妇联、工会、农民、渔民、文教、医务、华侨、工商、摊贩、宗教等各界人士组成。委员共73人（系指1957年6月第二次全会增选副主席、常委后的委员人数统计），委员组成的结构比常委界别还增加了科技、文艺和特邀人士。

这一届政协设置有办公机构，办公地址1956年10月设在市政府办公院内，1957年约4月份迁至本市平治巷11号（即现市科学协会址），干部配备有兼职正副秘书长各1人，专职秘书1人。政协委员会下设有提案审查委员会，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和若干工作组。

二、第一届政协进行的主要活动

1956年3月至1961年11月，本市第一届政协，在中央、省、市各级党委领导下，为贯彻执行各项方针政策，为加快韶关市的建设和共同推动我市各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进程，曾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

参与讨论并宣传贯彻市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市一届三次人大会关于继续加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议。1956年上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为协助本市党和政府宣传、贯彻、执行市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按：指1956年3月10日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至1957年市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以及在协助推动和继续加强对手工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特别为继续推动促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即协助党和政府在本市私营工商业及其他各界人士中，加强宣传学习，提高认识，贯彻执行有关方针政策，协调劳资关系等方面都做了不少的工作，从而推动掀起了公私合营的高潮，加快我市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进程。

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1957年6月，在韶关市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市政协副主席沈秉强传达了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听取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于1957年5月在广东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所作关于《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精神。即是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中央和省委明确指出当时存在主要问题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因此中央决定进行一次整风，并号召全国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其他各界人士进行揭露和批评，要求各界人士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积极帮助共产党开展这一

斗争。在此同时，中央还强调指出：这次整风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是改进作风，增强团结，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传达中，沈秉强副主席根据自己列席全国政协和出席广东省政协，听取毛泽东主席和广东省委陶铸书记分别所作讲话和报告的精神，对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方针政策和目的要求，都明确、详细地作了长篇的传达。对此，当时与会（韶关市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全体委员受到极大的鼓舞，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后，市政协委员根据自己的体会和认识，积极参加了大鸣大放，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对党和政府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意见。

然而，在传达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精神之后不久，几乎与人们感到无比欢欣鼓舞的同时，由于极左思潮的不断膨胀，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风暴已经全面掀起。这么一来，许多知识分子、党内外人士，包括市政协副主席、北江专区副专员沈秉强先生在内的一批党外朋友、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都未能逃脱遭到一次严重打击的厄运。

1957年9月12日至23日，在召开本市第二届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列席会议的市政协委员中有副主席沈秉强、彭子美、黎劲、市政协常委包三易、廖乃康、委员李汝、劳德馨、梁庆帮、李少书、杨兆祥等10人，被点名先后在大会上作检讨，交代“罪行”，然后接受与会代表和列席会议的市政协委员的批判斗争。人大会议以后，以上政协委员又继续交由各原单位的群众组织连续进行批斗。结果，他们先后分别均被一律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或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一冤案一直拖延长达21年或22年之久，即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第三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于1979

年至1980年间，委员中的错案、冤案才先后分别得到昭雪平反。但遭厄运期间，副主席沈秉强已于1970年2月冤死狱中，常委包三易（民革）、委员李汝（民建）、李少书（民盟）、等也均于平反前先后含冤逝世。

组织参观学习，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活动。

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市政协组织委员参加各种时事、政治学习的制度、机构、计划都比较健全。市政协建立了学习委员会，下还分设三个学委分会，并成立学委办公室具体进行组织各种学习活动。参加学习的人数，除政协委员外，还组织通过他们联系的各界人士共达740多人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在这期间，组织学习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代表大会有关报告和毛泽东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等重要文件。还结合实际，组织参观了本市举办的“暗藏在天主教中的反革命展览会”，广东公安厅举办的“公安展览会”和广州市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等。此外，根据需要结合各自的专长，还组织委员到医院、学校和市郊农村开展了考察和调查研究活动。所有这些，都十分有利委员和各界人士达到自我学习、自觉提高认识和自我进行改造的目的。

然而，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进行正常、健康的学习，时间并不太长，所遭到的境遇，随着政治风云的变换，大约至1957年秋之后，随着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嗣后不久开展“四清”（即清思想、清政治、清阶级队伍、清经济），一个比一个左的运动的干扰，政协委员的学习情况也随即急转直下。政协委员、各界人士也包括所有干部职工，学习马列主义和各种政治时事，已由自觉进行自我教育改造逐步变化为被强迫接受教育的过程。在此之后，即在1957年秋反右

派开始以后，在假、大、空形势的影响下，人们（包括政协委员）逐步学会了说空话，说假话，并在实践中违心地做了许多不自愿、不乐意做的事情。

笔者注：本人曾于1951年7月至1954年8月在市协商委员会工作过，以上这篇材料是参照有关档案资料结合本人一些回忆整理的。这篇材料的年限基本上截至1961年10月，即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结束时止。至于以后，1961年11月至1963年5月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和1963年6月召开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及其后约于1966年初起，因文化革命相隔二十多年，政协停止了活动，直至1978年12月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始重新恢复了政协的活动。此后，1981年7月至1983年11月的市政协第四届委员会，1983年12月至1988年12月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和1989年1月召开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等各届委员会的有关材料，即自1961年11月市第二届政协以后有关材料，则留待目前正在进行编纂的《韶关政协志》继续加以编写整理，这里不再重赘。

1989、6、21、

我在解放战争年代

张 显 岐

编者按：现广东省政协常委、省参事室副主任、省民革常委、原国民党六十四军副军长张显岐将军，解放前夕，在粤中、海南，特别是在粤北的始兴、连山、英德等地，为爱国民主事业，策动部属起义，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他最近撰写了《我的从军生活忆述》一文。现将其最后部分，即在解放战争年代的生活忆述部分刊发如下。本文题目是我们加的。

我生长于粤北的始兴县顿岗乡塘湾村。自1926年2月考入广州孙文主义养成所起，跟随国民党蒋介石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从低、中级军官到高级军官。1949年3月，国民党国防部任命我为第六十四军副军长。现将我1946年1月以后，在整个解放战争年代的一段生涯忆述如下：

1946年1月，我率国民党六十四军131师移师广宁、四会、清远，轮流整训。三个月后，又移驻南雄、始兴、翁源和曲江。至1946年7月，部队整编，131师缩编131旅，三个团缩编为两个团，李乃震团裁撤。我仍任旅长，驻于曲江。

这个时期，蒋介石撕毁了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协议，并对

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后方部队大量调上前线。12月底，131旅奉令北调，初抵徐州集中，后转韩庄车站，不久，续开台儿庄、官湖镇一带，准备进攻驿县附近地区，为被人民解放军所困的蒋军第二十六师解围，但我们尚未到达，该师已被歼灭。最后以沂蒙山区为目标，经枣庄、滕县、邹县、曲阜，一路未经战斗，到达泗水以东沂蒙山区附近地区，正准备进入山区的时候，忽接第六十四师师长黄国梁电话：派我和刘绍武（六十四师副师长）到南京中央军官训练团受训。团址就在中央军校，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训练对象是军、师、旅级的军官，时间规定二十天。此时此地搞这种训练，可想而知。课程中有“剿共战术”一课，还有一位叫韩谏成的，新从游击区战败归来的情况报告。陈诚在讲堂上也大放厥词：“剿共军事一年内可胜利结束”。但事实如何？正如李宗仁先生在其《回忆录》所说的：

“我国抗战八年，人民死伤数千万，全国精华地区沦陷殆尽，然终将敌人驱出国土，失地全收，实开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未有的奇局。孰意胜利不及四年，我国民政府竟被共产党逐出大陆，数百万军队一败涂地，实在也是亘古以来鲜有的怪事”。（注：《李宗仁回忆录》第847页）

我在军官班结业，回到山东泗水前线。六月间，又发表我为国防部部员，从此，退出了山东战场。

1947年8月，我回到南京国防部报到，没有安排具体工作，但能见到不少多年未见的旧友，例如兵役局长戴高翔，他曾鼓励我参加兵役研究班，将来可以转各省征兵机关工作，我当时没有答应，只想回家乡看看。九月间，我回到广州，闲住了一个时期，有机会同各方面人士接触，例如张励（曾任第四战区高参）、吴仲禧（第四战区军法执行监）等，都

是老相识，能够交流思想，也谈了“出路”问题，我很受启发。翌年四月，我回到南京国防部，向兵役局长戴高翔，表示愿意参加兵役工作，戴当即同意我入兵役研究班第四期，二十天结业，我被派回广东任粤中师管区司令。

粤中师管区司令部设在广州市凤凰村附近（即现在的拖拉机厂），请张大华任参谋长。在我任期内，按照国民党的兵役法，征了二千多名劳动人民充当兵役。旧社会的兵役机关是被人民疾视的，因为其中弊端最多，因而人们说：“兵役机关是阎王宫”。

1949年3月，蒋家王朝已临末日。解放大军准备强渡长江，长江防线，眼看就要土崩瓦解。由当时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介绍，国防部发表我为第六十四军副军长。军长是容有略，下辖131、156、159三个师，驻防海南岛。新任命发表后，我曾乘飞机去过海南岛一次，只逗留一天即返广州，以后就没有再去了。此行的目的，思想上是借此机会去同六十四军的旧同事（第131师师长张其中）取得联系，为以后进行“自己应做”的工作。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民主分子，事前已纷从内地到达香港，在香港举行代表会议，决定继承孙中山爱国、民主、和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号召在蒋管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立即行动起来，举行策反起义，迎接大陆解放，以振兴祖国。我作为现役的副军长，从事此项活动，既有条件，亦颇便利。

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6月，我先后邀请饶纪绵（始兴县县长）、薛汉光（英德县长，后升专员）、莫家励（北江税局长）、虞泽芳（连山县长）、何衍章（始兴自卫总队副

总队长)等到穗,进行多次会谈,讲清当前形势,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然后再说服饶纪绵做南雄县长华文治的工作,由薛汉光联络曲江、乐昌两县,莫家励负责策动连县、连山两县的地方团队共同响应起义。初步取得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949年2月,我派曾任我131师师部的秘书黄虹(又名陆雨)赴港,与中共党员张其光同志(曾任我当155师长时的政治科长,与黄虹是旧同事)联系,通过张其光同志与饶彰风(中共驻港负责人)接通关系,指示起义有关的问题。我又通过曾任四战区干训团政治教官的余震与在港民革的华南负责人陈汝棠联络,取得中共与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同意与支持,大致就绪,乃亲赴韶关、始兴地区,组织和领导粤北地方武装团队的起义。事前,我还利用与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的关系,为始兴县请领了一批武器,步枪七百余支,平射炮二门,弹药一批;再从我的师管区送去步枪三十余支,轻机九挺,手枪十二支,弹药、医药、服装等,作为充实始兴地方团队起义实力之用。

为了策动粤北地方团队起义,与中共方面打通了关系。我采取同样的方法,发动粤中师管区旧属李乃震和邓鄂的广东暂编第一纵队(辖三个大队),于1949年10月16日举行阵地起义,将存于顺德容奇的军用物资,全部移交解放军接收。

广州解放后,六十四军仍驻海南,我作为该军副军长,事前曾与所属131师师长张其有所联系,我曾赴港亲自会晤其留在香港元望的家属(张其中的父亲及妻子),设法示意张其中伺机起义。经我向叶剑英元帅汇报(当时叶帅与我同住广州爱群大厦),当时条件本已成熟,派人去海南联络。但

联络尚未到达海南岛，解放大军已挥兵渡海，未获成果。

我从军二十余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为蒋帮效命。只在广州解放前的短暂时间，尚能做一些“自己应做”的工作，策动旧属起义，为反蒋爱国民主事业尽了一份力量。解放后，人民政府不咎既往，给我适当安排，发挥余热，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前进。

我在解放前的一段时间里，先后在粤北、粤中和海南地区进行过策反起义活动，粤中与海南，微不足道。粤北始兴起义较有成效。我曾于1979年6月，撰述《粤北始兴起义始末》一文，刊于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的《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不再重述。惟当时未附起义通电全文，现借此机会补述于此。

1989年7月18日（江莘协助整理）

注：始兴起义通电（见《韶关文史资料》第五辑）

同舟共进四十年

——纪念人民政协成立四十周年

陈 维 廉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至今，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步，中国人民政协也走过了四十年的光荣历程。

我作为一个民主爱国人士，民革党员，于1930年在东江苏区红军十一军工作，受到了革命的教育，此后，虽几经波折，却一直与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保持着联系，并在党的指导下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工作。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掩护地下党的工作，并一起迎了解放。解放以后，我历任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直至今天我78岁高龄了，仍然担任着广东省政协委员、韶关市政协副主席。可以说，解放以来，在参政议政，发挥监督协商起到一定作用。今天，我回顾自己，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进、合作共事的四十年，表达我对人民政协的热爱。并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将担负起更加光荣的使命，为发扬中华民族大团结大统一，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难忘的一天

1949年10月7日——人民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这天拂晓，人民解放军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开进了韶关城，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的步伐和人民的欢呼声，显示黑暗的年代已经过去，一轮红日照耀得古老的山城焕发了青春。

解放前夕，我既要应付国民党，佯装随他们一起撤退，又要设法保住曲江大桥和医院等的紧张而焦虑的日日夜夜随着解放终于过去了。解放军一入城，经过原来中共地下工作的袁鉴文、赵学光、李凌冰等同志的介绍，我与北二支队政委、北岭工委书记张华同志（现任广西省政协副主席）会晤，商议立即投入支前工作。当时的支前工作很重，铁路又未修复通车，几万大军过境追击南逃之敌，三天内要筹粮十五万斤。当天我约了商会主席何志永，利农米机张少芝，巨商邓子睦等十余人，到平治巷曲江商会（今市工商联）开会，由张华政委讲话要求筹借军粮。由于国民党常常是有借无还，失信于民，加上解放前夕，通货膨胀，钞票贬值，人们不无疑虑。但我保证有借有还，并带头认购了三万斤粮，大家疑虑顿消，也纷纷认购，筹粮任务于是很快地完成了，因而为支前和解放南方大城——广州，作出了一份贡献。与此同时，为了接受解放军伤病员和为城市居民服务的需要，我在韶关解放的当天立即恢复曲江县卫生院的正常工作。在共产党的委托下投入粤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组建工作中。

合作共事的新起点

1949年10月接北江临时行政公署的命令，曲江县卫生院改名为北江人民医院，委任我为行署卫生科副科长兼医院院长，主管全区十多个县的卫生业务工作。另派中共党员刘玉文为副院长；黄洪勋、刘硕涛（又名许耿）分别任协理员、指导员。由此，我开始了与中共党员合作共事的新起点。当初，医护人员对中国共产党不了解，但在人民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的现实深受感动。而医护人员，对伤病员精心治疗，高度负责的精神，也受到中共党支部的表扬。在不断的学习中，我们逐步认识到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人民的利益出发的精神，也从中共党员优良的工作作风中体现出来。当然合作共事也并非一点矛盾没有。比如，一名党员干部和护士谈恋爱，不拘小节，不讲场合，人们看不惯，一时议论纷纷，影响很不好。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向党支部反映。党支部也很重视，立即找有关同志谈话，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取得了同志们的谅解。使我认识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合作共事协调关系的好办法。

由于刚解放，人事制度不健全，曲江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时（当时曲江县管辖韶关镇），宣布各机关干部要重新登记。有些人听信“对旧官吏要斗争”、“做干部没有工资发”……的谣言。登记的人寥寥无几。当时在卫生院设有登记站，卫生院率先完成登记，当他们看到卫生人员全都上了班，照样进行工作，带动各机关前来登记达一百多人，后来政府均量

才录用。开始韶州师学校的老师，既不登记也不上课，学校陷于瘫痪。人民政府命我暂兼校长，这是对我个人的莫大信任。在我的动员和组织下，不久教师不仅登记了，也陆续来校上课，学校的教学秩序也很快地恢复了正常。

创办卫生学校

我担任全区卫生行政领导工作的卫生科副科长（以后改任为文教处副处长、文教办副主任、成立卫生局任副局长）时，各县卫生院来函来电，纷纷要求派卫生工作人员，以利恢复残缺不全的卫生院。为此，我发起办北江卫生学校，由各县保送2—3名学员入学，结业后回到县去充实基层卫生机构。正好卫生厅也下通知，在行署辖内建立第三医士学校（在韶关）和第六医师学校（在连县），可以说与我们不谋而合。省第三医士学校，由我兼校长，刘顽涛兼校指导员。我们办学遵循卫生部颁布的“短期促成，先普及后提高”的方针。第一期由各县推荐，招生40名，1950年2月开学，我既是校长又是任课教师。1951年6月第一期毕业生，除为省麻疯治疗训练班抽调10名同学以及留下两名教学外，其余均回到各县卫生院工作。1952年第六医士学校合并我校，使我校成为有护理员、医生、护士、妇幼医生、药剂士、检验士等多学科的卫生学校。我兼任校长直至1962年，培养了上千名初、中级医疗卫生人员，学生遍布专区各县，有的还分配到省内外。今天，他们大都成了我们医疗卫生事业的骨干，有的是主治、讲师、副主任医师、高级讲师，有的则是医疗卫生部门的领导。这些都是我们党自己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想起这，我不禁为自己曾在党的卫生教育事业上工作了十余

年，做了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而感到欣慰。

反对侵略 抗美援朝

针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妄图扼杀我们新生的共和国，我们雄赳赳气昂昂的人民子弟兵跨过鸭绿江，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旗帜，为保家卫国而战，抗击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侵略者，伤亡是很大的，白衣战士救死扶伤也必不可少的。为此，中央卫生部，省卫生厅要求我们韶关市组织一队医疗手术队援朝。我立即动员医务人员自动报名参加，在报名中，有些医疗骨干原是开业的医生，其工资报酬如何计发，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医疗队就无法组成。经与有关领导研究，以及做好思想工作，给他们评定等级工资标准，费用由募捐及卫生工作者协会统筹解决。医疗队出发的时候，我们在中山公园（现市政府所在地）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大会，省卫生厅李得奇副厅长还专程前来参加大会。我和市领导一起给每一个队员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台下如潮的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大会后，医疗队沿风度路往火车站进发，沿途万人空巷，欢送着这些“最可爱的人”。在连串的爆竹声中，医疗队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列车一声长鸣，徐徐地开动后，人们还久久地不愿离去。这种动人的场面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同时，也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党把这样一项重要的组织工作交给我，这固然是对我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表示了对民主爱国人士的信任。党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它相信群众。对我们来说，也是经过了一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和锻炼。其后，至1986年是医疗队援朝三十五周年，韶关党政领导还为医疗队开纪念大会。

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

人民卫生为人民。贯彻省卫生厅的指示精神，为了方便群众看病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我们把在东堤路的地区中心卫生院（北江人民医院改名）与在西河的韶关市医院接管的曲江循道医院院址相互对调，同年并购风度南路一座私宅，办起一间市区门市部，即现粤北第二医院门诊部。（调换院址计划办法由我草拟，李文华专员批准后实施）并着手筹建妇幼保健院、卫生防疫站、麻疯病院等。最初的妇幼保健院建立在湖南同乡会旧地址，设有十张床位。防疫站则在购买了在下后街的一座私宅作为站址，麻疯病院因需要隔离，则选择在依山傍水的市西郊，有数十亩荒地，隔一小河就是草鞋洲，可供开垦种地。一、可供患者开展适当的生产劳动，减少国家负担；二、可调剂患者生活，以利其与疾病作斗争。病院建成后，第一次收容了流落在各处的麻疯病患者60多人。为了适应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调换医院院址的同时，我们将韶关卫生学校迁到靠近地区医院处的英光小学旧址，除一栋四层的楼房外，还是一片荒原杂草丛生的荒芜地。现在粤北人民医院已成为具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有八百多的医护员工，卫生学校有近一百多名教职员工，近千名学生，成为颇具规模的医疗卫生教学中心，今天的妇幼保健院、卫生防疫站、麻疯病院等，亦非同日而语了。这都是与当年的卫生科和医院的共产党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在长期的共事合作中，我们肝胆相照、相互支持、相互关心，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前进中的困难。今

天，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有这么大的发展，也说明了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党外人士共事合作的结果，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家要振兴，教育为根本。1983年我们韶关民革面向社会，从办“书法班”、“古典文学班”开始，逐步地办起业余学校和专业培训班，如电子、会计、建筑等。1985年以市政协主席陈仲舒、副市长时述花、教育局长丘向阳和我组成的校董会领导下，办起了一间有18个班，学员人数达700余人的振华业余中学。由于办学条件逐步完善，1987年秋季，经市教育局批准，省教厅备案，改为全日制中学，并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现在在校人数达600余人。社会效益是显著的；拾遗补缺开学路、增加青年就业的机会，对于稳定社会治安也起到较好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止结毕业人数达3489人，就业人数达1997人。改为全日制中学后，校董会结束，我任校长。我们办学七年来，在一无校舍，二无资金，三无设备的情况下，坚持发展教育事业，自力更生，以校养校的方针，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和支持。1988年市政协拨给我们武江桥附近建校基地900多平方米，筹备建校，经费来源通过集资赞助贷款等办法，即将动工，拟在今明两年把教学楼和学校宿舍建起来。走出一条民办教育的路子，为多层次、多渠道社会办学创立模式。

自韶关市产生人民代表大会和建立政协起，我就是代表和委员（人民代表至第七届），在韶关市政协则历任副主席，还是历届广东省政协委员。现在我年近八十岁了，还连任省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副主席。1955年参加民革组织，历任民革韶关市委会副主委、主委、民革广东省委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民革韶关市委会名誉主委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民革同志对我的信任。韶光奔流，几十年过去了，我已是近八十高龄了。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跟党走的心没有变，风吹浪打站得稳。不管是历次政治运动受到怎样的冲击，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摧残与迫害，我始终如一地相信中国共产党，做一个能上能下的国家干部。在参政议政方面，我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对社会现象和人们关心的热门话题，敢于直陈利弊。一句话：就是决心做诤友，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绝不作打哈哈说废话的“谦谦君子”。现在我年近八旬，但在有生之年，我愿做一个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人：坚持“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为振兴中华和统一祖国而共同努力奋斗！

志愿军代表团来韶报告忆述

李世亮

差不多四十年前的事了。当时韶关市长是曾东，我是北江日报和北江印刷厂的经理，为市协商委员会委员。

1949年全国解放后，全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无限兴奋的热情，投入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但在大洋彼岸，美帝国主义者却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悍然出兵侵略朝鲜，妄图吞食朝鲜，由朝鲜打入我国东北，再行置我国于他们铁蹄之下，鱼肉我们。

当时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察破它的阴谋，遂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并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实行援助朝鲜抗御美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以保卫我家国。

决定一出，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亲爱的英勇的子弟兵，即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一起抗击美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

经过大约半年的战争，我们英勇机智、勇敢善战的子弟兵，就逼使美军节节败退，并创造了许多十分动人的事迹，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刚强、朴实、纯厚的高贵品质，赢得了胜利，赢得了朝鲜人民的热爱和赞誉。

我相信许多人都读过我国文学家魏巍同志亲赴战场采访，写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一篇战地通讯吧，他报告的几

个例子，使我们读来多么感动、多么兴奋啊。它使我们感到我们子弟兵多么可爱。

魏巍同志说过，文章里报导的几个例子，是为了文章的简要，在无数例子中选出来的。令我们感动的还有许多惊人的事实。我们子弟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勇敢纯朴表现，真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

抗美援朝的伟大行动，在全国人民纷纷捐献援助，纷纷赞扬感佩声中，志愿军派代表回国报告了。代表们要将他们对敌的英勇机智斗争经过，他们热爱朝鲜人民、关怀朝鲜人民的光辉事迹，他们感谢国内人民对他们关怀的谢意带回来，到国内各地讲给大家知道。

代表团来了，我记得大约是1951年4、5月间。当时韶关的党政领导及各界群众代表，齐到火车站迎接。相见后纷纷握手互相致意，情况十分热烈。

当晚，市当场设盛宴欢迎。互相谈到朝鲜战争的顺利情况和国内人民对抗美援朝的热诚拥护。一代表团同志说：“我们此次回国，所到各地，都深感国内人民对我们的热爱。有一次，一位地方同志对我们说：‘志愿军确实无限光荣，从今日起三天内我都不洗手了，因为我和你们握过手，舍不得洗脱那些光荣的手气。’大家大笑起来，我接着说：‘是啊，我要七日不洗手，因为今天你们下车时，我和你们都握过手，我更感光荣，大家又哄笑起来。席间，宾主互相谈吐融洽异常。

第二天，在当时的中山公园广场，召开全市人民大会，专请代表团作报告，到会人数十分踊跃，有全市各单位的干部，各工厂的职工，各街道的居民，各郊区的农民。各人列队而入，红旗招展，人流涌动，热闹异常。把一个比足球场

还大许多的广场塞满了。全场装了很多广播喇叭，声音洪亮。事先还估计到广场容不下这么多人，还另开了两个礼堂，两个礼堂也坐满人，由有线广播转播。代表同志讲的是普通话，却带有一个讲广州话的翻译，把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表现的生动事例，逐一讲得很清楚，很动人，并时带一些幽默，不断博得广大听众的热烈鼓掌，也不时发出欢呼声。群众听得十分有趣。会开得很成功，使大家轻松地上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志愿军的英勇机智的光荣事迹，一直在韶关市久远地流传着。

晚间，又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座谈会，与志愿军同志亲切见面。到会者百余人，气氛浓烈，笑说盈盈，大家分别代表各自行业向志愿军问好、致意，极尽爱切、爱护、钦佩、赞誉之情。当时我说：“志愿军在朝鲜为我们而浴血奋战，我们非常感谢你们，请你们把韶关人民的致谢心情带回去，告诉大家，你们在前方日夜作战，我们非常感动，你们今后需要什么，只要告诉我们一声，当即遵命送上，大力支援。”引得全场热烈鼓掌。代表团的同志也深情地笑着，鼓掌示谢。

第三天，我们就依依不舍地送别了代表团全体同志。

韶关市政协第六届 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主任：饶纪寰

副主任：张冠祥 徐志滨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斯德 刘礼芳 黄日有

蔡宗魁 蔡洁芳

《韶关文史资料》编辑

刘平 饶纲钧 谢君豪 汪波

封面设计：黄安仁

封面题字：赵朴初

韶 关 文 史 资 料

第十四辑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印刷

广东省非营利出版物准印证

89粤印准字第096号

· 邮政编码：512002

工本费：2.50元